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5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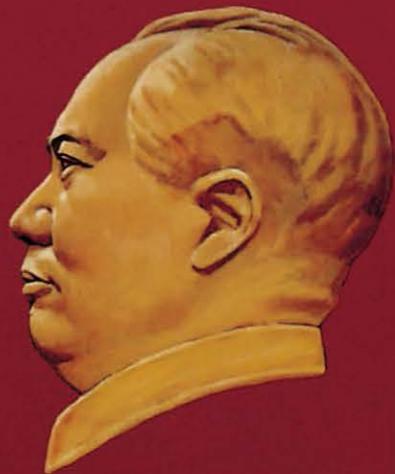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5卷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5卷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5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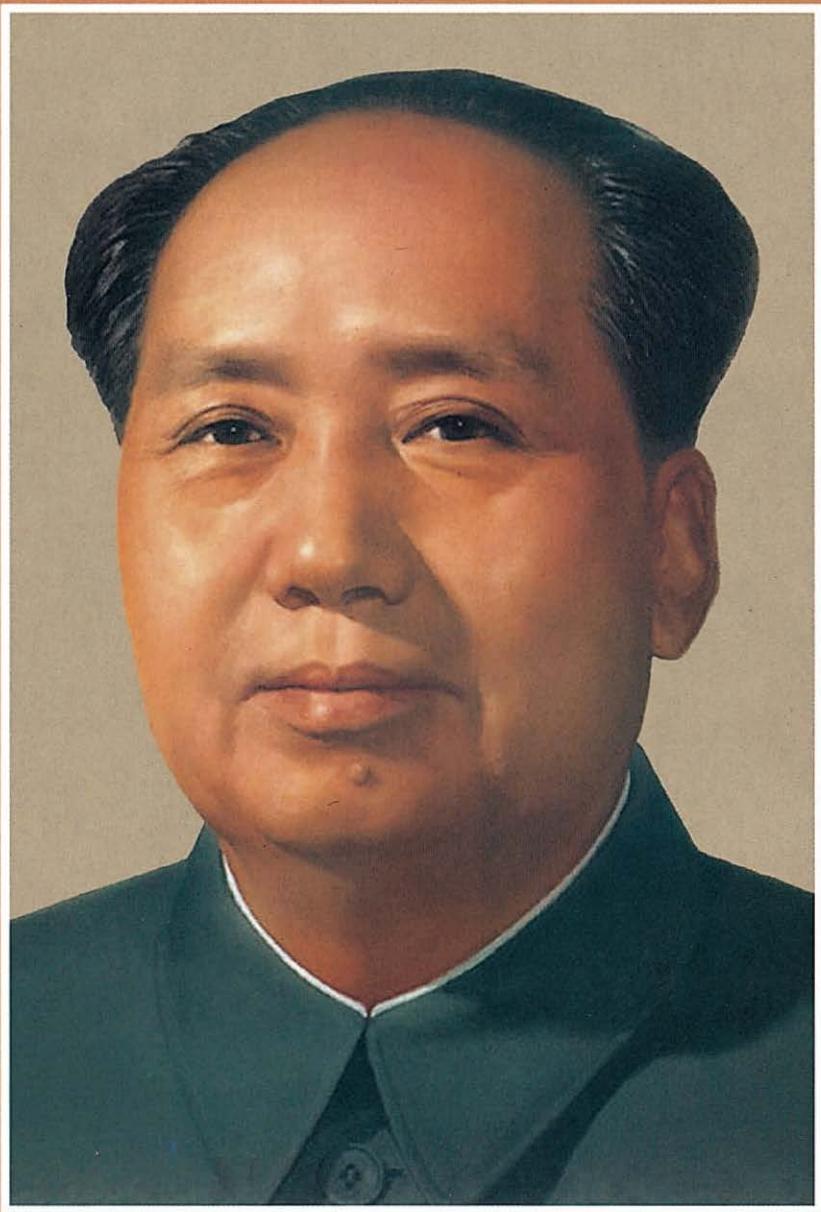
润东出版社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 泽 东 同 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5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 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	2
(1962年1月3日)	
给黄炎培的信	8
(1962年1月6日)	
给巴西总统古拉特的信	9
(1962年1月7日)	
给李讷的信	11
(1962年1月9日)	
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12
(1962年1月10日、24日，2月23日)	
给毛岸青的信	18
(1962年1月12日)	
给康生的信	20
(1962年1月12日)	
对《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的批语	21
(1962年1月12日)	
对《毛泽东军事文选》外文版一条注文的批语	23
(1962年1月22日)	
四言诗·开“出气会”	24
(1962年1月29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5
(1962年1月30日)	
对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的批语 和修改	55
(1962年2月11日)	
对邓小平报送的中联部三个文件的批语.....	59
(1962年2月23日)	
对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61
(1962年2月24日)	
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稿的批语	62
(1962年2月至4月)	
对《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关于刘少奇同志报告的决议（草稿）》 的修改	68
(1962年2月)	
对一个工人关于物价上涨的来信的批语	69
(1962年3月4日)	
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71
(1962年3月20日)	
对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稿的批语	74
(1962年3月21日)	
给邓小平等的信	75
(1962年3月25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捷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77
(1962年3月26日)	
祝贺野坂参三七十寿辰的电报	79
(1962年3月28日)	

为《新湖南报》题写报头	81
(1962年3月)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七周年的电报	85
(1962年4月3日)	
对中央转发财贸办公室关于财政信贷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	87
(1962年4月12日)	
毛泽东等祝贺金日成五十寿辰的电报	89
(1962年4月14日)	
关于研究苏联《教师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批语	91
(1962年4月16日)	
关于修改六首词给陈白尘的信	92
(1962年4月24日)	
给臧克家的信	93
(1962年4月24日、27日)	
《词六首》序一.....	95
(1962年4月)	
《词六首》序二.....	96
(1962年4月27日)	
关于赛福鼎是否回新疆工作问题的批语	98
(1962年4月27日)	
在一篇谈中苏分歧及西方对策的文章上的批注	99
(1962年4月)	
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的谈话.....	103
(1962年5月3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七周年的电报.....	112
(1962年5月8日)	

代拟的给陈宗娥的信	114
(1962年5月12日)	
关于不参加苏联东欧七国领导人会议的批语	115
(1962年5月15日)	
对中央转发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	116
(1962年5月24日)	
对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的修改	118
(1962年5月)	
给邵华的信	121
(1962年6月3日)	
应抓紧对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	123
(1962年6月8日)	
对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的修改和批语	124
(1962年6月11日、12日、18日)	
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	126
(1962年6月19日)	
给彭真的信	133
(1962年6月22日)	
在陶铸报送两个文件的信上的批语	134
(1962年6月27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的电报	136
(1962年7月10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周年的电报	138
(1962年7月10日)	

给张人惕、张人价的信	140
(1962年7月19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十八周年的电报	142
(1962年7月21日)	
关于印发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的批语	144
(1962年7月22日)	
对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的批语	148
(1962年7月23日、8月24日)	
对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一篇文章摘要的批语	150
(1962年7月25日)	
对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51
(1962年7月31日)	
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的批语	153
(1962年7月31日、8月24日)	
对中央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的修改	155
(1962年8月)	
在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来信上的批语	157
(1962年8月2日)	
对新华社关于南斯拉夫经济情况报道的批语	159
(1962年8月2日)	
对新华社关于南斯拉夫经济问题的一篇通讯稿的批语	161
(1962年8月2日)	
对《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的批语	162
(1962年8月2日)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63
(1962年8月6日)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168
(1962年8月9日)	
关于领导机关应加强请示报告工作的批语	176
(1962年8月10日)	
在中央组织部七月份综合报告上的批语	177
(1962年8月12日)	
对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政策意见的批评	178
(1962年8月12日)	
对陶铸在中南组发言要点的批语	181
(1962年8月13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七周年的电报	183
(1962年8月14日)	
对公安部关于当前反革命活动情况和我们的对策报告草稿的批语	185
(1962年8月15日)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电报	186
(1962年8月15日)	
对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稿的批语	188
(1962年8月16日)	
对胡开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报告的批语	189
(1962年8月16日)	
对李先念关于等价交换问题的口头汇报提纲的批语	191
(1962年8月17日)	
对中央军委工作报告的批语	192
(1962年8月18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八周年的电报	193
(1962年8月22日)	

对邓子恢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反映的批语···	195
(1962年8月26日、29日)	
对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的批语···	198
(1962年8月27日)	
对巨任吾给毛泽东、刘少奇来信的批语···	199
(1962年8月29日)	
对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稿的批语···	201
(1962年8月31日、9月14日、10月7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电报···	203
(1962年9月1日)	
对李富春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的信的批语···	205
(1962年9月4日)	
对谷城、光化、襄阳三县旱灾情况报告的批语 ···	207
(1962年9月8日)	
对陶鲁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要点的批语···	209
(1962年9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八周年的电报···	211
(1962年9月8日)	
关于改善生产队经营管理问题的批语···	213
(1962年9月8日、25日)	
书赠毛岸青、邵华联···	216
(1962年9月17日)	
对冶金部关于解决品种质量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218
(1962年9月14日)	
给杨尚奎的信···	220
(1962年9月14日)	

对《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一文的批语	221
(1962年9月15日)	
为日本工人朋友们题词	222
(1962年9月18日)	
对《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一文的批语	223
(1962年9月24日)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224
(1962年9月24日上午)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工业支援农业的指示	235
(1962年9月24日)	
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	236
(1962年9月26日)	
对《外事简报》第一三七期的批语	240
(1962年9月29日)	
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	241
(1962年9月29日)	
对李先念关于改进商业工作问题的来信的批语	244
(1962年9月30日)	
对西南组讨论商业问题决定的情况简报的批语	246
(1962年9月)	
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247
(1962年9月)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248
(1962年9月)	
关于电台的指示	250
(1962年10月1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的电报	254
(1962年10月3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的电报	256
(1962年10月6日)	
对《恐“敌”病一例》的批语	258
(1962年10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及利亚国庆的电报	259
(1962年10月31日)	
对罗瑞卿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的批语	261
(1962年11月3日)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五周年的电报	263
(1962年11月6日)	
给杨开智的信	265
(1962年11月15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日和解放日的电报	267
(1962年11月27日)	
在一份外交信稿上的批语	271
(1962年11月27日)	
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的批语	273
(1962年12月14日)	
对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的一批材料的批语	274
(1962年12月22日)	
关于请刘晓等来杭州一谈给刘少奇等的信	276
(1962年12月25日)	
《冬云》诗一首和给林克的信	277
(1962年12月26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	280
(1962年12月29日)	
对《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的批语	282
(1962年12月30日)	
对《文艺报》刊载的三篇文章的批语	283
(1962年12月31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的电报	284
(1962年12月31日)	
毛泽东等向苏联领导人祝贺新年的电报	288
(1962年12月31日)	
批评新华社	290
(1962年)	
为“中国摄影家协会”题名	291
(1962年)	
为邱桂荣题词	293
(1962年)	
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题词	295
(1962年)	
关于送阅《史记·项羽本纪》的批语	299
(1963年1月3日)	
给李讷的信	300
(1963年1月4日、15日)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303
(1963年1月6日)	
在中组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	306
(1963年1月8日)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307
(1963年1月9日)	
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311
(1963年1月12日)	
对《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社论稿的批语	313
(1963年1月25日)	
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批语和修改	315
(1963年2月)	
对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323
(1963年2月15日)	
在听取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汇报时的插话	325
(1963年2月19日)	
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331
(1963年2月20日)	
和苏修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	332
(1963年2月23日)	
为学习雷锋题词	335
(1963年3月5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批语和修改	339
(1963年3月5日)	
不得人心，武器再强也不免失败	341
(1963年3月22日)	
给周世钊的信	343
(1963年3月24日)	

在张干来信摘报上的批语	346
(1963年3月24日)	
给戴毓本的信	347
(1963年3月28日)	
给张维的信	348
(1963年3月31日)	
对《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一文的批注和修改	350
(1963年3月)	
为中央转发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拟的标题	353
(1963年3月)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八周年的电报	356
(1963年4月3日)	
给毛岸青的信	358
(1963年4月5日)	
关于对苏共纲领的意见《备忘录》稿的批语	359
(1963年4月9日、20日)	
野营训练是一种好方法	361
(1963年4月12日)	
关于刘晓工作安排问题的批语	362
(1963年4月20日)	
为《学理论》杂志题词	363
(1963年4月)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365
(1963年4月、5月、6月)	
把海军工作做好	371
(1963年5月2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工会 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	372
(1963年5月4日)	
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上的批语.....	377
(1963年5月8日)	
对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的批语.....	379
(1963年5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八周年的电报.....	383
(1963年5月8日)	
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385
(1963年5月9日)	
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	388
(1963年5月10日)	
我们不靠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	391
(1963年5月22日)	
给黄炎培的信.....	394
(1963年5月26日)	
给周世钊的信.....	395
(1963年5月26日)	
给张干的信.....	396
(1963年5月26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的修改	400
(1963年5月)	
对印发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 通知稿的修改.....	407

(1963年5月)	
在关于四清运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408
(1963年5月)	
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的批语	412
(1963年5月)	
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	414
(1963年5月)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421
(1963年至1965年)	
对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计划调整和执行情况报告（草稿）的批语	426
(1963年6月26日)	
关于发表中共中央声明的批语	430
(1963年6月30日)	
为中国美术馆题名	431
(1963年6月)	
对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普遍发到农村支部的请示的批语	432
(1963年7月5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二周年的电报	433
(1963年7月10日)	
对《人民日报》关于加强团结的社论稿的修改	435
(1963年7月)	
对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稿的修改	436
(1963年7月)	
对《人民日报》为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写的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	439
(1963年7月19日)	

关于赦免在押国民党军将领等问题.....	444
(1963年7月20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家复兴节十九周年的电报.....	447
(1963年7月21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周年的电报.....	450
(1963年7月25日)	
接见古巴文化、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的谈话.....	452
(1963年7月26日)	
关于在党内传达中苏两党会谈记录的批语.....	459
(1963年7月28日)	
对一篇评中苏分歧的文章的批语.....	460
(1963年7月31日)	
杂言诗·八连颂	461
(1963年8月1日)	
关于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的批语.....	468
(1963年8月7日、8日)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	470
(1963年8月8日)	
接见非洲朋友时的谈话.....	473
(1963年8月8日)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	476
(1963年8月9日)	
对谭震林关于全国水旱灾害情况报告的批语.....	481
(1963年8月9日)	
关于印经典著作大字本的批语.....	482
(1963年8月14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八周年的电报	483
(1963年8月14日)	
在《光明日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上的批语	485
(1963年8月19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	486
(1963年8月22日)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488
(1963年8月29日)	
关于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的批语	491
(1963年8月29日)	
悼念杜波依斯逝世的电报	493
(1963年8月29日)	
关于越南南方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问题	494
(1963年8月30日)	
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的修改	499
(1963年8月、9月)	

1962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1]

(1962年1月3日)

感谢日本朋友，感谢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压迫和剥削而斗争的一切朋友，因为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我们处于同样的地位。美帝国主义欺侮日本人，欺侮中国人，可以说，全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就我们两国和附近一些国家来讲，我们的台湾受到美国控制，第七舰队就在那里；你们日本的许多军事基地是在美国控制之下的，美国在日本有军港，有空军基地，甚至海军陆战队也有基地；南朝鲜是美国控制，南越是美国控制，老挝是美国控制，泰国也是美国控制。此外，就连英国、法国也都受美国欺侮。

人民不信任美国的走狗。一切美国走狗都没有好下场。拉丁美洲有许多美国走狗，但是，人民都不信任他们。例如，大家都知道古巴的巴蒂斯塔^[2]，人民不信任他，把他赶走了。南朝鲜的情况也很值得研究，人民不信任李承晚，美国把他换掉，现在又换了朴正

[1] 这是毛泽东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谈话的主要内容。

[2] 巴蒂斯塔（1901—1973），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引起国内人民的反抗和武装起义。1959年他的独裁统治被推翻。

熙^[1]。朴正熙这些人对美国也不满，南朝鲜的七十万军队控制在美国手里，现在朴正熙等人争取到十几万军队脱离美国控制而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国被迫做了这样一个让步。美国控制得厉害，军权在美国手中，他们也不高兴。在台湾，美国想扶植蒋介石的反对派，以胡适为首，被蒋介石打下去了。蒋介石把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国军事顾问团不能到团以下去，只能在上面活动。蒋介石不让美国陆军在台湾登陆，他对美国说，你们来第七舰队、来空军就够了，我有陆军，你们还派陆军来做什么？在南越，吴庭艳^[2]也恐慌，只许美国派军事顾问团，不许派军队。蒋介石和吴庭艳是经常互相联络的，蒋介石告诉吴庭艳说，万万不能让美国陆军进入你们的国家，来了军队你就没有命了。泰国的沙立^[3]也不让美国驻军。泰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美国要在那建立军事基地，泰国不让。他们同美国之间还是有矛盾。因为他们沾上了美国的边，就臭了，人民就不信任了。美国看到人民不信任李承晚这些人了，就把他们换掉，情况就是这样。

西德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同日本相似，但是西德人民没有日本人民这样的反美、反帝、争取民主和平的强大潮流。西德垄断资本想勾结美国又想抗拒美国，这点同日本相像。我们把这些地方都称

[1] 朴正熙（1917—1979），1961年7月出任南朝鲜即韩国国家复兴最高委员会主席。1962年3月起，先后任南朝鲜即韩国代总统、总统。

[2] 吴庭艳（1901—1963），原南越傀儡政权“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1963年11月1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同其弟吴庭儒一起被击毙。

[3] 沙立（1908—1963），泰国前武装部队最高司令。1958年发动政变后上台，实行军事独裁统治。1959年2月任总理。还担任“反渗透特别委员会”及“国家安全和剿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

做中间地带。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去。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压迫者、剥削者、欺侮者。美国在中国、在日本、在各国的忠实走狗和美国一起，是矛盾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全世界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它们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同美国有矛盾，日子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日本的松村谦三^[1]、石桥湛山^[2]、高崎达之助^[3]等人，他们不大喜欢美国，同池田等有区别，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1] 松村谦三（1883—1971），日本前自由民主党顾问、众议员。1959年以后5次访问中国。中日恢复邦交前，他是日中贸易日方总联系人。1962年9月访华时同中国缔结日中综合贸易协定。1964年继高崎达之助负责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宜。

[2] 石桥湛山（1884—1973），日本前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首相。20世纪60年代初期多次任日中经济贸易展览协力会会长。1972年12月当选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顾问。1959年、1963年两次访问中国。

[3] 高崎达之助（1885—1964），日本自由民主党人，前众议员、参议员。20世纪60年代初期任日本内阁通商产业大臣、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审议会会长，积极促进中日贸易。1962年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同廖承志签订发展日中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



1962年1月，毛泽东接见日本友好人士安井郁夫妇。

法帝国主义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来讲不是同盟者，而是敌对者，是压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头上的压迫者，它有六十万军队在进行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战争。对非洲来说，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不是朋友。可以利用的一点是，它们同美国有矛盾。英、法在非洲和亚洲有殖民地和附属国，或者在那些形式上独立的国家还有强大的投资，美国想把英、法从这些地方挤出去，用新殖民主义者来代替旧殖民主义者。比如美国想取得阿尔及利亚，因为阿尔及利亚南部撒哈拉沙漠地带有很大的石油矿。法国正在那里开发，它的石油资本家集团同美国石油大王有矛盾。

你问古巴革命的性质，我认为，古巴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是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反对巴蒂斯塔集团、买办资本、封建主义的斗争。今后它走哪个方向还得看。它反帝、反封建是肯定的、坚决的。那里没有强大的民族资本，只有小型的民族工商业。这种情况就像当年日本统治下的中国东北一样。过去日本垄断资本在中国的东北不扶植中国民族资本，只建立为日本大工业加工的几十人、几百人的小工厂，所以日本人走后东北就没有像上海、天津、北京那样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形成这样一个阶级。法国在越南也是如此。日本在朝鲜也是这样，不让朝鲜人自己搞自己的工业，而由日本人自己搞了一些。中国东北的鞍钢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恐怕非洲也是这样，帝国主义不让本地人办大工业。比如在几内亚，只有几个大工厂，都是外国人办的。

很高兴看到日本人民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反对垄断资本压迫的斗争。日本人民反美日“安全条约”^[1]和反政治暴力行动法^[2]的斗争，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地发展，真令人高兴。祝日本人民的斗争在一九六二年有进一步的发展。我有一个直接的感觉，从一九五〇年开始，我差不多每年都见着日本朋友，感到日本朋友近几年的精神面貌同一九五七年以前有很大改变。在头几年，从你们脸

[1] 日美“安全条约”是1951年9月8日日本和美国在旧金山缔结和约的同时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1960年1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2] 指《防止政治性暴力行为法案》。1961年6月，日本池田政府为了进一步实施《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约》)，提出了《防止政治性暴力行为法案》。该法案于6月2日在日本众院法务委员会强行通过后，3日和6日，各有400万人在全国展开统一行动，反对这一法案。在人民强大压力下，池田政府于7日放弃在国会会议中强行通过这一法案的计划。

上看到有忧愁、有困惑，斗争的气概受压抑，不敢表现出来；以后，特别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以来，情况不同了，日本人民起来了，不怕美国了。美国压在你们头上，过去你们谨慎小心，近几年你们同它斗起来了。到中国来的日本朋友精神面貌的变化，反映了日本人民斗争情绪的增长和实际斗争的发展。

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不怕岸信介这个鬼了，不怕池田这个鬼了，日本人民的斗争信心加强了。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面向廖承志^[1]）有没有日文的？送他们每人一本。

[1] 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1949年至1959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

给黄炎培^[1]的信

(1962年1月6日)

任之先生：

一月五日惠书收读，甚为感谢！出去调查一番，必有益处。天寒，尚望注意珍摄。

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一月六日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给巴西总统古拉特的信

(1962年1月7日)

巴西合众国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先生阁下
亲爱的总统先生：

以罗伯托·莫雷那^[1]先生为首的巴西工会代表团在我国访问以后，即将回国。我趁他们回国之便，请他们带这封信给你，向你表示新年的良好的祝愿。

我至今十分愉快地回想起去年八月你访问中国期间我们所进行的友好谈话。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你在谈话中一再强调巴西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决心。在你离开中国以后不久，巴西人民掀起了一场保卫巴西独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巴西内政的斗争。中国人民十分关切地注视这场斗争，并且热烈地祝贺巴西人民所取得的胜利。

在你就任巴西总统以后，你不止一次地重申，巴西的外交政策是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且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样的外交政策首先对于制止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干涉和侵略，保证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发展，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的外交政策，也肯定地有利于促进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有利于维护世界和

[1] 罗伯托·莫雷那，当时是巴西瓜纳巴拉州木器工会的领导人。

平。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完全支持巴西的这种外交政策，并且将像过去一样，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巴西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不懈的努力。

总统先生，请接受我的崇高的敬意。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一月七日于北京

给李讷^[1]的信

(1962年1月9日)

李讷：

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祝你上进！

父亲

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

[1]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

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62年1月10日、24日，2月23日)

—

田家英^[3]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

[1]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是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的书面报告。报告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目前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是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第三部分是党的问题。这个报告已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1962年1月9日报送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月9日修改稿给他的信上写的批语。徐业夫的信中说：“这个报告，今天又作了修改。少奇同志指示，把这个报告在今天晚上送给主席一阅。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再过几个小时就送来。请主席看这个修改稿。”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1962年1月23日报送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修改稿第一部分的通知上写的批语。本篇三、四、五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修改稿第一部分的修改。本篇六是毛泽东在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月15日修改本上写的批语。本篇七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月15日修改本第14页上一段话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此两部分^[1]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在此三天内（一月十一，十二，十三），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2]报告的二十二大^[3]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毛泽东

一月十日上午十时

二

即送田家英同志：

在第一章中有几处^[4]作了一些修改。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用后退毛。

[1] 指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修改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2] 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3] 指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4] 见本篇三、四、五。

三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革命人民坚决地进行斗争，才能够推倒他们，而使人民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四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尼赫鲁^[1]之类的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演出一次新的反华大合唱。这个反华大合唱，很不得人心，很少听众，任凭他们怎样使劲地唱，归根到底，也不可能唱出什么大的名堂来。即是说，他们不可能阻止马列主义在世界上推广和发展，他们不可能阻止革命在世界上推广和发展，他们不可能阻止社会主义在中国和各国的发展。

五

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说，几十年的时间，不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完成。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六

少奇同志：

二月十七日的信及两个文件^[1]，均已看过，修改得很好了，即请你处理！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三日

人大会期，照恩来提议，以移至三月二十日报到，看两天文件，然后开大会一天，随即开座谈会。开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极为必要。

毛泽东又白

七

大家记得，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和一九五九年二月的两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了人民公社工作中的“一平二调”、平均主义等错误。他又曾尖锐地指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1] 2月17日的信，不详。两个文件，指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均已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各界人士欢度春节。



1962年，毛泽东和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一起。

给毛岸青^[1]的信

(1962年1月12日)

岸青儿：

寄来的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现在住院治疗，望遵医嘱，不要变方法治疗、休息。一切待今年上半年机会成熟时，就会解决的。我好，时有点小毛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忽〈勿〉以为念。

祝好！

父亲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二日

[1] 毛岸青，毛泽东的儿子。



1962年，毛泽东和毛岸青、邵华在一起。

给康生^[1]的信

(1962年1月12日)

康生同志：

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2]同志，他的和诗^[3]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近作咏梅词^[4]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作，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

请代问郭老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二日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2]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3] 指郭沫若1962年1月6日在广州作的七律：“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这是他读了毛泽东1961年11月17日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后写的。

[4] 指毛泽东1961年12月作的《卜算子·咏梅》一词。

对《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的批语

(1962年1月12日)

江青：

此件^[1]可以看一下，可以明白这个问题的历史情形。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时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62年1月10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增刊上登载的《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材料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提出列宁“遗嘱”，攻击斯大林“过于粗暴”“乱用职权”，说列宁“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那些不良的品质”“提出过应该研究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问题”。二十大后，公布了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1月4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区’问题”的记录。材料指出，所谓列宁“遗嘱”，就是指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这封信当时没有发表，列宁是准备把它交给他死后召开的那次党代表大会的。列宁逝世后，1924年5月23日至31日，俄共召开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申斥了托洛茨基在会前发表的“四十六人政纲”，也向各代表团宣读了列宁“遗嘱”。“遗嘱”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

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经过讨论，代表大会一致主张要斯大林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岗位上，并决定不公布这个“遗嘱”。此后，反对派不断利用列宁“遗嘱”，作为攻击斯大林和俄共领导的武器，并且造成一种空气，似乎俄共中央隐瞒了列宁的“遗嘱”。对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攻击，斯大林在他的著作里有过驳斥和说明。他在1927年10月23日写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一文还引用了“遗嘱”中讲到“斯大林太粗暴……”的一整段话。1927年7月，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会上提议，请求即将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撤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把列宁患病时写的信件（包括“遗嘱”）在《列宁文集》中公布，十五大通过了这个提议。查《列宁文集》，里面没有收入列宁“遗嘱”。材料还就以下4个题目作了资料摘录：（一）俄共十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等问题的指示作出决议；（二）俄共十三大宣读了列宁“遗嘱”，决定不公布；（三）托洛茨基利用列宁“遗嘱”攻击斯大林；（四）斯大林著作中有关列宁“遗嘱”问题的论述。

对《毛泽东军事文选》外文版 一条注文的批语^[1]

(1962年1月22日)

照办。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1] 这个批语写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2年1月10日给他的报告上。报告说：主席的军事文选，由编译局组织了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翻译，现已基本译完，大约在3个月内可以分别出版。为了适合外国读者的需要，我们增加了一些注释。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条件之一是地区广大，在小国进行游击战争的可能性便很小甚至没有。鉴于这批外文本主要是在亚、非、拉美各国发行，那些地区的国家，有的已经有过胜利的游击战争，有的还在进行或者可能发生这种战争，所以我们准备在这段文章的后面加一条注释，说明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已经同我国抗日战争所需的条件不完全相同，国家幅员大小，已经不是游击战争能否最后胜利的决定性的条件。这条注文已请康生看过，现在请主席审阅。

四言诗·开“出气会”^[1]

(1962年1月29日)

白天出气，
晚上看戏；
两千一稀，
大家满意。

[1] “出气会”，即七千人大会。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1月30日)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

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大会主席台上。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1]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

[1] 参见司马迁《报任安书》。

有益处，那就不得说了。



1962年，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接见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見，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

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交谈。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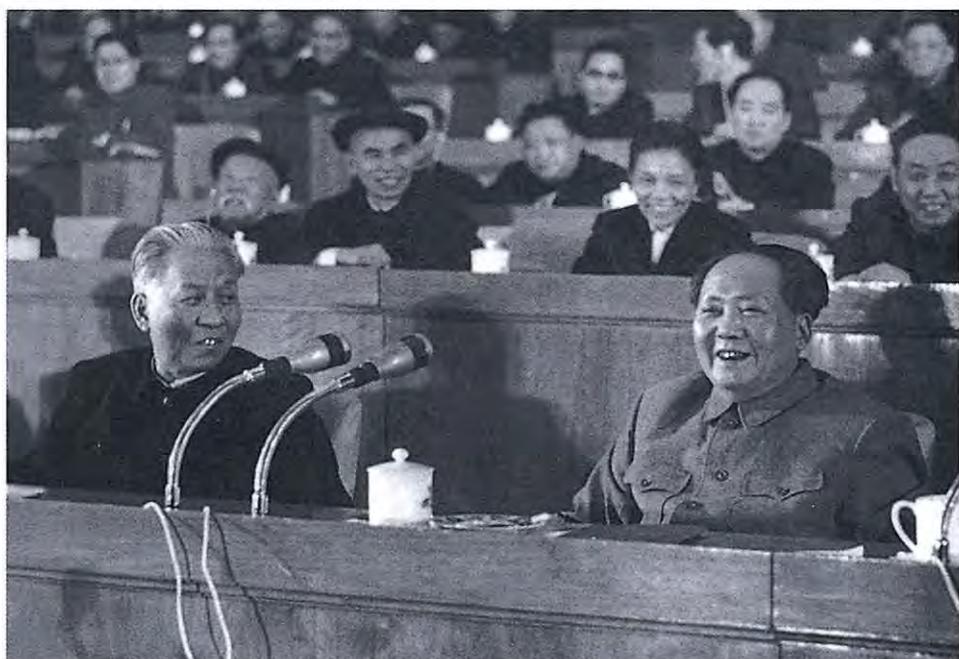
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

[1] 这段话引自毛泽东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全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大会主席台上。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

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

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1962年，毛泽东、李先念、乌兰夫、李富春在会议期间交谈。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

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1962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陈云在会议上交谈。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1]的时候那么厉

[1]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6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的错误。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

[1] 这四句话是1962年9月28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断。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他本人审阅同意，加进了这四句话。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评述毛泽东的错误时指出：“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百分之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

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

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

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〇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〇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〇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

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

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

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1]，工业企业七十条^[2]，高等教育六十条^[3]，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4]，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5]。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6]。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

[1] 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60条。

[2] 指中共中央1961年9月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70条。

[3] 指中共中央1961年9月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

[4] 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1961年6月提出、中共中央7月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5] 中共中央1961年6月19日下达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共40条。随后，中央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准备拟定一个比较全面的商业工作条例，1962年着手起草，后因故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6] 指教育部拟定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将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各地讨论和试行。

制定了一些条例^[1]。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几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

[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1961年6月19日命令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和同年11月17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

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1]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

[1] 八大二次会议，指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〇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

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

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1]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

[1] 五项原则，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

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干部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¹¹¹，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

[1] 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和其他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旋转，推翻约两千年来的地球不动学说。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1632年发表《关于托勒玫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支持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地动说，次年被罗马天主教法庭判罪。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

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变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⑩，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

[1]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1942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10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1946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

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

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对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 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1]的 批语和修改

(1962年2月11日)

—

田家英^[2]同志，并请告小平^[3]同志，刘、周^[4]：

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5]。苏联现在四十三年^[6]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

毛泽东

二月十一日于上海

—

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三十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

[1]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的主要内容有：一、近3个月来，全国各地普遍地进行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的结果表明，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完全符合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要求，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欢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已经势在必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很多好处。（1）能够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2）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有了很好的保障。（3）更适合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4）更有利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二、在全国各地农村，绝大多数的人民公社，都宜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就整个农村来说，人民公社的体制，又不应当强求一律。现阶段大体上将会存在两种形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或仍然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管确定哪一种形式，必须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办事。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一个长时期内，至少30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这个问题应向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反复说明。三、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生产队以后，人民公社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集体经济组织，公社内部仍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生产队仍然是生产大队这一级经济组织的组成部分。生产大队仍然在全大队范围内，实行统一领导，它成为各生产队的联合经济组织，既执行经济方面的职权，还要在公社的领导下，执行行政方面的职权。四、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农业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将主要从生产队体现出来。比起过去，生产队在财务管理和服务方面的权力是扩大了，生产经营方面的权力也有扩大，因此，它的任务也就更重大。它既要正确地规划生产，又要统一核算收支；既要做好生产组织工作，又要做好财务工作；既要积极完成国家的农产品征购任务，又要切实安排好社员生活。五、调整基本核算单位，是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妥善解决下列问题：（1）规模；（2）干部；（3）土地；（4）耕畜、农具；（5）大队企业；（6）林木；（7）水利；（8）债务。六、调整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应当争取时间，立即动手，宜早不宜迟。中央要求各地，力争在春耕开始前后，把这项工作大体做完。在改变基

本核算单位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做细致的工作。要有准备，有步骤。先经过认真的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分期分批，逐步推广。绝不能一哄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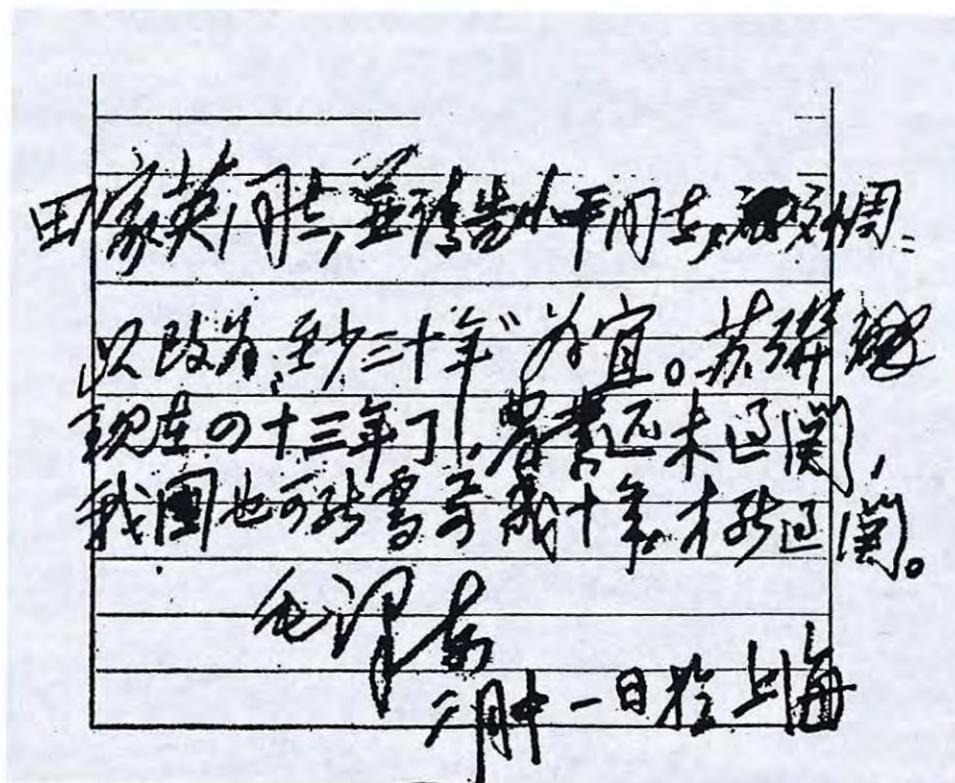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4]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5] 田家英1962年2月8日向毛泽东报送的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中，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为“例如四十年内”。田家英报送指示稿时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邓小平“主张把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成二十年。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请主席决定”。毛泽东将指示稿中的“四十年内”改为“至少三十年内”。见本篇二。

[6] 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算起，应为44年。



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时写的批语的手稿。

对邓小平^[1]报送的中联部 三个文件的批语^[2]

(1962年2月23日)

—

小平同志：

此件^[3]已看过。请你们先讨论一下，以初步意见告我。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还提不出意见。待三月中旬我到北京，同你们研究这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本篇一是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1962年2月14日信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对邓小平在王稼祥信上写的意见的批语。邓小平的意见是：“主席：这个文件送你先看。我们还没有讨论，主要是目前由我们建议召集国际会议，是否适当的问题。最好能将你的意见先告诉我们。”

[3] 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3个文件和王稼祥为报送这3个文件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中央的信。这3个文件是：（一）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1962年2月14日关于起草给兄弟党的信和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口信问题向王稼祥并中央的请示报告；（二）中共中央致兄弟党中央的复信稿；（三）中共中央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口信稿。刘宁一、伍修权的报告中提出，最近接到一些国家兄弟党的来信，其中有的建议召开兄弟党会议，我们考虑采取统一复信的办法，表示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既讨论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问题，也讨论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其他问题。这样，不管兄弟党会议开得成开不成，我党都处于主动地位。

个问题。

毛泽东
二月廿三日

—

我在研究此点。

对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1]的批语

(1962年2月24日)

邓小平同志：

全文看过，很好。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林彪、周恩来、朱德三同志的讲话^[2]，请紧催，速送来，看一下，以便早日印成一本，早日下达。

毛泽东又及

[1] 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62年2月6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这篇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2] 指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朱德在这次会议山东组会上的讲话。

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整理稿的批语^[2]

(1962年2月至4月)

一

田家英^[3]同志：

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如有三份，可以叫林克^[4]参加。如你身边有一份，就不要北京再送了。

毛泽东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五时

二

田家英同志：

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

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

毛泽东

廿六日上午四时半

三

田家英同志：

此件请印清样7份。最好今天印出交我。原稿还我。印时，校对清楚。

毛泽东

三月十日

四

田家英同志：

在第三页上加了一句¹⁵¹，请酌。

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下午二时二十分

五

照此付印，共印九份，分交刘、周、邓、彭、伯达^[1]各一份，请他们看一遍（刘、周、邓，请他们看第二遍），提出修改意见。另交田家英、林克、江青、毛泽东各一份存阅。印后板〈版〉折〈拆〉掉，原稿毁掉。

毛泽东
三月廿日

六

少奇、小平同志：

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2]读了一篇〈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修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3]同志处理。

毛泽东
四月七日下午九时

[1] 这个讲话1962年2月至4月整理修改后，同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2〕147号文件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

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1966年2月3日，毛泽东将这个讲话送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阅读，提出：“请考虑加以修改。”2月4日，王任重阅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对讲话文字方面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并说：“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引导这个高潮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主席在讲话中所指出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这是当务之急，也是经过‘四清’运动和领导干部蹲点之后，能够逐步做到的。”2月6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写了给彭真的批语：“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这个讲话经过修改后，又送毛泽东审阅。2月12日，毛泽东写了批语：“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同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6〕103号文件将这个讲话印发全党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中央在印发这个讲话的通知中指出：讲话“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地学习这个文件，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纠正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各种不良倾向”。1978年7月1日，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2]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整理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写给田家英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这个讲话整理稿的第一次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在这个讲话整理稿的第三次稿上写的批语。本篇四是毛泽东在这个讲话整理稿的第五次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五是毛泽东在这个讲话的第七次整理稿上写的批语。本篇六是毛泽东在陈伯达等修改的这个讲话整理稿上写的批语。

[3]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4]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5] 毛泽东在讲话整理稿第五次稿的第三页上“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这一段话后加写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一句。

[6]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7] 指陈伯达、胡绳、吴冷西、邓力群。

[8]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1962年，毛泽东在上海。

对《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 关于刘少奇同志报告的决议 (草稿)》的修改^[1]

(1962年2月)

—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地讨论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及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常委几个同志的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同志，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及这些讲话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对于过去四年工作中的伟大成绩和主要缺点、错误的估计，对于这四年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及这些讲话所提出的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和今后的奋斗目标。

—

会议一致认为，中央提出的加强集中统一、加强和恢复民主集中制、反对分散主义的方针，是很适时的，是完全正确的。

[1] 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文字。

对一个工人关于物价上涨的 来信的批语^[1]

(1962年3月4日)

先念^[2]同志：

请你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2年2月23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三期上。这一期登载了上海市工人金祥根1962年2月12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最近物价不断提高，真使人坐卧不宁。我们工人响应党的号召，节衣缩食，10多年来积蓄的一些钱，眼看着一天天地贬值，心里比刀割还难过，现在有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不想再储蓄了。为此，我提出两项建议：（一）政府尽最大努力稳住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存款采取保本保值的办法。

[2]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



1962年3月，毛泽东和湖南调查组全体成员在武昌合影。

对林彪^[1]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1962年3月20日)

—

田家英、罗瑞卿^[2]二同志：

此件^[3]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一) 是否应当送给林彪同志再看一遍，请瑞卿酌定。我意要送他看。如送，请瑞卿办理。

(二) 同时送少奇、恩来、小平^[4]三同志看一遍，并征求他们的修改意见。如有修改，到北京最后酌定。如无，即交尚昆^[5]办理，不要再送我看。

(三) 我在第一个问题部分，有一些小的修改^[6]，请你们酌定。

(四) 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上午九时

—

落后的国家能够变为先进的国家，……只要一个国家变成团结的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先进的领导，不要很长的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翻过来了。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3] 指林彪1962年1月29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修改稿。这个讲话谈两个问题：一、关于党的工作。林彪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而且情况已经在开始好转，今后必然会继续好转下去。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使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减少了，但我们取得了经验。全党来了个大学习，使我们党员、干部的质量和能力大大提高了。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我深深

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二、关于军事工作。林彪说，首先是对于战争的看法，现在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修正主义者一方面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战争不能避免，那就要毁灭全球。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定要爆发的。只不过是大战还是小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可能；世界上主要的大国参加的大战会不会发生，有两个可能，而小战就只有一个可能，一定要打。关于战争的前途，修正主义者认为战争要毁灭全人类；我们则认为战争的前途不是两个都消灭，而是一个消灭一个，我们胜利，敌人失败。我们对战争的方针，第一是不挑衅，不主动发动进攻；我们要争取和平，尽量推迟战争的爆发。第二是不搞单纯防御。就是说，我们不挑衅，你打来的时候，我打防御战；但是，我们不是打单纯防御的防御战，而是打进攻防御战，让你进到适当地点的时候，我们就向你进攻。先是你向我进攻，然后是我向你进攻。根据这种作战方针，我们就应该有一系列的措施，这种措施有军队应该做的，也有地方应该做的。现在主要讲军队本身应该怎样准备。庐山会议以后，军委一致的精神就是要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方针，处处按毛主席的意图、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向毛主席请示，向毛主席报告，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

[4] 少奇，即刘少奇。恩来，即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5]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6] 即本篇二，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对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整理稿的批语

(1962年3月21日)

周恩来同志：

此件^[1]由田家英^[2]同志主持，有罗瑞卿、谢富治、王任重^[3]及其他几位同志参加，集体读过两遍，作了一些小的修改。然后我又读了一遍，觉得很好。现送上，请酌定，即办。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一日

第八、第十两页中的问题^[4]，请着重研究一下。

[1] 指1962年2月7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4] 第8页中有一段叙述美国农业发展速度的情况，第10页中有一段对照美国来谈我国的煤炭、钢铁工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速度的问题。这两段文字经研究后，均已删去。

给邓小平^[1]等的信

(1962年3月25日)

小平、尚昆、冷西^[2]同志：

林克^[3]下放，我这里缺少一个替我看国际资料的人，也没有人帮助我读英文了。因此，请你们替我从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及翻译同志们中，找一位适当的人。年龄不要太大，以25—28岁之间、又有过翻译英语新闻一段经验的为宜。又是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又性格较温和，说话不甚刺耳。英文程度，有中等水平即可。说明初来只是试用，如不行，仍回原职。他作林克的助手，林克回来，他就下放，他回来，林克再下放，如此循环下去。还有，要能保守机密。

此外，我这里的两位秘书，文化、政治水平都低，不能很好地替我阅选内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见，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众工作中有过实际经验的。如能找到，也要讲明试用，不行另换他人。至于“收发”性质的秘书，有一人够了，可以减去一人。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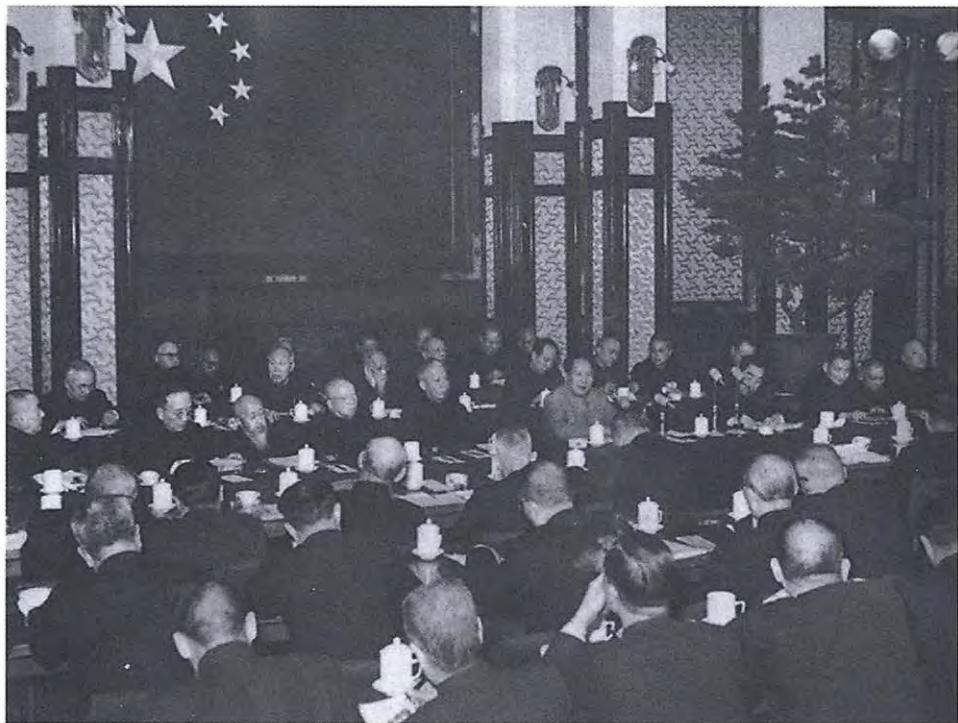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3]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以上两事，请你们费心一办为盼！

毛泽东

三月廿五日



1962年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等祝贺中捷友好条约 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1962年3月26日)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威廉·西罗基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德涅克·费林格同志：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五年前，中捷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捷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一个重大的发展。这个条约的签订，不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而且对促进两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后还将继续起着积极作用。

中捷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向珍视中捷两国的友谊和团结。在未来的岁

月中，我们将始终不渝地为巩固和加深中捷两国的友谊和团结而努力。

祝中捷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3月26日于北京

祝贺野坂参三^[1]七十寿辰的电报

(1962年3月28日)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野坂参三同志：

您是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的久经考验的坚强不屈的战士，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的朋友。我以个人的名义，为您的光荣的七十寿辰，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在这个时候，您从远道来到了延安，同我们一起。您代表了日本人民的利益，代表了日本共产党人的意志，认为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是日本人民自己的敌人，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您不断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黑暗统治的真象〈相〉，指出了日本人民应该走的道路。您当时所写的政论，教育了日本人民，也帮助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您回到自己的祖国，同日本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为团结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占领者，摆脱美帝国主义者加给日本民族的枷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和持久的斗争。

[1] 野坂参三，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美帝国主义是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在反对这个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中日两国人民的团结发展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加深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相信，坚决以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终归是要失败的。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不论还要经过多少曲折和困难，日本人民终归要赢得胜利，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爱国者坚持的正义事业终归要赢得胜利。

当您七十寿辰的时候，我为您祝福，同时也为日本人民祝福。
致以兄弟的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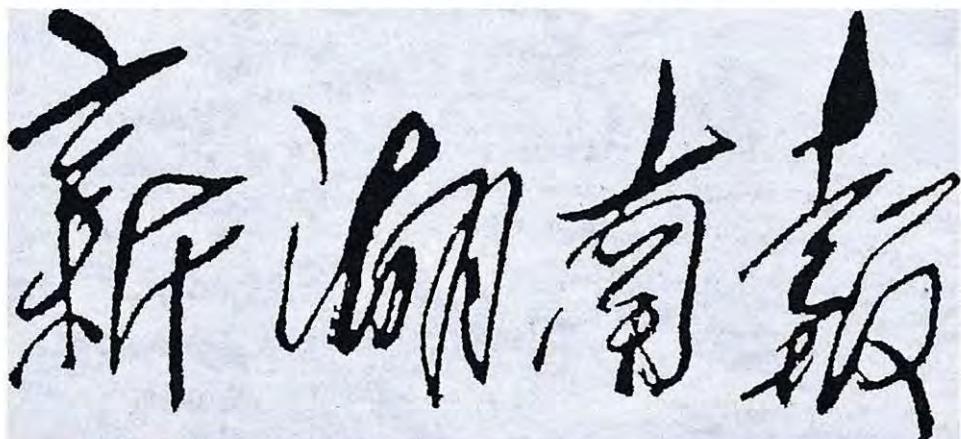
毛泽东

1962年3月28日

为《新湖南报》题写报头^[1]

(1962年3月)

新湖南报



毛泽东第二次为《新湖南报》题写的报头。

[1]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为《新湖南报》题写报头，启用于1962年4月4日。



1962年3月，毛泽东、宋庆龄、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参加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



1962年3月，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阿沛·阿旺晋美。



1962年3月，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二楼向楼下代表致意。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 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2年4月3日)

布达佩斯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在匈牙利解放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一年来，兄弟的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为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进行了忘我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且真诚地祝匈牙利人民继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中匈两国是社会主义兄弟之邦。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因此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将同匈牙利人民一起，为加强中匈两国的团结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争取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

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胜利而继续奋斗。

祝中匈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4月3日

对中央转发财贸办公室关于财政信贷 报告^[1]的指示稿的批语

(1962年4月12日)

即送总理^[2]:

此件及附件、附表^[3]，均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发出。

毛泽东

四月十二日

附件、附表留我处备再阅。

[1] 指中共中央1962年4月12日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3月25日关于1961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1962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的指示稿。指示说，中央批准财贸办公室的这一报告，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平衡收支、消灭赤字的各项措施。请立即照此布置，坚决贯彻执行。中央认为，当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比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时的估计，还要更大一些，这是当时所没有完全估计到的。全党必须下定决心，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包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紧缩企业、事业、行政费用和国防费用，增加某些高价商品，以便完全消灭赤字，真正达到收支平衡。按照这次批准的1962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今年我们可以用的钱只

有这么多。各地方、各部门必须按照中央批准的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迅速地落实到每个用钱单位，逐级负责，层层控制，只许减少，不许增加。报告对4年来的财政收支作了初步检查，揭开了4年财政收入有虚报、年年有赤字的实际情况，这于认识困难，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很有好处。报告中提出资金分配的排列次序，先安排生产和流通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和信贷资金，再安排基本建设资金。这个原则是正确的。

[2] 总理，指周恩来。

[3] 附件，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962年3月25日关于1961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1962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分三大部分：一是1961年国家预算、信贷计划执行情况和4年来财政的简单回顾；二是1962年财政信贷指标的安排；三是执行1962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的几点意见。附表有3个：一是1962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调整表（草案）；二是1962年信贷收支计划表（草案）；三是1962年现金出纳计划表（草案）。

毛泽东等祝贺金日成五十寿辰的电报

(1962年4月14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亲爱的金日成同志：

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我们谨向你——朝鲜人民敬爱的领袖、中国人民热爱的朋友，致以真诚的、热烈的祝贺。

几十年来，你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献给了朝鲜的独立、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朝鲜的实际。你领导着英雄的朝鲜人民，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前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坚定地捍卫着远东和世界的和平；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重大的努力。

作为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和亲密战友，你一贯为加强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而不遗余力。在中国人民困难的三十年代里，你亲自率领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女，用鲜血支援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朝鲜卫国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你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崇高精神，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我们两国人民热

情奋发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中，你又不断地为增进中、朝两国的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关系作出宝贵的贡献。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结起来的，中朝两党两国的团结像钢一样的坚固。中朝友谊与日俱增的发展，同你的巨大努力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民以有你这样真诚的朋友而自豪，并且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

衷心地祝你健康长寿。祝你在领导朝鲜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4月14日

关于研究苏联《教师报》发表的 一篇文章的批语^[1]

(1962年4月16日)

康生^[2]同志：

请研究一下这篇文章^[3]，是对还是错？以其结果告我。可找几个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1962年4月15日编印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第一〇一〇期的目录页上。这一期摘引了苏联《教师报》发表的《同志们，想一想这点！》一文。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3] 指苏联《教师报》发表的题为《同志们，想一想这点！》一文。文中说：苏联学校在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落后于实际生活的要求，培养了没有劳动训练、不能创造财富的人。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实行劳动综合技术教育方面起了消极作用，到1937年，学校工场关闭了，教学计划中的劳动课也取消了，这显然离开了教育和培养青年的列宁主义立场。本来在教育工作者中应当进行关于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的讨论，遗憾的是，有些同志不十分关心这种讨论，教育科学院理论刊物对此也避而不谈。人们在期待着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和教育科学院把教育思想引上同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后果作具体斗争的道路。但是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还不够明显。

关于修改六首词^[1]给陈白尘^[2]的信

(1962年4月24日)

陈白尘同志：

请你斟酌修改，然后退我，你为何不给我认真地修改一次呢？要我写字，似乎可以，你们的刊物五月几时出版，几时交稿呢？请告为荷。

毛泽东

四月廿四日

[1] 指《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采桑子·重阳》（1929年10月）、《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年2月）、《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7月）、《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夏）。这6首词后来在《人民文学》1962年五月号上发表。

[2] 陈白尘，当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

给臧克家^[1]的信

(1962年4月24日、27日)

—

克家同志：

数信收到，甚为感谢！同时在两个刊物发表，不甚相宜，因为是《人民文学》搜集来的。^[2]另有几首，可以考虑在《诗刊》上发表。《诗刊》五月号何时排版，请告确期。

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
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

毛泽东

1962年4月24日

—

克家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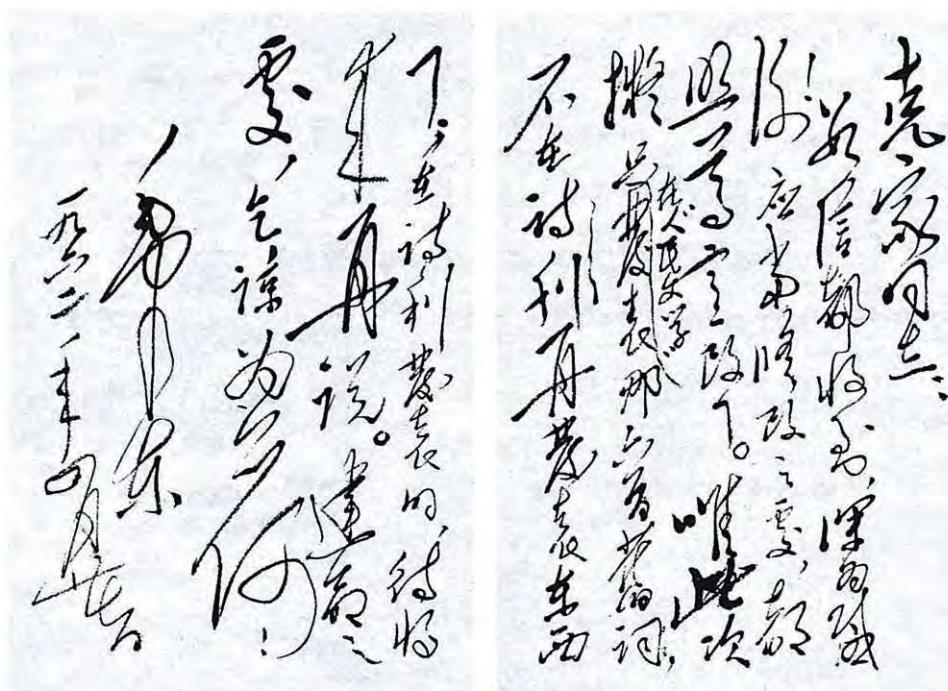
[1] 臧克家，当时任《诗刊》主编。

[2] 指《人民文学》编辑部同志搜集的毛泽东过去写的诗词10余首。1962年4月，毛泽东从中选了6首词，略加修改后，交给《人民文学》发表。

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唯此次拟只在《人民文学》发表那六首旧词，不在《诗刊》再发表东西了。在《诗刊》发表的，待将来再说。违命之处，乞谅为荷！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七日



毛泽东致臧克家信的手稿。

《词六首》序一^[1]

(1962年4月)

这六首词，年深日久，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起来，要求发表，^[2]因以付之。回忆了一下，这些词是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作为史料，是可以的。

[1] 这是毛泽东为《词六首》在《人民文学》1962年五月号发表所写的序，后未发，改刊了另一则较短的序。

[2] 1962年1月15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最近我们辗转搜寻，找到了您的几首诗词。正因为是辗转搜寻到的，所以不知是否有讹误，也不知您是否愿意将其发表，或者是不是还需要修改，因此抄寄一份给您，请您指示，并请注上题目和写作年月。”

《词六首》序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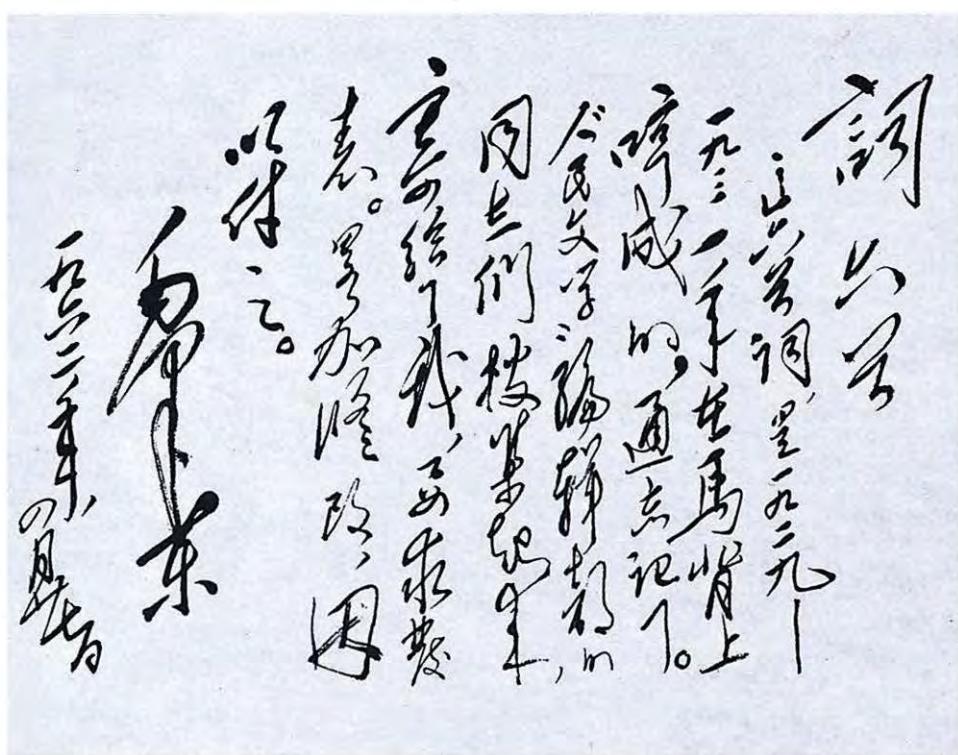
(1962年4月27日)

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七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人民文学》1962年五月号发表《词六首》时所写的序。



毛泽东为《词六首》写的序言。

关于赛福鼎^[1]是否回新疆 工作问题的批语^[2]

(1962年4月27日)

总理：

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斟〈酌〉定。

毛泽东

四月廿七日

[1]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北京工作。

[2]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送阅、统战部转报的赛福鼎对解决北疆群众外逃问题的意见上。赛福鼎在意见中说，同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对塔城等地部分群众外逃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处理的意见，提出必要时让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是会有帮助的。毛泽东批示后，中央即决定赛福鼎回新疆工作。

在一篇谈中苏分歧及西方对策的文章^[1]上的批注^[2]

(1962年4月)

[1] 指新华通讯社1962年4月4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四三〇期（增刊）摘译的《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茨3月25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西方在逐渐明白共产党的分裂的影响》。文章说：美国政府只是在过去几个月才开始认识到中苏分歧包含的“严重危险和大好机会”。目前需要的是制订“最成熟的美国的政策”。美国应准备找寻“同共产党政权利益一致的某些方面”，并谋求建立一个日益接近于我们在成立联合国时所预见到的那一种世界。美国必须对各国共产党国家加以区别，不是把它们当作一个清一色集团的一部分，要采取步骤，对苏联执行在“坚定的基础上奉行友好”的政策，继续孤立中国。西方有必要继续改进它的军事地位，以便转而帮助赫鲁晓夫，支持他向毛泽东提出的论点。西方应参加共产党内部关于马列主义前途的讨论，不应只限于进行“消极的批评”。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中《谈西方对策》一节所写的批注。所说“八条”是毛泽东对文中关于西方在奉行与苏联友好政策方面能做些什么所提建议的归纳：(1) 肯尼迪的空间合作建议；(2) 美苏领导人互相发表电视演说；(3) 肯尼迪访问苏联；(4) 承认外蒙古；(5) 不把核武器给西德；(6) 劝阻南斯拉夫或希腊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7) 向波兰和捷克保证承认它们同德国接壤的边境；(8) 给东欧国家经济援助，而不像目前那样只援助波兰和南斯拉夫。本篇二中“矛盾”二字写在下面一段话的旁边：“西方对共产党的倡议作出软弱的反应，就会鼓励俄国人提高要从冒险中得到的好处，并且使赫鲁晓夫丧失他一直用来对付毛泽东的这一理由：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很大的。相反的，西方具有实力将使赫鲁晓夫得到他所需要的理由，使毛泽东和其他同样想法的共产党人相信，世界战争的危险比他们设想的要大。”

—

八条都是攻势，暴露修正主义于世人面前

—

矛盾



1962年4月28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青联第四届委员合影。



1962年4月28日，毛泽东接见全国青联第四届委员。



1962年5月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

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和妇女代表团的谈话

(1962年5月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们是来自友好国家、友好政府的代表团，欢迎你们。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我们与所有非洲国家人民的关系都是好的，不管是独立或没有独立正在斗争中的人民。非洲正出现一个很大的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非洲有多少人口？二亿吧？二亿人民要翻身，不管已经站起来或者将要站起来。还有拉丁美洲也是二亿人口，亚洲的十几亿人口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我们不是孤立的，到处都有我们的朋友，你们也不是孤立的。你们来中国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是十分欢迎你们的。来了几天了？

凯塔（几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以下简称凯）：我们是四月十九日来的。

毛：她们呢？（指妇女代表团）

凯：她们是四月二十五日来的。

毛：听说你们明天要走了。

凯：她们不走。

毛：欢迎。他（指柯庆施）是上海的主人，柯庆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你们是民主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样，对吗？

柯庆施（以下简称柯）：你们为何不多住几天？

凯：我们的日程排得很紧，国内工作很多，5月15日以前要完成改组党的各级机构，如有时间，我们很愿意在中国访问一个月。

毛：你们的党是很好的党，是个联系群众的党，有纪律的党，是一个有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建立民族经济作为纲领的党，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领导的党。我们感到同你们是很接近的。我们两国、两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你们不搞我们的鬼，我们也不搞你们的鬼。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没有这种人？

凯：没有。

毛：如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

凯：有些国家的技术人员有这种情况，中国专家没有这种情况，他们都工作得很好。

毛：是不是有比你们几内亚专家薪水高、特殊化的情况？（对叶□□说）恐怕有，要检查，待遇要一样，最好低一些。

叶□□：周总理正在要方□同志检查。

凯：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但直到现在中国专家并没有过分的要求，有些国家的专家要比几内亚专家高两三倍，相反，中国的专家没有过分的要求。

毛：驻几内亚大使是谁？是柯华吗？（旁人答：是的。）

凯：只有中国专家和越南专家待遇一样。

毛：是否有人损害你们的民族利益？搞颠覆活动？

凯：有，但不是中国人。对搞颠覆活动的人，我们也不是听任他们去搞的，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要迅速采取措施加以回击，我们

不愿意做人家的尾巴。过去发生的事件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对这些事件的态度你们也是知道的。

毛：你们做得对。凡有人在你们那里称王称霸，不服从你们的法律，搞颠覆活动，应把他们赶掉。我们希望你们站住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经济上站住脚，不要被人颠覆掉了。你们站住脚我们高兴。你们倒台我们不高兴。因为你们是一个革命的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在非洲有很大的影响。经过你们，可以在非洲许多国家做工作，使他们得到解放。你们也有这个责任，不要自己独立就不管别人了。我们也一样，不能因为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了。所谓管别人是指友好的支持、帮忙。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还有些困难，能帮的忙不大。再过五年、十年我们的情况可能好一些，那时的帮助可能多一些。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而是能够克服的，正在采取措施克服。我国的经济、文化与你们差不多，差不多是在没有什么遗产的情况下搞起来的。你们是法国的殖民地，我们是几个国家的殖民地。你们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了吗？

凯：关于跟法国建交的问题，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们独立后与法国双方互派过代表，进行过谈判，想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至今还未解决，我们希望能够解决。

毛：你们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好吗？

凯：好的。

毛：与马里呢？

凯：非常好。

毛：与索马里呢？

凯：差一些，还没有外交关系，往来较少。

毛：与加纳呢？

凯：好的。

毛：与摩洛哥和突尼斯呢？

凯：跟摩洛哥和突尼斯也好，但有些不同。非洲有两个不同的集团，即卡萨布兰卡集团和蒙罗维亚集团。

毛：蒙罗维亚集团？

凯：卡萨布兰卡集团是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马里、利比里亚和摩洛哥六国集团。蒙罗维亚集团是过去非洲马尔加什联盟的国家。卡集团较进步，蒙集团不大进步，与殖民主义联系较多。

毛：蒙集团是否属于法属共同体？

凯：是的。我们与卡萨布兰卡集团关系好一些。跟蒙罗维亚集团的有些国家，如塞内加尔、利比里亚、象牙海岸等国，边境相连，遭遇和问题都差不多。我们认为非洲分为这样两个集团并不符合非洲人民的利益，所以杜尔总统向所有非洲国家采取外交措施，提议召开非洲国家首脑会议，5月要开会，要协调相互的立场，取得一些共同点，取得合作。正如主席所说，进步力量应该支持邻国人民，非洲许多国家与殖民主义势力有联系，与欧洲共同市场有联系，而不是与兄弟的邻国有联系。我们预备开讨论非洲共同市场问题，以便发展非洲自己的经济，摆脱非洲殖民主义势力的控制。非洲所有国家首脑会议5月份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如果几内亚提议的非洲首脑会议有结果，可以使非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毛：非洲国家要联合，另外还要一个更大的联合，即亚、非、拉美三大洲的联合。

凯：我们也意识到这种大联合的重要性，因此首先非洲国家自己要联合，以便在大联合中起积极作用。我们不少非洲国家正在受痛苦，还在受殖民主义的痛苦，特别是经济上受新殖民主义的痛苦。要实现大联合，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毛：几内亚有多少人口？

凯：几内亚国家很小，有四百万人口。

毛：土地面积多少？

凯：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十二人到十三人。

毛：很大的土地，有很大的发展前途。有森林吗？

凯：很多，特别是矿产的前途很大，我国有丰富的铁矿、铝矿、铬矿，是非洲矿产最丰富的国家，还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可以用来发电，以便在当地自己提炼矿砂。

毛：听说你们在建造一座大水坝？

凯：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法国人已有此计划。法国想在孔库雷河上建造一座大水坝，每年可发六十亿度的电，用此电力提炼铝。法国组织了国际公司，并与国际银行建立了关系，以便取得资金。1958年几内亚独立了，法国认为不安全，就放弃了这个计划。独立后，几内亚政府想搞，苏联原则上同意与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援助几内亚建设水坝，但现在苏、几政治关系复杂化了，恐怕不准备搞了。

毛：还没有搞吗？

凯：没有搞，杜尔总统访华时经过莫斯科，苏原则同意援助，但至今没有动静。

毛：听说有个货币问题，解决了没有？

凯：我们在1960年建立了几内亚法郎，目的是退出法郎区，建

立独立的货币区。这种法郎不能兑换外币，以避免殖民主义者掌握大量几内亚货币兴风作浪。但有些邻国以几法郎投机，他们从几带出大量货币，换美元和英镑，或以低于官价出售几法郎，压低币值，或贩运货物到几内亚来换取几币搞投机。所以几政府在今年4月决定取消旧币换新币，在外国的旧币一律作废。

毛：你们自己能印钞票吗？

凯：不能。

毛：在哪里印呢？

凯：起初在捷克，最近一次在英国印。现在正设法自己弄到印钞票的机器，以便保证不断地印自己的钞票。

毛：几内亚妇女有选举权吗？

卡玛拉（几妇女代表团团长，以下简称卡）：有的，在党内、政府内都有。

毛：党里有妇女领导人吗？

卡：党的街道委员会、村委员会和省委员会都有妇女领导人，恩迪阿依、贡代二位都得到了独立勋章。

毛：你们的革命是群众性的，党也是群众性的。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女的太少了，女的有，但比例是男的多、女的少，地方党委也是如此。你们走在我前面去了。

凯：我们的比例也少，十七个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两个女的，政府中只有一个部长是女的，就是卡玛拉夫人。我们那里也仅仅是开始，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妇女受到双重压迫，不仅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而且男女不平等，女的上学机会不多，革命胜利后男的还有封建思想，女的积极斗争，现在有女的市长、村长等。

毛：慢慢来。

凯：她（指卡玛拉夫人）想一下子解决问题。

卡：他想阻拦。（全场笑）

毛：我们与你们的情况差不多，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同你们谈得来，没有感到我欺侮你，你欺侮我，没有什么优越感，都是有色人种。有人想欺侮我们，认为我们生来就不行，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命运注定了，一万年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会管理国家，不会搞工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科学文化也不行。他们不想一想，这种状况是他们造成的，经济、文化水平低是他们造成的。管理国家过去是他们代替我们管理的。本国人讲管理是可以的，但要学，学多少年，慢慢来，可是你们不是慢慢来，而是一下子就取得政权，我们也是，夺取了政权再学嘛！不会管理慢慢就会管理了，有错误就改嘛！难道只有我们有错误，西方国家没有错误？他们的错误比我们更大，他们犯了反革命的错误。我们根本上没有错误，我们是革命。没有工业可以逐步搞工业，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可以逐步搞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文化水平也能一年一年提高，例如地质人员，你们现在开始有了吗？

凯：以前的地质人员都是别国的，现在有许多几留学生在别的国家培养。

毛：我们国民党、蒋介石遗留下来的地质人员只有二百人，现在十三年来有了十几、二十万人。（问柯庆施：各省都有吗？柯说：有。）能搞起来的。难道只有西方国家能搞，我们就不能搞起来吗？

凯：杜尔总统也认为争取独立首先要自己相信自己，管理国家也是一样。只有打铁，才能成为铁匠，只有学了才会，管理国家慢慢能学会。如1958年独立时，几学生只有三万二千人（指在学校

的)，现在有十二万。

毛：增加了三倍多。你们过去可能没有大学。

凯：没有，很少有机会上大学，上大学要到巴黎去。当时殖民主义者对培养当地的干部没有兴趣，只有二百个大学生，现在有一万五千个大学生，各省都有。

毛：比例不小，四百万人口中有一万五千人。

凯：现在科纳克里正在搞技术高等学校，培养地质、农业等技术人才。一方面继续向外国派，另一方面尽量在国内培养高等学校的学 生，使能适合本国的条件。

毛：今晚你们有何活动？

柯：晚上我们要举行宴会欢迎他们。

毛：他（指柯）是主人了，我们这就告一段落，好吗？

凯：我们没有别的话。在北京已与许多负责同志讲过，现再一次向主席表示：几内亚对于中国的友谊和合作寄以极大的希望，对中国为几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这次谈判印象很深，中国政府领导人很谅解我们，谈判进行得顺利，得到了积极的成果。再一次表示两国关系是巩固的，代表几政府和人民向主席表示感谢。

毛：我们感谢你们，这是互相支持，我们很抱歉，不能完全满足你们的要求。

凯：你们已尽了你们的能力。非洲有句话：援助的方式比援助的东西更重要。

毛：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友好、坦率、诚恳、不讲假话，讲老实话。以后继续往来。你们来过中国吗？

凯：他们都是第一次，我1960年陪杜尔总统一起来过，到过北京、武汉、广州、上海等地。主席在北京接见过我们。到上海时柯

市长举行了宴会，我们还参观过上海汽轮机厂，宋庆龄副主席在上海接见了我们。

毛：你们回去后替我问候塞古·杜尔总统，问候你们中央的各位领导人，祝他们好。

凯：在我们离开这儿前，再一次祝主席身体健康，祝主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 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2年5月8日)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威·西罗基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七周年的時候，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謹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一年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作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新的成就。我们衷心地预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继续取得新的胜利。

中捷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和加强，对促进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起着积极的作用。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致力于巩固和发展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中国人民将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道，为

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维护世界和平和争取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而继续奋斗。

祝中捷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5月8日

代拟的给陈宗娥的信^[1]

(1962年5月12日)

宗娥：

你1961年6月27日给我的信，我于今天早上才收到。在北京压了十个半月，真是岂有此理！至于你说，去年三月有信，则至今未收到，正在查询。我已两年不在北京了，患了重病，不习北方气候。现病略为好些，忽〈勿〉以为念。闻你如此重病，又如此困难，心极不安。今送上五百元，以济眉急。如有所需，望随时告我。有病不要性急，越急越坏。安心治疗，是为上策。有信请写：北京中南海17支局109号信箱徐业夫^[2]同志收转江青。祝你健康！

云鹤^[3]

1962年5月12日

[1] 这封信是以江青名义写给曾在毛泽东家做过保姆的陈宗娥的。

[2] 徐业夫，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3] 云鹤，即李云鹤，江青的原名。

关于不参加苏联东欧七国领导人 会议的批语^[1]

(1962年5月15日)

总理：

同意你的意见^[2]，不派代表。是否应以我们的态度，告诉朝、越、蒙三国，请你酌定。

毛泽东

1962年5月15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2年5月12日送毛泽东审阅的对外交部5月10日关于不参加波兰倡议举行的苏联、东欧七国领导人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件上。外交部报告说：波兰驻华大使5月6日拜会周总理，面交波兰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和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邀请我党和政府派相当级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由波党与苏共协商后倡议举行的保、捷、德、波、罗、匈、苏七国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会议。会议目的在于讨论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问题。会议将于本年5月31日起在莫斯科举行。波方希望我将对此事的答复告波兰及会议东道主苏共中央。根据来信，这次会议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参加。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国不宜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建议以毛主席和周总理名义函复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予以谢绝，并指出他们排除阿尔巴尼亚于会议之外是不对的。信件拟由陈毅副总理交波兰驻华大使，并将信件副本交苏联驻华大使转交他们的党和政府。

[2] 指周恩来1962年5月12日对外交部请示报告的批示。

对中央转发财经小组关于讨论 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1]的 指示稿^[2]的批语

(1962年5月24日)

退总理，照办^[3]。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1] 中央财经小组1962年4月30日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说，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今年计划调整方案，着重注意了以下4点：（一）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产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二）尽可能地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品的生产。（三）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实际的可能，降低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到20%。（四）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工作量从原计划的60.7亿元降低为46亿元。这样调整的结果：196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从原计划的1400亿元降为1300亿元；工业总产值从950亿元降为880亿元，其中，生产资料总产值从550亿元降为470亿元，生活资料总产值从400亿元上升为410亿元；农业总产值从450亿元降为420亿元。农业总产值基本上是根据中央2月16日下达的粮食2885亿斤、棉花2063万担等主要指标估算出来的。但是，最近各

地报来的粮食和棉花的计划数字，都比上述数字低。今年的农业总产值能否有420亿元，要看春耕、夏收和中耕的情况，才能得出比较恰当的估计。

[2] 中共中央1962年5月转发中央财经小组这一报告的指示稿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7日到11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并且决定：在县委第一书记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干部中，口头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方针；地委第一书记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干部，到省委和中央各部委去阅读中央财经小组的书面报告。军队中传达和阅读的范围，由总政治部比照这个规定办理。中央认为，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我们对于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对于克服困难的快慢，从总的方面，可以说认识清楚了。但有一些具体的困难还没有认识清楚，今后也还可能出现一些现在没有预料到的困难。为了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逐步地克服困难，全党目前必须抓紧的主要工作，一是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坚决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一是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领导，加强各方面，特别是工业对农业生产的支援，巩固农村的集体经济。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把主要的领导力量分为两部分，在统一的领导下，一部分人抓精简工作，一部分人抓农村工作。中央的指示和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1962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2〕254号文件发至各部委党组、各省市区党委。

[3]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2年5月19日在报送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这一报告的指示稿时，写了一封信，请李富春阅后即送毛泽东审批。信中说，财经小组报告的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家英或林克以电话告杨尚昆办。

对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 〈词六首〉》^[1]的修改^[2]

(1962年5月)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事。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阙一次，第二阙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3]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4]告诉我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5]，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6]，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日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

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1]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他1962年5月1日写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刊载于《人民文学》同年五月号。这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毛泽东的《词六首》。

[2] 郭沫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有一段话说：“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至娄山关是七十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阙写的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阙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阙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风，也隐喻着受着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在这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呜咽，气氛是悲壮的。但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词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面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赳赳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

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或许有人会问：一首词中所说的一朝一夕为什么所表示的不是一天？这在我们中国的诗歌中倒并不是稀罕的例子。例如屈原的《离骚》里面便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或‘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所谓朝夕都不限于一天。”毛泽东阅后将这段话全部删去，改写成本篇的文字。

[3] 指1962年2月初在广州召开的诗歌座谈会。

[4] 指毛泽东。

[5] 过去有一种说法，遵义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1935年1月9日召开的。前些年，经过考证确定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这样中央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是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而不是在遵义会议召开以后。

[6] 刘湘，1933年任国民党军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34年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

给邵华^[1]的信

(1962年6月3日)

你好！有信^[2]，拿来，想看。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3]一篇，要多读。余不尽。

父亲

六月三日上午七时

[1] 邵华，原名张少华，毛泽东的儿媳。毛泽东写给她的这封信无上款。

[2] 指毛岸青、邵华各自写给毛泽东的信。

[3] 《上邪》，乐府汉《铙歌》十八曲之一。上，指天；邪，通“耶”，语气词。上邪，指天为誓的意思。其词为：“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1962年，毛泽东和毛岸青、邵华等在中南海家中。

应抓紧对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1]

(1962年6月8日)

在科学的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1] 这是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汇报工作时谈话的部分内容。

对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1]的修改和批语

(1962年6月11日、12日、18日)

—

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因此，全国军民，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及其纵深地区的军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随时迎击蒋匪帮的窜犯。

—

林克：

昨晚修改的稿件^[2]，应请少奇同志召集常委各同志及彭真、瑞

[1] 这篇电讯稿1962年6月18日先以内部电报发给各级党委，6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题为《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

[2] 指新华社关于蒋介石匪帮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的电讯稿，修改情况见本篇一，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文字。

卿、肖华、定一、冷西^[1]各同志，全文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上午三时

三

各级党委：

现将准备发表的为着揭露蒋匪帮军事冒险计划的新华社新闻电稿一件，先用内部电报发给你们。望即据此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至于何时公开发表，中央将按照情况需要决定。

中央

六月十八日

(此件发至县级及团级)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民兵工作要做到 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1]

(1962年6月19日)

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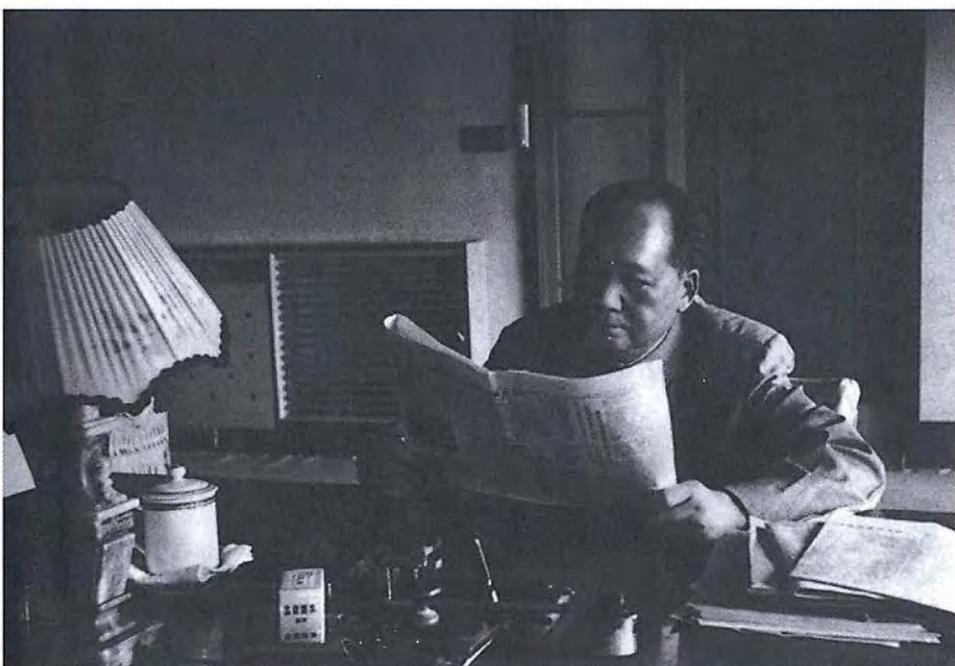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对广州军区负责人的指示。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军事问题时指出：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组织，就是有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有战士，有班长，有排，有连，要有兵有官。政治，就是要做政治工作。有政治部，有政委，有教导员，有指导员，做人的工作。要讲清楚，打起仗来不要慌张，一慌张还能打仗？无论是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军事，就是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趁和平时期，要搞点枪，基本的是每省要搞一个兵工厂。



1962年6月21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团长朴金喆。



1962年6月21日，毛泽东在武汉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



1962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看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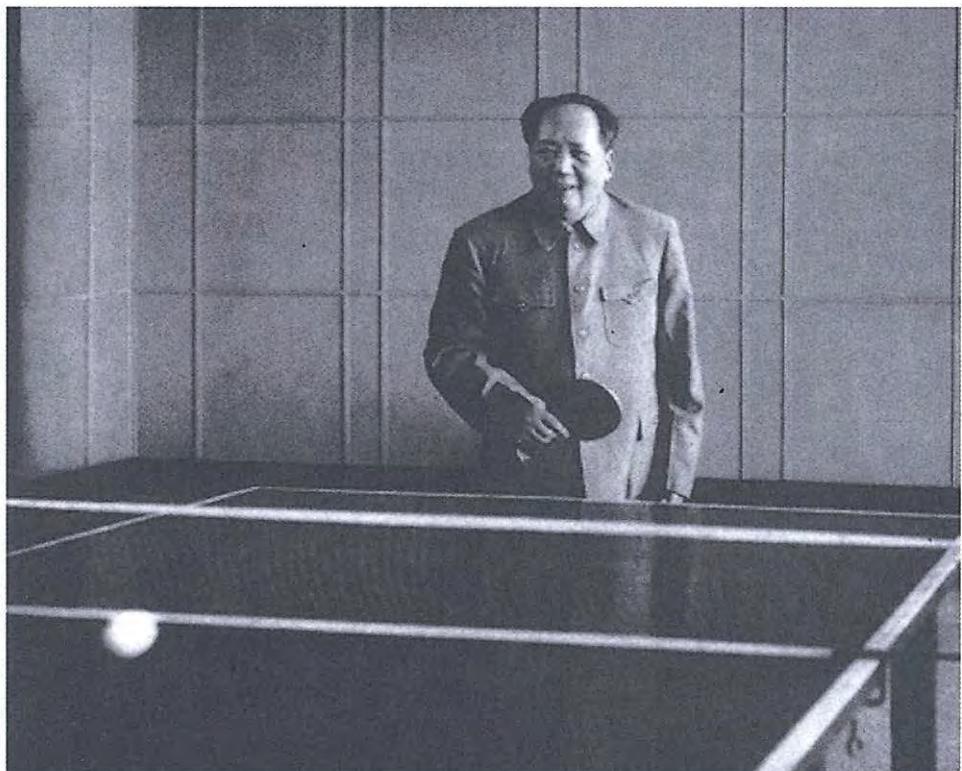
1962年，毛泽东在阅读《解放军画报》。



1962年，毛泽东在阅读《人民日报》。



1962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住所打乒乓球。



1962年，毛泽东在打乒乓球。



1962年，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湖边。

给彭真的信

(1962年6月22日)

彭真同志：

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2]请你安排。

毛泽东

二十二日上午四时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是毕尔·阿里·穆罕默德·拉希迪，毛泽东1962年7月15日在北京会见了他。卡博代表团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毛泽东于1962年6月29日在武汉东湖宾馆会见了他们。

在陶铸报送两个文件的信^[1]上的批语

(1962年6月27日)

汪东兴^[2]同志：

此两件已看过。请告陶铸同志，可以用电报立即发到中央，请中央讨论批示。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一时

原件你可以看一下，然后退我。

[1]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2年6月24日夜给毛泽东的信说：“会议多开了两天，直到今晚十二时才结束。我拟于明早返穗。兹将会议的两个文件（备战问题纪要和关于改进工农业商品交换与减轻生产队负担的请示报告）呈上。请审阅、批示！”

[2] 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1962年6月29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希斯尼·卡博。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友好条约 签订一周年的电报

(1962年7月10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欣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兄弟的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亲切、最热烈的祝贺。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我们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以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结晶，是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史上新的光辉的里程碑。这个条约，充分体现了我们两国人民全面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保障两国的共同安全以及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真诚愿望和坚定意志。一年前，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相继签订，不仅是苏联、朝鲜和中国三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生动地标志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的团结和友谊。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同兄弟的朝鲜人民一道，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新胜利，为反对帝国

主义和争取持久和平的新胜利，携手合作，奋斗到底。

英勇勤劳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千里马的豪迈步伐，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同时，他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东方前哨的强大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永远是对于中国人民的巨大鼓舞和有力支援。中国人民有着像朝鲜人民这样肝胆相照、风雨共舟的亲密战友而感到自豪。

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是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将永远珍视并且不断努力来加强这种团结和友谊。中国人民将坚决履行自己的一切义务，捍卫我们的共同事业。

祝中朝两国人民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7月10日于北京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 四十周年的电报^[1]

(1962年7月10日)

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在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蒙古人民、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致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于兄弟的蒙古人民所取得的各项成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的电报。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周年。1921年蒙古人民在苏俄红军援助下于7月8日解放库伦，击溃温甘伦白匪军，取得革命的胜利。7月11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

就感到衷心的喜悦。

中蒙两国是兄弟邻邦。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两国人民一直相互同情、相互支援。我们深信，中蒙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祝中蒙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7月10日于北京

给张人惕、张人价^[1]的信

(1962年7月19日)

人惕、人价二位同志：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来信收到。惊悉有晋^[2]先师因病逝世，不胜哀悼。谨此致唁。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

另奉薄仪一份，聊助营奠之资。

又及

[1] 张人惕，当时是长沙市税务局干部。张人价，当时是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教授。他们都是张有晋的儿子。

[2] 有晋，即张有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担任过该校数学教员。



毛泽东致张人惕、张人价信的手稿。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 十八周年的电报

(1962年7月21日)

华沙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
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致热烈的兄弟般的
的祝贺。

兄弟的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
领导下，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同时，在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和维护欧洲和世界的和平的斗
争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波兰人民所取得的各项成就
感到十分高兴。

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我們深信，在马克思列宁
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指导下，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
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中波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友好和互助
合作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人民将同波兰人民一起，

为加强中波两国的团结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为争取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胜利而继续奋斗。

祝波兰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7月21日

关于印发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 座谈会记录^[1]的批语^[2]

(1962年7月22日)

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3]。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二日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1962年6月7日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这个记录原载《中南通讯》1962年第五期，分四个部分：一、对目前龙胜县形势的估计。执行农业六十条以来，多数人积极寻找改进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办法，以求迅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龙胜县目前形势的主流。据分析，目前全县生产队中，大约有60%至70%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性质；有20%至30%基本上属于单干，不过还保留着某些集体经济的因素；还有大约10%完全是单干。原来估计全县60%甚至70%的生产队单干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二、对龙胜县目前存在的几种生产管理形式和性质的分析。生产管理形式大致有五种：（一）生产资料集体所有，

劳力与耕牛统一调配，生产统一计划安排，肥料统一使用，庄稼统一收打，收入统一分配；在生产劳动方面，主要农活集体操作，一般农活责任到人。实行这种严格的经营管理责任制，其优点是责任分明，又比较简便易行，应该认真总结提高，加以推广。（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生产短期安排，四定小包工。这种几年来的老办法，群众不满意，必须予以改进。（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统一分配；按劳力或按人头基本固定田块，少数农活统一派工，集体操作，多数农活长年责任到人。对采取这种形式的生产队，从实质上看，应当分为两类：一类基本上还是集体经济，一类很可能基本上已经是变相单干了。（四）居住深山的单家独户和生产组，经过批准包上交。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形式，仍然是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属于社会主义性质。（五）明显的单干。有的叫“包产到户”，有的叫“分田到户”。其中有一部分耕牛还是集体所有，对五保户还有一些照顾，对困难户还有某种帮助，总算还保留了一点点集体经济的因素。以上五种形式，是比较粗略的分法。对于每一个生产队，究竟它属于什么性质，是集体经济还是单干，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或者兼有两种因素，又以何者为主，何者为次，必须根据各队的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谨慎地加以判断。

三、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集体经济最基本的是四条：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至于什么叫集体劳动，很多人都还不很清楚或者很不清楚。集体劳动的意思，主要是指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配，而不是所有的农活，都要大家拥到一块去干。所以，不能单纯从集体操作农活的多少，来确定是不是集体生产。

四、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本原则是自愿和示范这两条。工作重点是努力办好一批生产队，做好示范工作，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地去“纠”或“扭”那些单干户。第一，对目前出现的各种生产管理形式，要根据上述四条原则准确地判明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谨慎对待。第二，从各方面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必须逐步做好的工作是：明确和稳定所有权，继续克服“共产风”；适当调整征购任务；改进和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换购与奖售工业品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

[2] 毛泽东的批语连同这个座谈会的记录，1962年7月22日作为中共

中央文件中发〔62〕409号发至省、地级。

[3] 指即将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这次会议于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举行。



1962年，毛泽东在火车上阅读《大众电影》杂志。

对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的批语^[1]

(1962年7月23日、8月24日)

—

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三日

[1] 本篇一写在《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上。毛泽东批示后，这个决定（草案）连同批语一起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一，印发参加会议的同志。决定（草案）共11条。本篇二写在《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1962年8月17日的修正稿上。毛泽东批示后，这个决定（草案）修正稿连同批语一起作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文件一，印发参加会议的同志。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共12条。10月11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2〕515号文件将这个决定发到人民公社。

二

印发各同志^[1]讨论。

毛泽东

八月二十四日

[1] 指即将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这次预备会议于1962年8月26日至9月23日举行。

对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 一篇文章摘要的批语^[1]

(1962年7月25日)

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位同志阅。阅波兰农业社会化的一篇，在第五页上。

毛泽东

七月廿五日

阅后退毛。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1962年7月24日编印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第一一一〇期上。这一期第5页刊登了波兰《政治》周刊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的摘要。文章说，农业小组目前是波兰农业社会化的中心环节。农业小组组员目前已达100万户。1965年农业小组积累资金将达250亿兹罗提。在此基础上他们将更广泛地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农业小组是一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组织。1970至1975年波兰农业将完全电气化和机械化，为此必须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在最近15至20年内使不超过一半的农民的土地社会化。现在可以说有三种农村集体化的类型：(1) 大规模地采取劳动合作化的形式；(2) 建立国营农场；(3) 建立合作社——国家农庄。大规模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工农业高度发展水平上可以不必付出很大代价。大规模地建立国营农场，这意味着国家要通过赎买的形式接收农民的土地，给农民以土地赎金。建立合作社——国家农庄的最便宜的道路是通过农业小组升入高级合作化劳动形式。

对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62年7月31日)

印发各同志^[2]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财贸办公室斟酌修改。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1] 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962年7月28日关于粮食问题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我们根据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的精神，研究了粮食工作方面的情况和问题，认为要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争取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除了必须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外，还必须在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和兼顾城乡人民生活的原则下，继续适当地减轻国家对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并且把粮食征购任务在一定水平上固定一个时期。这是粮食工作方面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方针性的问题。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1961年到1962年度粮食收支的情况。二、1962年到1963年度的粮食收支计划。三、关于调整今后粮食征购任务的方案。四、今后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关于方针、政策共讲了10点：（一）继续实行少购少销、收（包括进口）大于支的方针。（二）集中主要力量，支持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首先是大力支持主要产粮区的恢复和

发展。（三）从销于农村的粮食中，挤出一部分来增加对经济作物区的粮食供应，合理地提高经济作物换购粮食的比例，支持经济作物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四）大力支持国营农场，切实整顿国营农场，使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能够逐年向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粮食和经济作物。（五）有领导地、适当地开放农村粮食自由市场。（六）继续执行国家关于农业税负担三年不变的规定。（七）争取逐年增加一点国家粮食库存，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和突然事变。（八）进一步加强国家关于粮食管理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制度。（九）取消公社、生产大队提取机动粮、自筹粮的办法。（十）认真负责地、切切实实地加强粮食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根据这个报告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意见，中共中央于9月23日作出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2〕495号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

[2]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修改稿的批语^[1]

(1962年7月31日、8月24日)

—

印发各同志^[2]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3]同志领导的起草委员会斟酌修改。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62年7月31日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初稿上写的批语。二是毛泽东8月24日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8月6日修改稿)上写的批语。修正草案共9章60条。8月25日，毛泽东的这一批语连同修正草案8月17日修改稿，作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文件印发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各同志讨论。9月27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在这次全会通过。10月11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2〕516号将这个修正草案发到人民公社。

[2]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

印发各同志^[1]讨论。

毛泽东

八月二十四日

[1] 指即将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

对中央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 规定草稿的修改^[1]

(1962年8月)

—

党在农村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措施，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已经或正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地区发生了“单干风”，已经有一小部分生产队改变方向，分户单干了。

—

对于党内的思想问题，必须采取民主讨论分清是非的方法，以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目的，但是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展〈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1962年8月1日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三

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状态，这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曲折，这种曲折是不可避免的。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几十年几百年内，也是还会有的。只要就全国来说，只占一小部地区、社队和人数，也是并不可怕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占了极大的优势。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可能要继续几十年到几百年。

在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来信^[1]上的批语

(1962年8月2日)

印发各同志^[2]。

[1] 指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根据太湖县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不过，它与省常委1962年2月20日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是相违背的。我想保荐它，是因为有了它，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太湖是一个三类县，1958年至1960年期间，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破坏，人民群众奄奄一息。1961年3月，这里90%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形势发生了根本转折。过去的荒、逃、饿、病、死，一瞬而基本变成了熟（荒地变熟地）、回（外流回归了）、饱（人民基本吃饱了，有的地方吃得较好而有余）、健（体质健康了，生病的少了）、生（妇女怀孕了）。太湖一个最差的大队桥西大队的农业生产，1961年与1960年比较，粮食增长了81%，油料增长了6.5倍；棉花增加了10倍，生猪、家禽也是几倍的增长。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是我10多年来（除土改外）第一次见闻。责任田的具体办法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不是搞单干，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仍是按劳取酬，集体劳动方式也没有改变。它能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欢迎。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农民起码占80%以上，甚至于占90%以上。

[2] 毛泽东的批语连同钱让能的信，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

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

毛泽东
八月二日



1962年，毛泽东和家乡亲属在一起。

对新华社关于南斯拉夫 经济情况报道^[1]的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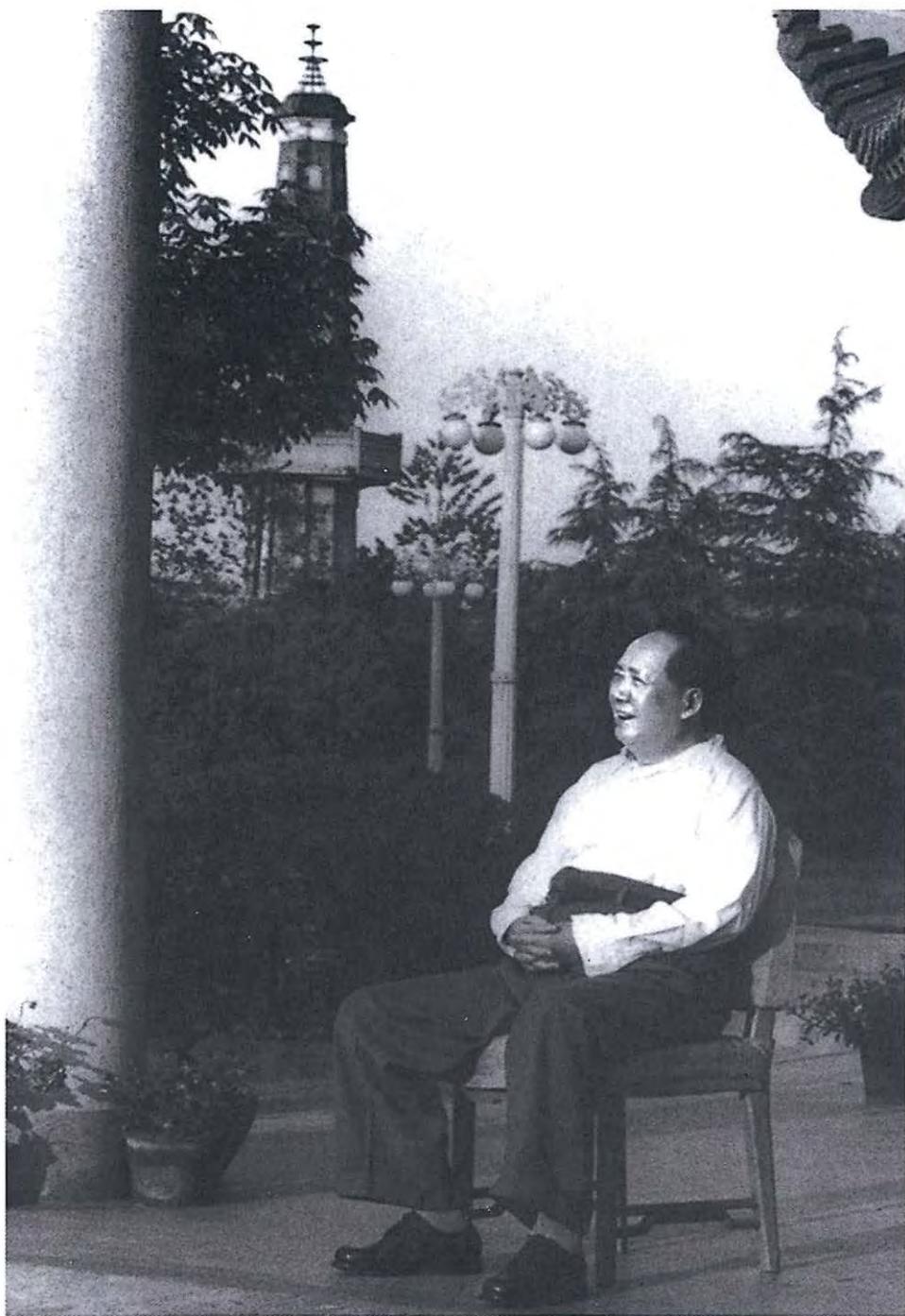
(1962年8月2日)

南斯拉夫的经济混乱情况，印发大家一阅。请大家讨论一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好，还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1] 指新华社1962年7月28日由贝尔格莱德发来的一份关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摘要的综合报道。报道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会上的讲话中透露了他们在工业、农业、内外贸易、财政、南盟的组织和政治思想等方面存在着许许多多使他们烦恼的重大问题。米尼奇说，由于五年计划的指标任务与经济制度之间失调，建议取消1961至1965年的五年计划。科马尔说，近三年来农业生产停滞，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缺乏，农村中的富农阶级在“加强”。布尔基奇抱怨外汇外贸“改革”破产，没有能推动本国的生产。斯坦鲍利奇说，自发势力渗透进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队伍中，一些人打击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和南盟纲领中确定的原则，而南盟经常忘掉思想斗争。兰科维奇的工作报告说，某些盟员对南斯拉夫制度的某些实质问题不了解，对南盟纲领中的观点看法有些不稳定，在反对“消极现象”时，必须同削弱南盟统一，使人们意志消沉的乱批评作斗争。铁托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他除对兰科维奇的报告表示满意外，对其他各个讲话都愤怒地加以训斥，说在这些讲话中找不到今后怎样摆脱困难和经济如何发展的答案。



1962年，毛泽东在杭州。

对新华社关于南斯拉夫经济问题的 一篇通讯稿的批语^[1]

(1962年8月2日)

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好吗？请同志〔们〕讨论一下。

毛泽东

八月二日

[1] 这个批语写在1962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题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一篇新华社通讯上。通讯说，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23日透露，最近召开的南盟中央全会未能提出使南斯拉夫摆脱经济困难的办法。上面有些人怀疑工人自治，认为它行不通。在这之前，铁托曾发表过几次讲话，承认在南斯拉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正在发生“各种反常现象和消极现象”。工资差额巨大，企业内部利润的分配十分悬殊。国内许多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市场处在被分割的状态。对外贸易赤字很大，目前有外债10亿美元。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地方主义、沙文主义等，青年中有金钱至上主义的现象。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对现在的处境存在严重的不满。这篇通讯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 问题的看法》的批语

(1962年8月2日)

尚昆^[1]同志：

此件^[2]请印发各同志^[3]。

毛泽东

八月二日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一文。该文介绍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1962年4月2日这一期刊载的该杂志记者对衣阿华州农场主加斯特的访问记。加斯特曾访问苏联3次。1959年赫鲁晓夫在美国访问过他的农场。访问记说，据加斯特看来，苏联农业方面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直到1955年才开始对农业进行大量投资。1955年的苏联农业大致相当于美国农业1930年达到的水平。赫鲁晓夫的真正问题是现代农业所需要的资金数量估计得过低。另一个根本问题是，苏联没有美国这样的运输网。苏联有了适当的投资，就能够以与美国同样的百分比提高农业产量，并且在1970年能够把农业需要的劳动力从目前的40%或50%降低到25%甚至20%。但在大面积单位面积产量上，苏联总也赶不上美国，因为苏联的耕作季节太短，气候太干燥。赫鲁晓夫应该冷却军备竞赛，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农业。

[3]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8月6日)

先开工作会议，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从明天起，开始讨论，刘□□建议成立核心小组，还有许多小组，解决六个大组不能畅所欲言的问题。核心小组有常委、书记处，再加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二十三人：毛、刘□□、周、朱□、邓□□、彭□□、富春、先念、谭□□、伯达、陆□□、富治、谷牧、罗□□、陈毅、杨□□，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

一、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这个问题是否谈一下？我同几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话，了解到有的人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斗争，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二、形势问题，也要谈一下，国际问题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

国内形势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工业上半年不那么好，有主客观原因，下半年怎样，还要看一看。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哪种对？如果都不对，是不是应有第三种看法？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问题不少，确实很大。回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彻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三、矛盾问题。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哪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

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闹单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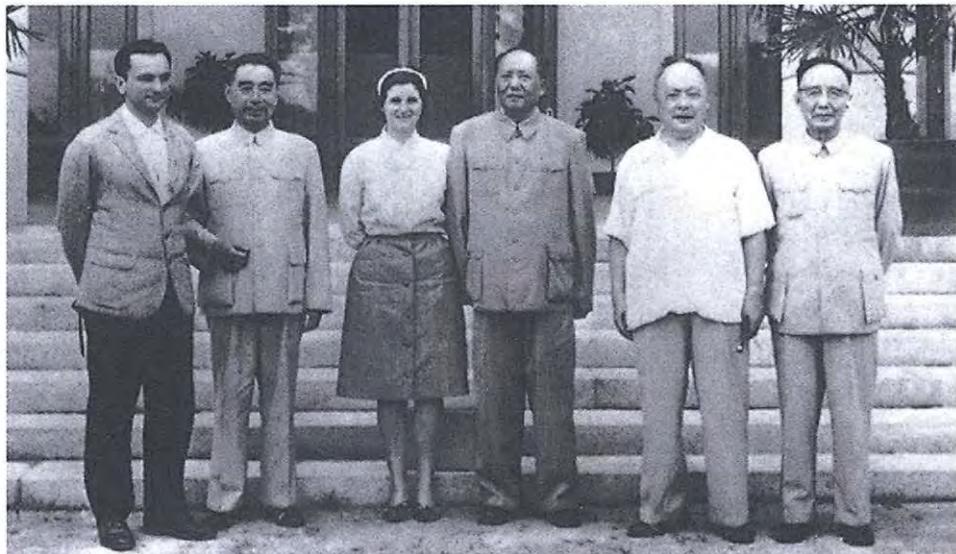
再有，生产和分配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积累过多，消费就少了。

再有，集中与分散的矛盾，七千人大会之后，我看没有解决，还要继续做工作，民主与集中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要让人家讲话，不民主，集中不起来，还要做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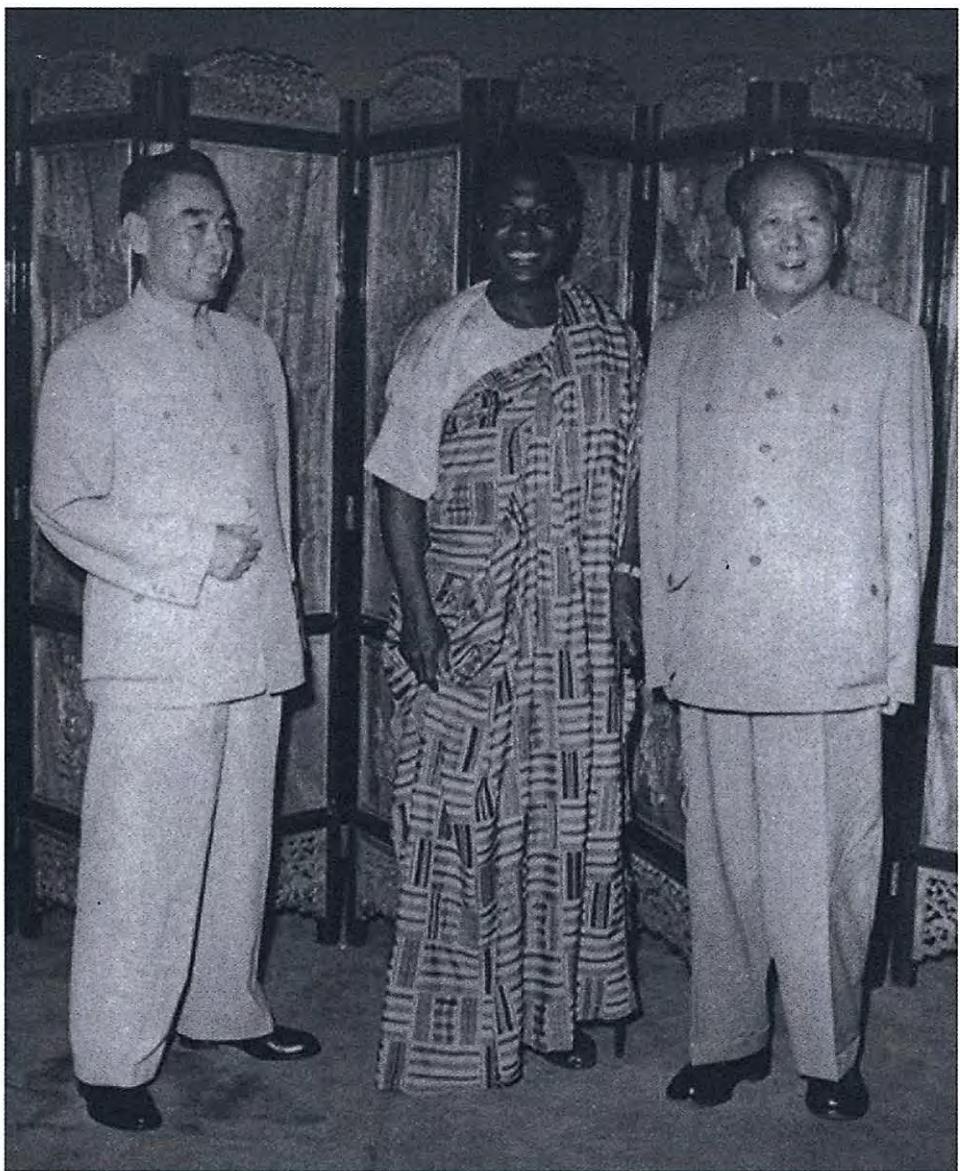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敌对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积累过多，民主与集中还要做工作。阶级存在不存在？国内形势如何？矛盾，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有个肃反问题，还有反革命存在，要看到，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



1962年8月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会见拉丁美洲朋友。



1962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会见巴西著名经济学家平托和夫人。



1962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1962年8月9日)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有同志揭露邓子恢的问题）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

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1]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种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两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〇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

[1] 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历任国民党青海省府主席、西北行营副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同志插话：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由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1]，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

[1] 胡开明，曾任河北省省长，主张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

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以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误，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

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两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1]），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1] 曾希圣（1904—1968），湖南资兴人，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安徽农村不少地方曾实行了包产到户。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

三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1]、饶漱石^[2]，长期没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〇年大跃进，六一年开始搞十二条，六二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

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两千万人^[3]，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

[1] 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20世纪50年代初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后因所谓“内奸”问题被判刑，终获平反。

[2] 饶漱石（1901—1975），江西临川人，20世纪50年代初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因参与高岗组织反党集团而于1955年3月被开除出党。

[3] 指因经济困难和调整而从城市、工厂返回农村的人口。

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做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

关于领导机关应加强 请示报告工作的批语^[1]

(1962年8月10日)

此件^[2]值得一阅。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而国外使馆消息，却如此认真而迅速。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

毛泽东
八月十日^[3]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党委1962年8月5日关于阿尔及利亚情况和使馆的看法给外交部的报告上。

[2] 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党委给外交部的这个报告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阿尔及利亚民族革命斗争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和当前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的矛盾，也提出了使馆党委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3] 毛泽东批语的时间手稿上写为“8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上印为“8月11日”。

在中央组织部七月份 综合报告^[1]上的批语

(1962年8月12日)

印发各同志^[2]。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现在部长安子文同志在经过批评之后，觉悟了，这就好了。希望毛病不要重犯。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1]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62年7月29日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的7月份综合报告中检讨说，长期以来，没有向主席和常委报告工作，反映情况，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今后，一定引以为戒，努力改正。报告主要讲干部队伍方面的情况和问题。认为在干部队伍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部分干部的精神状态不正常，二是干部队伍过于庞大。报告对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2]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邓子恢^[1]关于农村工作 政策意见的批评^[2]

(1962年8月12日)

此件^[3]是一九六一年夏季庐山会议时印发文件之一，现在重印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 中共中央办公厅1981年3月9日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指出：“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对1962年批判邓子恢的问题，国家农委党组在这个报告中说，1962年春天，邓子恢从巩固集体经济出发，根据调查所得材料，除主张贯彻执行稳定小队所有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保留“小自由”，固定生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若干年不变外，还强调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他提倡的责任制形式，主要是由生产队向作业组实行包工，零星小活也可以包到人；此外，只是对田间管理和一些集体不便进行的技术活，可以包到户，联系产量，超产奖励。他的这些意见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说成是“提倡包产到户”，刮“单干风”，并联系过去的事又对他进行了批判，说他是为1955年对他的批判搞翻案。实际上邓子恢并不是提倡包产到户和鼓吹单干，而是想找到一种将集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形式。其实，回顾当时实际情况，在一些经济极端困难的地区，允许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也是必要的，也不算什么错误。至于1953年邓子恢针对有些地方农业合作化中急躁冒进的情况提出了必须注意防止急躁冒进的意见，无论从当时或事后来看，都是正确的。

[3]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61年8月24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毛泽东对这个材料曾写过批语。

发给各同志^[1]。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那时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二部分的十条措施^[2]，其中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单干问题），对形势的看法（第一部分的十条分析^[3]）也很正确。过了一年（其实只有十个月，即一九六一年八月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底为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

[1]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2] 指《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第二部分列举的10条：（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3年、5年甚至10年不变。（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六）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做法。有些地方在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中，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结果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虽然对农业六十条热烈拥护，欢欣鼓舞，但是还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3] 指《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第一部分基本情况中分析形势所列举的10项表现：（一）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二）退赔已经部分兑现。（三）进一步确立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四）给社员分配和补充了自留地，发展了家庭副业。（五）普遍恢复了“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制度。（六）过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真正出于群众自愿的食堂巩固下来了。（七）普遍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的办法。（八）多数地方对于今年夏收分配比较重视。（九）各地普遍重视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十）各地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了更大的信心。

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我们欢迎子恢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系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他那时，在城市，则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则是不够的，所以我在那会议上给他指出了这一点。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

对陶铸^[1]在中南组发言要点的批语^[2]

(1962年8月13日)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2年8月12日印发的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上，这份简报刊登了陶铸8月10日在中南组的发言要点。陶铸说，我认为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一开始就提出几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下面讲一点个人的认识：（一）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承认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不承认，那怎能叫做共产党？可是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少数同志确有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现象，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些人不想搞阶级斗争，企图另找“出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肯定 是长期的。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只要富裕中农作为一个阶层存在一天，这个斗争也就会存在一天，而且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在中南地区，已经分户单干的尽管不算多，闹单干的或想搞单干的还大有人在，决不可低估。对于已经分户单干的，首先要表明党的坚定态度，教育广大干部和农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具体工作上，则必须采取谨慎的步骤，不能简单粗暴。关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形式，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必须重视，加以解决，这对巩固集体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一着。（二）形势问题。国际方面，形势大好。国内形势的好转，对国际形势影响很大，所以，首先还是要把国内工作做好。做好国内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恢复与发展农业。农业恢复了，工业随之也可以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三）对几个矛盾问题的认识。陶铸着重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统一与分散的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谈了自己的看法。

已阅，很好。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1962年8月，毛泽东和李敏、孔令华、李讷等在北戴河。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 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2年8月14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欣逢朝鲜解放十七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般的全体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十七年来，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保卫自己祖国的独立自由，进行了坚强不屈的英勇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创造了伟大的业绩。现在，朝鲜人民正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跨上千里马的气概，信心百倍地为实现宏伟的七年计划和攻占今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六个高地而奋斗。中国人民像对待自己的成就一样，为朝鲜人民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并且预祝朝鲜人民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进一步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东方前哨，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朝鲜人民为迫使美国侵略军撤出南朝鲜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的这一爱国正义斗争，直到朝鲜人民取得最后胜利。

中朝两国是兄弟盟邦和亲密战友。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随着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密切合作，随着两国领导人的互相访问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像长白山一样巍峨永存，像鸭绿江水一样长流不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8月14日

对公安部关于当前反革命活动情况 和我们的对策报告草稿^[1]的批语

(1962年8月15日)

印发各同志^[2]。如有意见，请提交谢富治^[3]同志。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

[1] 公安部党组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8月8日草稿）说，今年以来，主要是4月以后，一部分城市盗窃、抢劫和凶杀案件有些上升，少数城市治安秩序一度比较混乱，反革命分子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暴露。对当前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我们拟采取边暴露边打击的方针，这样既可以适当地暴露敌人，打得准，打得很狠，又使安全有比较可靠的保证，不至影响社会秩序。具体做法上我们完全赞成中央的指示，在依靠群众的基础上，主要采取侦查破案的办法，一般地不搞群众镇反运动。这次打击反革命分子现行破坏活动的重点放在大中城市、东南沿海、铁路交通沿线和一部分敌情比较严重的地区。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暴露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必须统统追查出来，严肃处理。在处理时要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同时，必须继续加强治安工作。公安机关在自己的一切活动中，都要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服从党委的领导。

[2]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3] 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党组书记、公安部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成功发射 载人宇宙飞船的电报^[1]

(1962年8月15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苏联成功地连续发射了“东方三号”和“东方四号”载人的卫星式宇宙飞船，实现了在宇宙空间的联合编队飞行，并且使飞船顺利地返回地面，这是苏联人民在征服宇宙空间方面的新的重大的胜利。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无比的兴奋。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向驾驶宇宙飞船的宇宙航行员尼古拉耶夫少校和波波维奇中校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苏联人民的这一新胜利，是对人类征服宇宙空间的又一次伟大贡献，它再一次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威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大大鼓舞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反对美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的电报。祝贺苏联“东方三号”和“东方四号”宇宙飞船的成功发射。

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保卫世界和平和争取人类进步的斗争。我们衷心地祝苏联人民在征服宇宙空间的宏伟事业中继续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8月15日

对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 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稿^[1]的批语

(1962年8月16日)

印发各同志^[2]讨论。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1]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2年8月16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8月10日稿)，全文共6条，内容包括干部交流的意义、范围、对象以及工作计划、步骤等。决定说：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有计划地、系统地、多方面地交流经验，为了帮助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扩展眼界，丰富经验，提高领导水平，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有计划地进行交流，并且把定期交流干部作为我党干部管理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交流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公社以上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同年9月2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全文由6条增为8条，关于交流范围和对象将“公社以上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改为“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

[2]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胡开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 生产责任制报告^[1]的批语^[2]

(1962年8月16日)

印发各同志^[3]讨论。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1] 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1962年8月8日上送的这份报告说，农村人民公社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特别是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之所以还没有充分地调动起来，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生产队没有建立起生产责任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基层干部、社员商量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生产队组织长期的固定的生产组，实行“三包”生产责任制。具体做法是：一、由社员自愿结合组成一个六、七、八户或六、七、八个劳动力的生产组，在一般情况下长期不变。二、生产队把全部土地都分到生产组，耕畜、农具也尽可能分到生产组使用，在一般情况下长期不变。三、根据土地好坏，首先进行土地分等，评出常年每亩产量数、用工数和投资数，然后计算出全组的土地总产量、总用工和总投资数，签订“三包”合同，认真执行。四、到了秋后，包产以内的全部产量，由生产组交生产队统一分配；包产以外的超产部分，完全归生产组按劳分配。报告还说，“如果把包工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辅助的办法，例如在生产组中把某些少量的、技术性强的作物（如烟叶）和留种地，包给个别有经验的社员去负

责经营管理，那是有好处的”。

[2] 这个批语写在胡开明 1962 年 8 月 8 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我于 7 月 30 日华北局的农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发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下。特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为盼！”

[3]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1962年8月，毛泽东会见乒乓球运动员和教练。

对李先念关于等价交换问题的 口头汇报提纲的批语^[1]

(1962年8月17日)

印发各同志讨论。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

[1] 这个批语写在李先念1962年8月16日上送关于等价交换问题的口头汇报提纲给毛泽东的信上。提纲说，目前市场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存在着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计划市场的价格低，自由市场的价格高，两者悬殊很大。在国家同农民之间和农民相互之间的两种交换形式中，农民吃亏的不等价是主要的，国家吃亏的不等价是次要的。在当前生产不足、物资有限的情况下，短期内难以找到根本解决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和等价交换问题的办法，只能采取一些过渡性的措施。现在我们设想的有以下几项：第一，有步骤地、适当地缩小统购派购的范围，以便集中物资力量，换购主要农产品。第二，逐步提高粮、棉、油换购中国家供应主要商品的比重。第三，在国家完成粮、棉、油的统购任务以后，开放粮、棉、油的自由市场，允许农民自由交易，调剂余缺，并且由供销合作社适当地经营贩运。不允许私营商贩经营粮、棉、油。第四，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在农村自由市场的领导作用。第五，对粮、棉主要产区的生产队迫切需要的中小农具，尽可能做到平价供应。第六，在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条件下，加强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援。在采取上述经济措施的同时，还要强调政治挂帅，不断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动员他们帮助国家共同克服目前的暂时困难。

对中央军委工作报告^[1]的批语

(1962年8月18日)

发各同志^[2]。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总之，党、政、军、民，都是很好的，是天下无敌的。看不出这一个本质，就是机会主义者。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1] 指中共中央军委1962年8月10日关于军委5月至7月的工作情况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这3个月军事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一）采取紧急措施，准备粉碎美蒋匪帮对我东南沿海的可能进犯；（二）在中印边境西段，同印度的蚕食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三）提前进行1962年度的征兵工作。在5月下旬至6月中旬的紧急备战中，部队士气高昂，各参战部队都做到了“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党政机关密切配合，全力支援，人民群众积极支前，团结对敌。以上工作现在均已大体告一段落。

[2]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 十八周年的电报^[1]

(1962年8月22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格·乔治乌-德治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毛雷尔同志：

在罗马尼亚解放十八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罗马尼亚人民、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获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并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和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

中罗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中国人民将始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格·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毛雷尔的电报。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八周年。

终不渝地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致力于加强中罗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并同罗马尼亚人民一起，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而奋斗。

祝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罗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8月22日

对邓子恢^[1]关于当前农业生产 和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反映^[2]的批语

(1962年8月26日、29日)

—

印发各同志^[3]。

毛泽东

八月廿六日

—

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是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1962年8月20日送毛泽东阅示的对邓子恢所作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反映。反映说，5月31日和6月1日两个上午，邓子恢在总后礼堂作了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听报告的共有少校以上干部3000余人。听报告后，有些人有意见，提出了疑问：一、觉得报告“有气”“有情绪”。有的干部对他所说的“过去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敢讲话”很不满意，认为这样讲影响不好。二、对报告中说单干也有一定的优越性，不少同志认为不妥当。三、认为报告对农村形势的分析有问题，使人感到农村问题成堆。四、报告中有些讲法和中央口径不大一样。如说农民的自留地、小开荒、借地将要增加到不超过耕地总面积的20%，这和六十条的规定不一致。与此同时，也有些同志认为这个报告在有些方面讲得深透，“很解决问题”，有的还“很欣赏这个报告”。这主要是：一、对批评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很感兴趣。二、认为对公社的经营管理问题讲得细、讲得新。三、对他的“敢讲话”表示赞扬，认为“很有风格”“思想很解放、很大胆”。此外，还有人说邓子恢的作风好，他“经常下去作调查，掌握了很多材料，比一般干部了解的情况具体”。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



1962年，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图为贵州省锦屏县三江公社给社员分配超产奖励。



1962年，河南漯河的牲畜市场。

对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 试行草案^[1]的批语

(1962年8月27日)

请尚昆^[2]印发到会各同志^[3]讨论。商业文件起草委员会各同志可不再发。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七日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1962年8月26日报送毛泽东的这一试行草案共40条，对以下8个问题作出了规定：（一）商业工作的方针；（二）坚持等价交换原则，推广农产品收购合同制度；（三）改进国营商业工作；（四）恢复供销合作社；（五）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六）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七）恢复同农村商业有关的农产品加工作坊；（八）改善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陈伯达为报送这个草案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此件在北戴河重发给商业文件起草委员会各同志。听说，有的同志认为，这个草案对商业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在这次会议上，可以根据一年来的经验和最近大家提的意见，作些新的补充和修改。”中央准备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再拟定一个比较全面的商业工作条例，后因故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

对巨任吾^[1]给毛泽东、刘少奇 来信^[2]的批语

(1962年8月29日)

应令其治疗疾病，病好后分配适宜的工作。至其所犯案件，应

[1] 巨任吾，即向明，原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因所谓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1963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向明问题的甄别情况报告说，省委1955年9月向中央作的“关于检查领导情况及对向明同志处理意见的报告”和1957年6月向中央作的“关于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专案审查总结报告”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恢复向明的党的生活。1963年5月，向明写出书面报告，同意山东省委作出的结论，并表示“深感满意”。文化大革命中，向明又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80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复查，并报中央书记处通过，认为过去认定他“在政治上、组织上、精神上积极支持饶漱石，参加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是不能成立的。中央决定撤销对向明所作的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和给予他的处分。

[2] 巨任吾1962年7月1日给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信中说，我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指控犯有“反党反人民罪行”，于当年10月6日被责令“进行隔离反省”。1961年12月28日，虽然被宣布“解除隔离反省”，但组织上一直没有对我的案件作出结论，对于过去指控的是非也没有作任何说明，而现在却要分配我到某经济研究所工作。为此，我不能不再次请求对我的问题作出相应的结论，同时还要说明我身患多种疾病，健康状况极坏，故请求治疗，以便在今后能够支持工作。

根据实际情形，加以据〈处〉理，不枉不纵。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1962年，毛泽东看望刘少奇一家人。

对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 决定稿^[1]的批语^[2]

(1962年8月31日、9月14日、10月7日)

[1] 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8月31日，第一稿）共有7个部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9月27日通过的这个决定，增加了1部分，共有8个部分。《决定》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我们的商业工作，应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的购销形式，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有3个渠道：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主体和领导力量。合作社商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另外，为了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决定》还对商业方面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问题作出了规定。关于商业经营管理制度和有步骤地整顿充实商业部门工作人员队伍等问题，《决定》也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28日稿）》上写的批语。毛泽东将“28日”改为“8月31日”。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决定》（9月9日，第二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先念和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1962年10月5日给毛泽东的信上写的批语。信中说：“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稿子，作了一些修改。现在把修改本子送上，请审批。”

—

请尚昆^[1]同志印发全会各同志^[2]讨论。

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

—

印发各同志讨论。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

—

此件^[3]即送周^[4]阅，再送刘、朱、邓阅，请邓办理。

毛泽东

十月七日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

[3] 指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的修改稿。

[4] 周，指周恩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成立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2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欣逢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荣的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
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致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七年来，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的
正确领导下，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在，越南人民正以自力
更生的革命精神，展开爱国竞赛运动，进行着忘我的劳动，斗志昂
扬地执行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欢
欣鼓舞，并祝越南人民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为履行1954年日内瓦协议和争
取祖国和平统一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南方明目张
胆的武装干涉和侵略，已经激起全体越南人民的无比义愤，并且遭
到越南南方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我们再次重申，越南人民反对

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南越、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正义斗争，将永远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为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维护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无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或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一向同甘苦，共患难，相互支持，紧密合作。中国人民十分珍视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深厚友谊，并且将继续同越南人民一道，为加强中越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友好合作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进行不懈的努力。

祝越南民主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越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9月1日

对李富春关于一九六三年 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的信^[1]的批语

(1962年9月4日)

共三件^[2]，印发各同志^[3]研究。

毛泽东
九月四日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1962年9月2日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中说：明年计划，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虽然不讨论，但粮食、棉花、木材、煤炭这四个重要生产指标需要及早定下来。这四个指标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关系到整个农、轻、重的安排，是决定明年支援农业、加强国防、改善市场和争取财政经济进一步好转的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为此，我建议由恩来、小平、彭真等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找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书记，议一议这四个指标，大致能定一下，以利于编制明年计划，早做生产准备工作。我个人意见，明年木材生产必须有2350万立方米，棉花生产至少2000万担以上，争取2400万担，这经过努力是完全可能的。关于支援农业问题，希望各省、市、区能在10月中旬提出明年和今后的切合实际的具体意见，然后由计委汇总平衡，编制全国的计划，提供下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2] 指：一、李富春给毛泽东的信，见本篇注释一。二、国家计划委员

会党组1962年8月16日关于安排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主要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讲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执行今年计划的主要情况。（二）编制明年计划的问题。报告最后说，明年的经济形势，肯定要比今年更好。三、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1962年8月10日关于支援农业的报告。报告讲了4个问题：（一）支援农业，实行农业的技术改造，实质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必须坚决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三）1963年支援农业的安排；（四）加强调查研究，迎接农业生产和技术改造的新高潮。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

对谷城、光化、襄阳三县旱灾情况 报告^[1]的批语

(1962年9月8日)

共十一件^[2]，印发各同志^[3]阅。这些都是灾情的报告，可以看到干部的努力，群众的积极性，人心的稳定，虽有减产，也有增产，即在灾区也不是一片黑暗。中国人是可以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的。

毛泽东
九月八日

[1] 湖北查灾工作组刘忆中1962年9月3日关于谷城、光化、襄阳3个县旱灾情况给周恩来的报告说：我们在谷城、光化、襄阳三个县看了8个区，13个生产大队。总的情况是：干旱严重，减产程度很大，稻谷地区比杂粮地区严重，丘陵地区比平原地区严重，粮食作物比经济作物严重。这13个大队大体可分为3种类型：一、特别严重的，秋季无收的面积占80%左右，有收的产量为数不多，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二、严重的，秋季无收的面积占50%左右，口粮水平每人每月平均4至6斤。三、一般的，秋季无收的面积占30%至40%，口粮水平每人每月平均10斤左右。受灾严重的地区，地委县委采取了很多措施，做了不少工作，群众情绪基本稳定，生产积极性也很高，目前正在翻耕施肥，积极准备冬播。但今冬明春群众生活安排还有困难。

[2] 指湖北查灾工作组刘忆中1962年9月3日关于谷城、光化、襄阳三个县旱灾情况的报告，山东灾情调查工作组同日关于山东灾情的报告，陕西灾情调查工作组同日关于陕西灾情的报告，甘重斗同日关于四川灾情的报告，中央农村调查工作组1962年9月2日关于黑龙江海伦县情况的报告，翟自强1962年9月4日关于湖南省衡山县今年受灾情况的报告，国务院湖南工作组刘春同日关于灾情调查情况的报告，广东工作组同日关于广东雷州半岛灾情的报告，国务院吉林工作组关文启1962年9月3日关于吉林白城子地区灾情的报告，国务院贵州工作组姜凯风1962年9月4日关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灾情简报，内蒙组马矍翁1962年9月3日关于内蒙古灾情的报告。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

对陶鲁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发言要点^[1]的批语

(1962年9月8日)

陈伯达同志：

此件值得一看。我看是讲得对的。

毛泽东
九月八日

退毛。

[1] 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62年8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要点刊登在商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简报第十一期上。要点说：一、商业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在购销活动中正确处理我们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因为，农村是我国国内市场最广阔、最主要的场所。二、商业战线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当前，商业工作中有以下几个重大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收购农产品的购留比例问题。（2）工农业产品的等价交换问题。（3）收购农产品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奖售或换购工业品的比例问题。（4）收购农产品时，对待集体经济单位和社员个人的关系上的问题。（5）工商关系问题。（6）商业队伍不强，经营管理不善，物资损失严重。

三、对市场物价问题，华北小组一致同意第三个方案，即采取大部不动、小部调整的方针。现在农民迫切要求提高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所能换购到的工业品比例，我们认为，第一步要力争达到50%，第二步达到80%以上。解决目前存在着的两种市场、两种价格的矛盾，根本关键也在于发展生产。我们要重视利用价值法则，促进工农业生产。四、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可以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办法是：把供销社的工作搞得更活一些，在集市贸易上，能够有吞有吐。对集市贸易的领导，应当以经济措施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管理，同时，在群众中还要经常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教育，以利于打击和防止投机倒把活动。五、促进棉花生产是当前十分尖锐的问题，文件中要表示中央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六、文件可能有三种写法：（1）只写当前的问题；（2）只写长期的根本性的问题；（3）既写当前的，又写长期的。我主张兼顾二者，侧重当前。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 十八周年的电报

(1962年9月8日)

索非亚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托·日夫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迪·加涅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安·于哥夫同志：

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八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人民、中國共產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保加利亞人民、保加利亞共產党和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政府，致熱烈的祝賀。

一年來，兄弟的保加利亞人民在保加利亞共產黨和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領導下，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成就；同時，在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以及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中，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對此，中國人民感到高興。

中保兩國人民的友誼是牢不可破的。在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兩國人民一向相互同情、相互支持。不斷加強我們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團結，對於促進我們兩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增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人民將一如既往地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同保加利亞人民攜手合作，為爭取世界和平、民族獨立、民主和社會主義共同事業

的新胜利而奋斗。

祝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

关于改善生产队 经营管理问题的批语^[1]

(1962年9月8日、25日)

—

陶铸、任重、平化、延春^[2]同志：

此件^[3]请一阅，阅后我们谈一下。
退毛。

—

印发各同志^[4]。请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注意研究，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问题。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他的侄子、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省

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毛华初1962年8月7日来信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年9月9日来信上的批语。张平化的信中说，毛华初的信和毛主席的批示我已读过。华初信中提到的生产队经营管理问题，是值得研究的。生产责任制属于经营管理的具体形式问题，在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有利于调动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等原则下，应当允许多种多样。华初提到的“产量责任制”，我们也作过一些酝酿。现在看来一般地提倡“产量责任制”，容易发生错觉，如果领导骨干不强，确有滑到包产到户的危险。但在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统一分配的前提下，某些部分农活、部分作物，实行联系产量评定奖罚或者以产记工，作为整个生产责任制的一种辅助形式，是可以允许的。目前群众中有许多好的经营管理经验，需要我们加以总结和推广。现送上王延春寄来的《介绍一个经营管理搞得很好的生产队》的材料，请审阅。省委准备同各地委、市委书记讨论后加以推广。王延春寄来的材料是湖南省委工作组总结的汉寿县洲口公社小港大队第十三生产队的经验。材料说，这个生产队几年来集体经济得到巩固，生产获得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经营管理上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生产队根据各种农活的不同情况和各个时期生产的需要，按照统一安排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原则，组成临时的劳动小组，实行临时的小段的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以及专业性的包工，主要农活集体操作，一般农活个人操作，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牲畜、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实行责任制。在推行生产责任制中，生产队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二、实行民主办队；三、加强劳动纪律；四、实行勤俭办队；五、学习总结农民群众耕作的经验。

[2]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平化，即张平化。延春，即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3] 毛华初1962年8月7日信中写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一共讲了5个问题：（一）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的问题；（二）经营管理问题；（三）自由市场和交换问题；（四）干部教育工作问题；（五）整顿党团支部工作。在第二个问题中，他说：目前农业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上，实行产量责

任制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具体做法为：统一经营，分户管理，产量到丘，责任到人，统一分配，按产奖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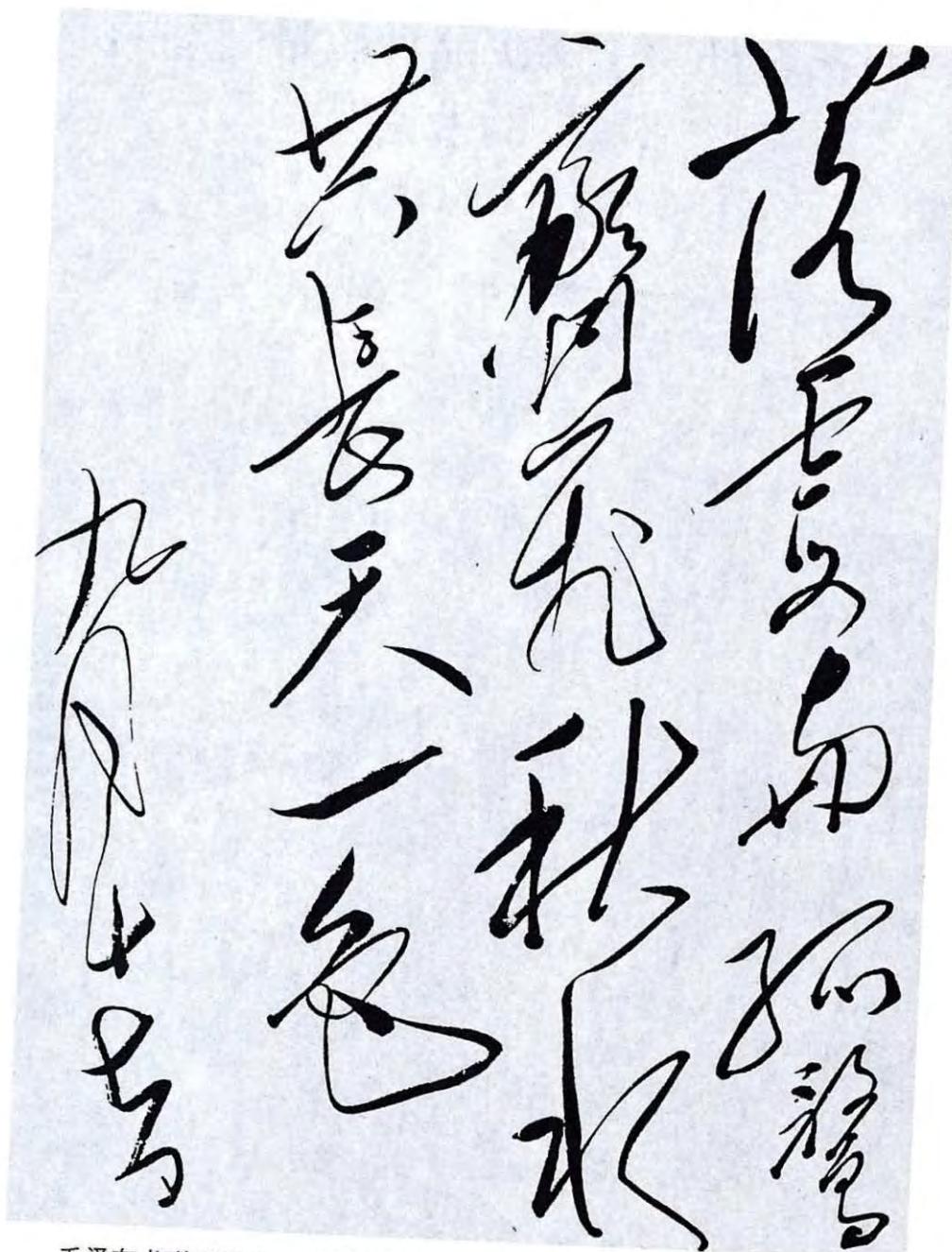
[4]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同志。

书赠毛岸青、邵华联^[1]

(1962年9月17日)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1] 1962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和毛岸青、邵华谈话时，一边背诵王勃《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中的佳句，一边评论，兴奋不已。他坐到桌前，欣然提笔，挥毫写下了这副联句赠给他们。现在毛泽东手书的这副摘句联悬于滕王阁高约3米的立柱之上。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杨开慧所生。邵华，毛岸青之妻，1938年生于陕北延安，1960年和毛岸青结婚，在军事科学院工作。



毛泽东书赠毛岸青、邵华的联句。

对冶金部关于解决品种质量问题的 报告^[1]的批语^[2]

(1962年9月14日)

江青阅，很重要。

退毛。

九月十四日

[1] 冶金工业部党组1962年9月11日关于解决品种质量的情况和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近几年来在品种质量上取得了很大成绩。（1）目前冶炼的钢种已达850个（1957年为372个），合金钢比例将从1957年只占3%增至今年占8%，优质钢今年将产200万吨（1957年为70万吨）。（2）轧制钢材中的短线品种将从1957年占钢材总量的42%增为今年占56%，其中24个稀缺品种将从1957年占钢材总量的15%增为今年占28%。（3）冶金系统已有7个专门的研究院，技术人员约4000名，今后将逐年增加到1万人。（二）修正主义不要我们自力更生。苏联不给我们高级合金钢的技术资料，又禁止苏联专家向我们传授这方面的技术。重要轧机也不给我们，企图要我们永远依靠它，受它的控制。（三）农业技术改造和国防尖端用的品种目前还不能完全做到自力更生。一般机械所需金属品种现在我们能解决90%以上，比较高级的化肥、电站设备、飞机所需金属品种我们能解决80%，还有10%至20%的品种有待今后攻坚解决。（四）需要时间，很有希望。我们估计，金属品种的大致齐全，需要20余套关键性的轧机，它的

制造、安装和技术掌握要在1970年左右可能达到目标。同时，还需要解决各个品种的数量使其达到适当的比例。

[2] 这个批语写在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1962年9月11日随送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现在写了一个关于冶金工业的品种质量及有关自力更生问题的报告，主要是想从最近几年来的品种质量有很大进步这个侧面，说明目前我国所达到的水平。如主席能抽出时间，我希望找主席谈一次。

给杨尚奎^[1]的信

(1962年9月14日)

杨尚奎同志：

邵式平同志提出的几项意见^[2]，请你与刘俊秀及其他在京同志谈一下，提出你们的意见。中央搞的农业和商业等文件，是否已将邵的某些意见包括进去了？《人民公社六十条》之外，是否还要搞一个《试办章程》？请将你们的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

[1] 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2] 指江西省省长邵式平1962年8月7日对巩固农村集体经济问题提出的三条意见：（一）建议中央搞一个农村人民公社试办章程草案。在组织上要明确社员的权利、义务和人民公社的民主集中制。干部应由民主选举，要规定只有社员才能当选为公社干部。原则上必须由社员自己负责办好公社，社员有权选举干部，干部必须接受社员监督。不称职的干部，社员经过法定手续，可以罢免。这是当前巩固集体经济的必要措施。（二）交换问题。产品交换权与所有权要相适应。既然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基层供销社就应以公社为单位，以生产单位（集体所有）为交换单位，这对巩固集体经济是有好处的。（三）非农业人员下放到公社仍然是非农业人口，吃国家供应粮，这等于没有下放。城市人员转移，也等于没有下放。这样并没有因下放人员而减轻国家安排粮食困难的程度。

对《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一文的批语

(1962年9月15日)

少奇^[1]同志：

此文^[2]可一阅，如你有时间和兴趣的话。阅后交陈伯达^[3]同志一阅。然后还我。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

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

[1] 少奇，即刘少奇。

[2] 北京大学教授周辅成写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62年9月9日《文汇报》上。文章讲了以下四个问题：伦理学来源于阶级斗争；为奴隶制社会生活所决定的特点；围绕“中庸”“和谐”为中心的表现形式；争论的问题与派别。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为日本工人朋友们题词^[1]

(1962年9月18日)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

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

[1] 毛泽东1962年9月18日接见了由日本工人教育协会副会长宫川实率领的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团，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且为日本工人朋友们写了这个题词。当时对题词没有报道。1968年，在这个题词六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用第一版一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个题词，刊载了题词手迹。

毛泽东为日本工人访华团的题词。

对《永不走路，永不摔跤》 一文的批语^[1]

(1962年9月24日)

印发各同志^[2]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毛泽东
九月二十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1962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载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一文的上方。文章作者是红旗杂志社编辑阎长贵。文章说，只要工作就可能犯错误受挫折，谁要是怕犯错误和怕受挫折，而不敢做工作，那么这样的人也就永远不会很好地工作。人们正是在“吃一堑，长一智”，接受了错误和挫折的教训而变得聪明起来的。有些人以为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殊不知不工作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同志。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2年9月24日上午)

现在是十点，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重要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三个是党内团结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薄一波说明。另外，还有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

会议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会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实际问题在八、九两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不需要很多时间了，大约三天就够了，二十七号不够就开到二十八号，至迟二十八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阶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

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重提阶级斗争。

那末，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是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

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〇年下半年

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月、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〇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〇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〇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

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刘□□，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的党，恐怕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了，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阿联偏右，出现了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它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一千万人口，法国八十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作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

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问题，

我看还是照我们原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黑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的好，改好了就好嘛！李维汉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维汉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很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允许我犯错误，允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的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广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们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

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可不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抄者按：此指对敌斗争）。现在已经组成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也没有杀嘛。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再搞清楚。把问题说清楚，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专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爆破案、杀人放火的人。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上层建筑。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想要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得不好就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

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方向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请刘少奇宣布那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

（刘少奇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习、张、黄、周^[1]，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的头脑。

一九五九年八届九中全会胜利粉碎了彭反党集团向党的进攻。十中全会又一次揭露彭反党活动的一高饶反党分子成员习仲勋。

官僚主义小则误国误民，大则害国害民。

第一，不调查，不研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主观瞎指挥的官僚主义。

第三，忙忙碌碌，不抓政治，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发展严重了，一种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堕落，一种是互相勾结，敌我不分，官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温床。

[1] 彭、习、张、黄、周，指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

治官僚主义的办法：接触群众，接触实际。

三自：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夜郎自大。

一高：高官厚禄。

一爱：爱形而上学，爱好资产阶级思想方法。

爱好形而上学，缺乏两分法，这表现在爱讲成绩，不讲缺点，
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

遇事不作全面分析，扶得东来西又倒。



1962年9月，毛泽东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1962年9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空军击落国民党U-2高空侦察机的情况。



1962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在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关于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情况的汇报。



1962年9月，毛泽东接见击落美制U-2高空侦察机的低空导弹部队某部营长岳振华。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 对工业支援农业的指示

(1962年9月24日)

搞了四年，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不大自觉，不大愿意。巩固集体经济有两方面：一是政策，二是支援农业。从长远来说是农业的技术改造，总的是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科学的研究，没有抓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说：科学院是搞尖端的。

要抓农业技术改造。

民主与集中，集中与分散，分散主义首先是中央（指综合部门）。农业机械化要搞个文件，二十五年左右实现机械化，同时实现工业化。有的同志在困难面前躺下。是消极好，还是鼓足干劲好？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提起注意。

对困难发生消极情绪是不是思想问题？

计委、经委、工交各部要加强支援农业。要抓紧改，这是机会，还来得及。

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公报^[1]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62年9月26日)

—

印发各同志^[3]。如有修改意见，请向中央书记处提出。

毛泽东

九月二十六日

—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群众斗争，反对中华人民共

[1]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这个公报9月27日在全会通过，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草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二、三、四、五、六、七是毛泽东对全会公报草稿的修改。本篇八是毛泽东在9月26日印发的公报稿（八届十中全会文件四十二）上写的批语。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同志。

[和]国及其他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独立国家而进行的种种罪恶活动，其结果适得其反，只是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的面目，使他们更加陷于孤立。

三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坚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也要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

四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五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团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统一战线。

六

尽管过去几年连续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其他困难，国民经济的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又会好一些。

七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八

有一些修改^[1]，请小平^[2]同志再议一次。

毛泽东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



1962年9月28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阮文孝。

[1] 即本篇五、六、七。此外，毛泽东还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外事简报》第一三七期的批语

(1962年9月29日)

送王稼祥、伍修权、刘宁一^[1]同志：

此件值得一阅。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我们做国际工作的同志必须注意这一点。否则一定会上当。如有必要，请你^[2]找若干做外事工作的同志（例如十几个人，有外交部、外办、外交学会、对外文联^[3]等处的同志参加）关〈开〉一次座谈会，以日本事件及其他事件（多得很）为例，引起警惕。

毛泽东

九月廿九日

[1]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伍修权、刘宁一，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2] 指王稼祥。

[3] 即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 试点问题的批语^[1]

(1962年9月29日)

刘、周、邓^[2]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3]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月、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62年9月2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上。这期增刊登载了反映国家机关党委曾确定几个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的材料。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登载的这个材料说，今年六七月间，国家机关党委曾向几个单位分别布置了个别右派的甄别试点工作，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人的甄别试点工作，有的没有进行，有的刚开了个头，或者只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就停止了。中共中央1962年8月17日对中央统战部7月26日“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复示（中发〔62〕429号文件）指出：“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报告中所提‘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

付还，查后告我。

毛
九月廿九日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和江青接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哈蒂妮·苏加诺。图为毛泽东和苏加诺夫人握手。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江青接见苏加诺夫人哈蒂妮·苏加诺。

对李先念关于改进商业工作 问题的来信^[1]的批语

(1962年9月30日)

刘、周、邓^[2]、先念、富春、震林、一波^[3]各同志阅。我认为此信写得很好，接受批评，认真办事。这样就有主动了，就不是见事迟，动手慢了，就不是官僚主义了。其他部、委也应当采取此种态度。附件^[4]可看可不看。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1962年9月28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主席9月22日批示我们注意西南小组讨论商业问题简报的内容，我们觉得西南小组以及全会其他小组对商业工作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很宝贵，很重要。我们要切实检查，认真改进。经请示邓小平同意，我们打算在国庆节后，立即召集商业、粮食、供销社、外贸、财政、银行各部党组成员开会，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讨论如何具体执行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特别是抓支援农业、改善经营管理、改进工作作风问题，坚决扭转见事迟、动手慢、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以便鼓足干劲，做好工作。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4] 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简报西南组第41号。

退毛。

毛泽东
九月卅日



1962年9月，毛泽东和阿根廷民间艺术团合影。

对西南组讨论商业问题决定的情况简报的批语

(1962年9月)

李先念、陈伯达^[1]二同志阅。此件^[2]内容请注意。
退毛。

[1]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2年9月21日印发的八届十中全会简报西南组第41号。简报说，9月20日上午西南小组继续讨论“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9月9日第二稿）”，并对当前商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一、几年来商业工作是有成绩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努力的。在目前物资少的情况下，商业工作有一定的客观困难，但对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不能忽视的。例如，大量商品物资霉烂损坏，浪费损失十分惊人。而有人对此竟满不在乎，这是值得注意的。有的经济情报，很快地就被敌人窃取。不少商业人员贪污腐化，队伍组织不纯，领导作风上的特殊化和官僚主义也是严重的。在价格、商品分配流转环节和经营管理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对于商业工作中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商业部门应当认真检查，并向全会作一交代。二、“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9月9日第二稿）”对商业工作的成绩作了足够的估计，另外建议对商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需要进行批评和整顿，在文件中也讲一讲，以促使商业工作的改进。“决定”中规定的方针政策，如何组织实施，一些重要问题如何解决，建议另开专门会议研究，作出具体规定。

凡是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 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

(1962年9月)

凡是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1] 这是毛泽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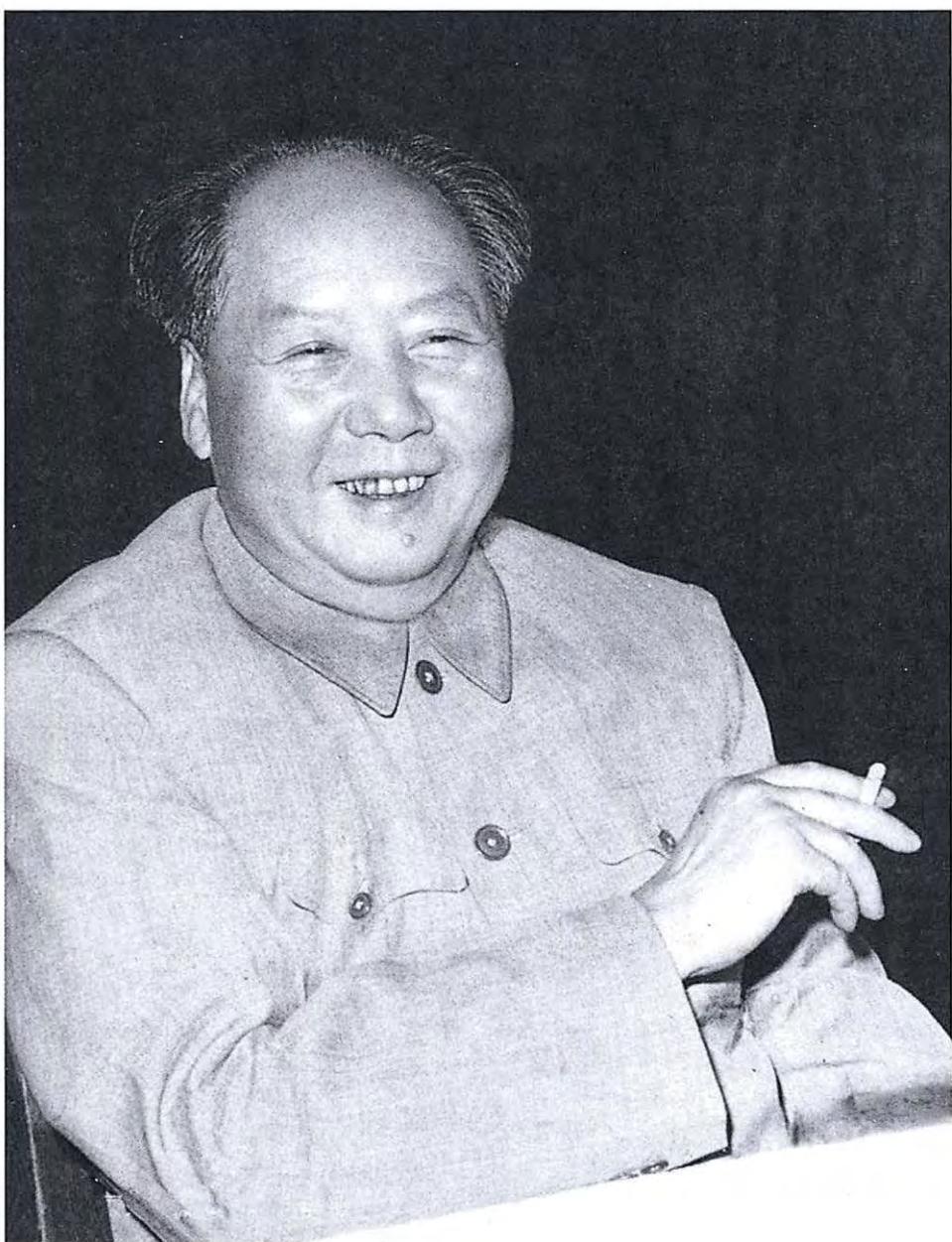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情况 简报上的批语

(1962年9月)

此二件^①，江青阅。退毛。

可看，很好。

[1] 其中一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2年9月16日印发的八届十中全会简报华东组第20号刊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9月14日下午在华东组的发言。陈毅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要批驳这种意见。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我们争取时间，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果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对外斗争，而且也会影响国内局势。另一件不详。



1962年，毛泽东在北京。

关于电台的指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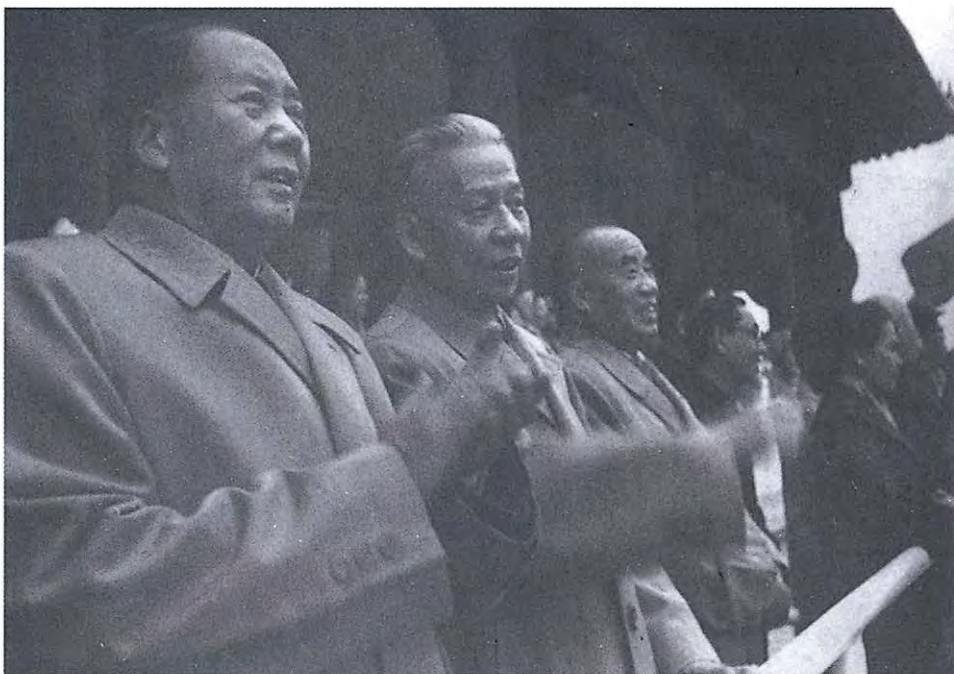
(1962年10月1日)

最近中东许多国家发生政变。搞政变的人开始就要夺取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说话，原政府的声音人们就听不到了。我们的电台怎么样？是否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要从部队调一个强的干部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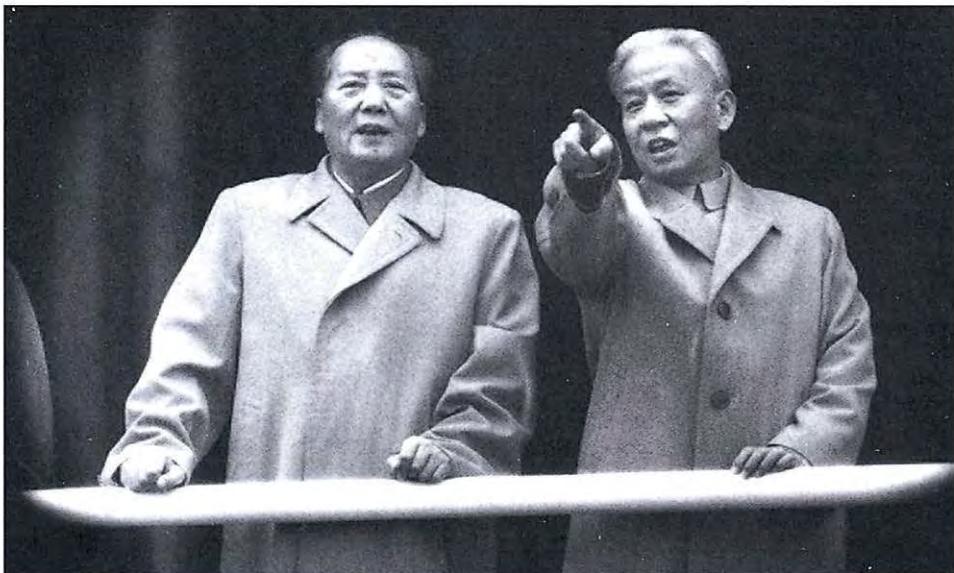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周恩来讲话的一部分。



1962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庆祝建国十三周年大会主席台上。



1962年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欢度国庆节。



1962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2年10月6日，毛泽东接见前来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的少数民族参观团。

毛泽东等祝贺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的电报^[1]

(1962年10月3日)

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值此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对促进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和两国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共同高涨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相信，随着中蒙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两国的这种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关系，必将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的电报。祝贺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

日益巩固和加强。

祝蒙古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蒙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成立十三周年的电报

(1962年10月6日)

柏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博士，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柯伦斯教授博士：

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兄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并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下的西德军国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现在，美帝国主义正积极支持西德军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侵略挑衅，严重地威胁着欧洲和世界和平。这一切不仅遭到了德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受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厉谴责。我们再次重申：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关于缔结对德和约并在此基础上使西柏林局势正常化的严

正立场和合理主张。我们深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义以及争取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正义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中德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一向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中国人民将始终不渝地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致力于增强中德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并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一道，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

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德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月六日

对《恐“敌”病一例》^[1]的批语

(1962年10月8日)

刘、周、朱、邓、瑞卿、富治^[2]同志阅。此事拟在常委会上谈一谈。

毛泽东
十月八日

阅后退毛。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62年10月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348号上登载的《恐“敌”病一例》材料。材料说，据黑龙江省北安市委宣传部反映，今年8月间，该市双泉公社党委书记邱玉林夜间鸣枪赶狼，当地许多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听到枪声后误认为“敌人攻来”，惊恐万分，纷纷逃避。这种“精神状态”很值得注意。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富治，即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及利亚国庆的电报

(1962年10月31日)

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理艾哈迈德·本·贝拉阁下，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费尔哈特·阿巴斯阁下，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总书记穆罕默德·赫德尔阁下：

值此阿尔及利亚革命武装起义纪念日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和阿尔及利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革命武装起义标志着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坚韧不拔的气概，通过七年多的武装斗争，愈战愈强，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阿尔及利亚人民这一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极大地鼓舞了非洲和世界其他各地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志。我们深信：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艾哈迈德·本·贝拉总理的领导下，阿尔及利亚人民将会团结一致地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以及建设自己祖国的崇高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阿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战斗友谊。中国人民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胜利看成是对自己的有力支持。中国人民一向坚决支持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将永远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到底。

祝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祝中阿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对罗瑞卿^[1]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2]的批语

(1962年11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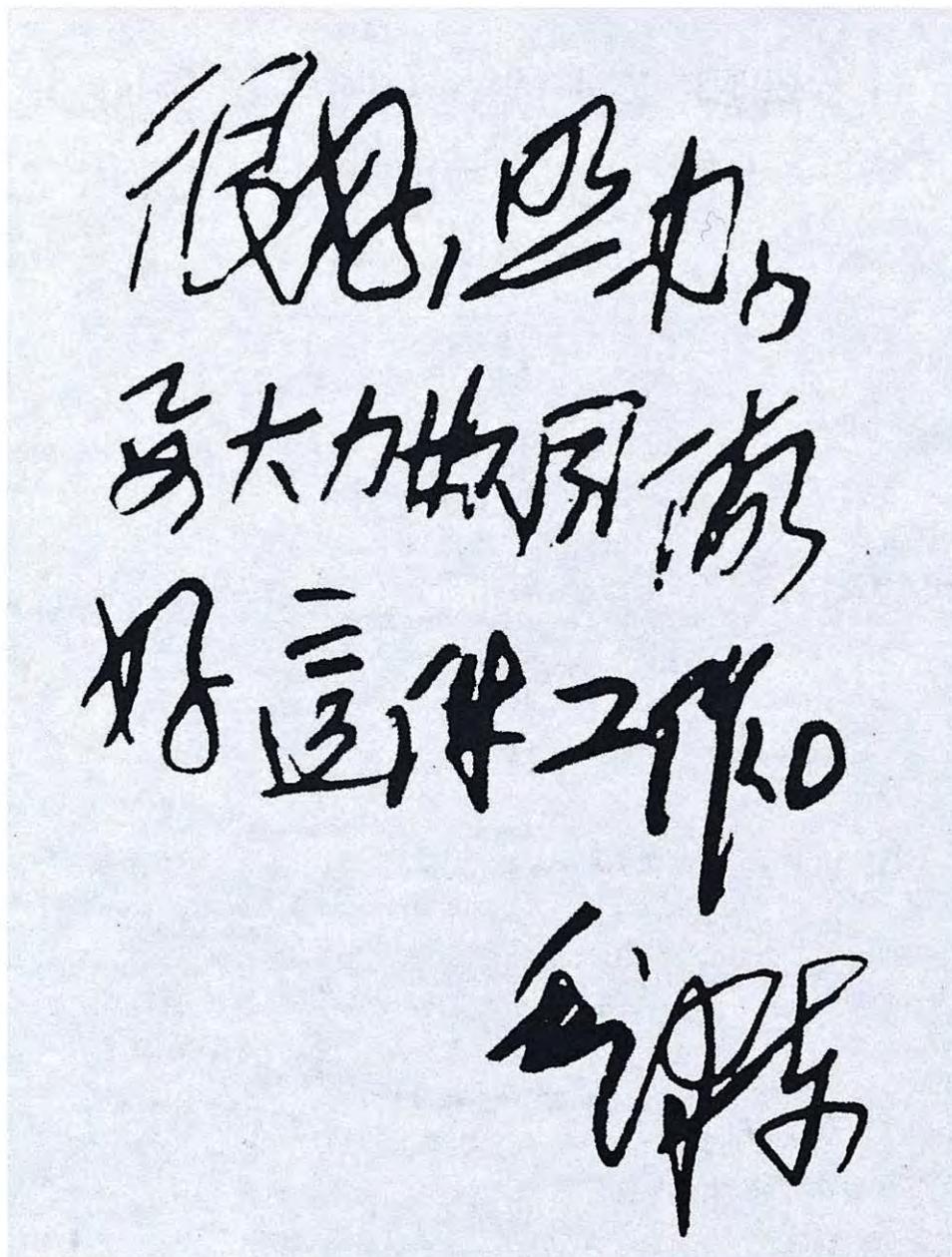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毛泽东

十一月三日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罗瑞卿1962年10月30日给毛泽东、党中央的报告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因此，除了二机部本身要做艰苦努力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院所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离预定的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个建议在10月19日国防工业办公室向中央常委汇报时，刘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我们考虑最好由周恩来总理抓总，贺龙、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批准二机部关于争取两年内实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图为毛泽东批示的手稿。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四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2年11月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热烈的衷心的祝贺。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开辟了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纪元。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沿着十月革命所指明的争取彻底解放、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辉大道，向帝国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现在，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正在蓬勃高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这个革命洪流奔腾前进。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叛乱，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进攻，克服了各方面的重重困难，胜利地把苏联

建设成为具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对维护世界和平、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在，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正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对兄弟的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的欢欣。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我们两国的兄弟友谊和团结的加强和发展，符合于中苏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高利益。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继续为维护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为维护和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竭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苏联人民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到底。

祝兄弟的苏联人民在宏伟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巨大的成就，祝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

给杨开智^[1]的信

(1962年11月15日)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2]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

敬祝大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1] 杨开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

[2] 杨老夫人，指杨开智和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金融、铁道兵、财贸等专业会议代表。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日 和解放日的电报

(1962年11月27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欣逢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五十周年和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八周年纪念日，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和最诚挚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五十年前，阿尔巴尼亚人民为了反对外国统治者的残酷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且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后来，在反对法西斯的伟大解放斗争中，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又进行了英勇无畏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法西斯侵略者，终于使自己的祖国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并且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十八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久经考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表现了伟大的英雄气概，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艰苦奋斗

的革命干劲，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阿尔巴尼亚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周围，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进行着忘我的劳动。我们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阿尔巴尼亚人民向着自己既定的伟大目标胜利前进。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坚强的一员。它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西南前哨，为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为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获得世界人民热烈的赞扬和崇高的评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一贯忠实于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坚决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以南斯拉夫铁托^[1]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毫不调和的原则性的斗争，对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各种斗争考验中已经证明了，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英雄的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荣的、战斗的、坚强的党，它不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坚贞的战斗队。中国人民对于能有这样坚强、这样亲密的战友而感到自豪。

中国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亲密兄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在为共同事业而进行的共同斗争中，中阿两国人民一向同甘

[1] 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共和国总统。

苦，共命运，相互支持，紧密合作。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团结在一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成就。祝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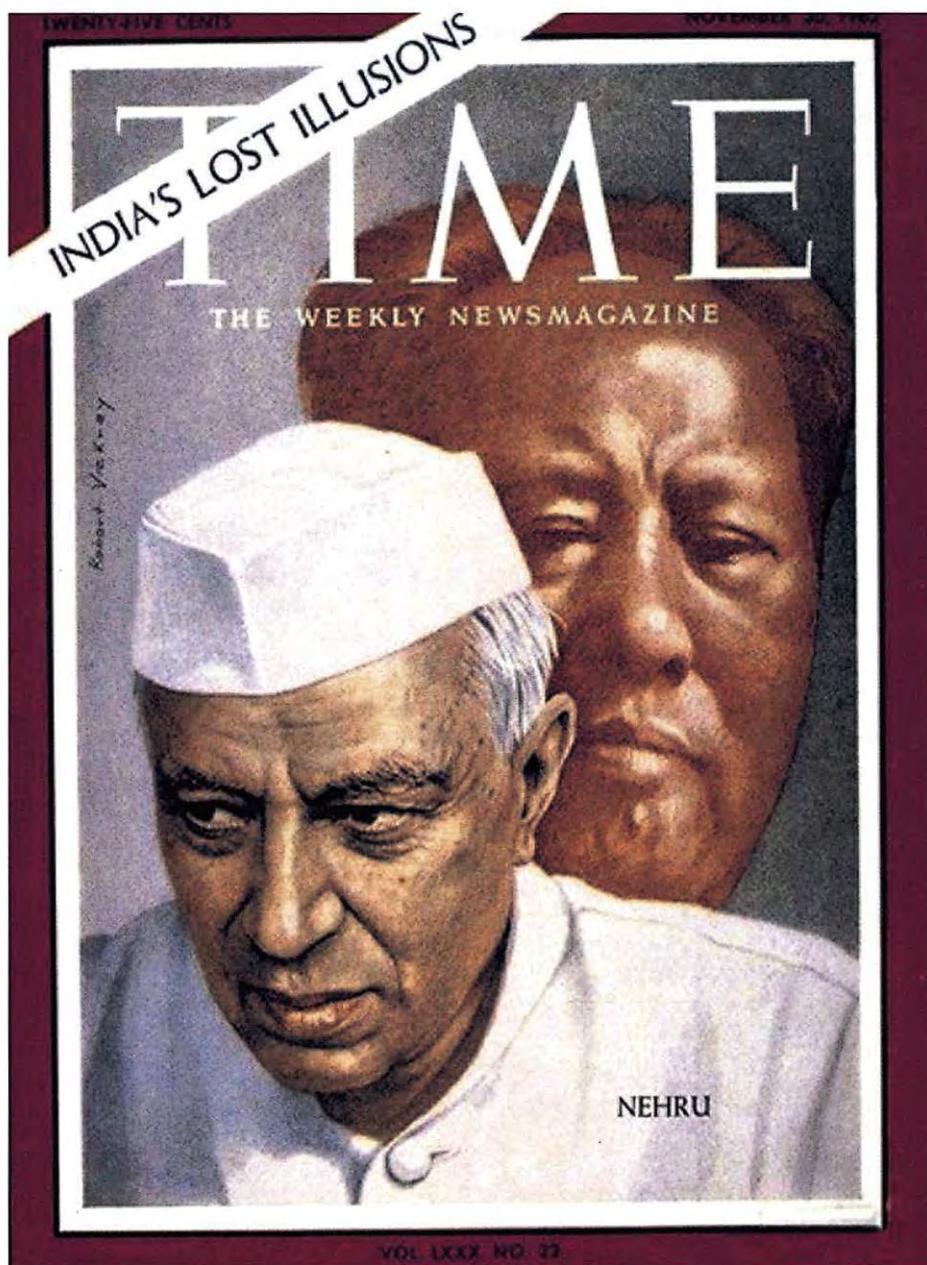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1962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一同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在一份外交信稿^[1]上的批语

(1962年11月27日)

总理：

近几天一些外交文件，在措词方面有些欠当，这就是一件，我改了一点^[2]，请你再阅。

毛

廿七日早

[1] 指外交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2年11月27日给缅甸联邦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的信稿。

[2] 毛泽东在审阅这份信稿时，将“阁下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持的公正态度……对巩固亚非国家的团结、维护亚洲的和平，也将是珍贵的贡献”一句中的“珍贵的”改为“有益的”；将“中印边境上原先十分险恶的局势已经开始有了好转”一句中的“原先十分险恶的局势”改为“原先的那种局势”，将“转机”改为“缓和”；对“仅仅中国一方面采取这种行动，还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冲突不再起，也不利于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一句，删去“完全有效地”，将“防止冲突不再起”改为“防止冲突的再起”，删去“也不利于”。



1962年，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

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的批语

(1962年12月14日)

小平^[1]同志：

此文^[2]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零时廿五分

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人民日报》原题为《坚持真理，分清是非，团结对敌》的一篇社论稿，毛泽东审阅时改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篇社论在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目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对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的一批材料^[1]的批语

(1962年12月22日)

—

柯老^[2]:

此件很重要，请你印发会议各同志^[3]。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二日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62年12月1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一〇九期刊登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的材料。材料的主要内容有：一、恩格斯逝世到斯图加特大会；二、哥本哈根大会到巴塞尔大会；三、大战爆发到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四、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五、昆塔尔会议；六、齐美尔瓦尔得的破产与第三国际的建立。另有附件：一、巴塞尔大会宣言；二、关于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政党的叛变的几个文件；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宣言；四、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几个文件。

[2] 柯老，指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3] 指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同志。

二

古诗一首。咏后唐李克用^[1]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崇〈存〉勣诗。

三垂冈^[2]

英雄立马起沙陀，
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
连城犹〈且〉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
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瑟〉三垂冈下〈畔〉路，
至今人唱百年歌。

[1] 李克用，唐朝沙陀部人，曾封为晋王。后其子李存勣建立后唐，他被尊为太祖。

[2] 《三垂冈》这首诗为清朝诗人严遂成所作，毛泽东将它写在这一期《宣教动态》最后一页的空白处。

关于请刘晓^[1]等来杭州一谈 给刘少奇等的信

(1962年12月25日)

少奇、恩来、小平^[2]同志：

我想请刘晓、伍修权、赵毅敏、廖承志^[3]四位同志来杭州一谈，听取他们所知的情况和意见。他们可以缓缓南来，沿途（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作点调查研究，在年初（一月六日以前）到杭州即可。如你们及他们四位都同意的话，请即照办。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五日

[1] 刘晓，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2] 恩来，即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伍修权、赵毅敏，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廖承志，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冬云》诗^[1]一首和给林克^[2]的信

(1962年12月26日)

冬云诗一首

雪压冬云^[3]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泄，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4]。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1] 这首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发表时，“高天滚滚寒流泄”一句改为“高天滚滚寒流急”。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3] 冬云，作诗日期12月26日（作者的生日），在当年冬至后的第四天。旧说“冬至一阳生”，所以诗中说“大地微微暖气吹”，这里是比喻虽在冬至，大地并没有完全被寒流控制。

[4] 黑，熊的一种，现在叫马熊或人熊。

二

林克同志：

请将诗一首付印，于今天下午印成50份，于下午六时前交我为盼。

毛泽东

廿六日晨七时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油画）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2年12月29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格·乔治乌-德治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毛雷尔同志：

当此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罗马尼亚人民、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十五年前的今天，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君主政体，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开辟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祝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罗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

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兄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对《陶里亚蒂^[1]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一文的批语^[2]

(1962年12月30日)

小平^[3]同志：

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二时

[1] 陶里亚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2] 这篇文章发表在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文艺报》刊载的三篇文章的批语

(1962年12月31日)

江青：

这里有三篇文章^[1]，值得一看，看后退我。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四时半

周信芳、盖叫天两文^[2]也已看过了，觉得还不坏，盖文更好些。

[1] 指1962年12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十二期刊载的张光年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肖三的《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和时乐蒙的《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是纪念《国际歌》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的。

[2] 指《文艺报》第十二期刊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的《必须推陈出新》和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吾日三省吾身”》两篇文章。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革命 胜利四周年的电报

(1962年12月31日)

哈瓦那

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在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人民、中國共產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英雄的古巴人民、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革命政府，致以最热烈和最诚挚的祝贺。

古巴革命的胜利，是当代一个极其伟大的革命事件。英雄的古巴人民，在他们伟大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古巴的反动统治，并在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后，又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西半球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英雄的古巴人民，一直坚持不渝地对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最近，古巴人民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严重的战争挑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古巴人民钢铁般地团结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周围，不畏强权，不怕暴力，坚

持革命原则，坚持五项正义要求，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斗争，保卫了古巴的独立和主权，保卫了古巴的革命，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荣誉，为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巴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的胜利，这对于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古巴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坚信，英雄的古巴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阴谋。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古巴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古巴共和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都站在古巴人民一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革命政府的正确路线，永远同兄弟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祝古巴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62年，毛泽东会见古巴工会代表团。



1962年，毛泽东会见古巴工会代表团。



1962年，毛泽东接受古巴文化代表团赠送的礼品。

毛泽东等向苏联领导人 祝贺新年的电报

(1962年12月31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1963年新年来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在过去的一年里，伟大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的喜悦。我们衷心地预祝兄弟的苏联人民在新的一年里，在建设共产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新的一年中，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竭尽一切努力，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苏联人民在一起，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

原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胜利而奋斗。

祝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团结万古长青，祝你们身体健康，祝全体苏联人民新年快乐！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批评新华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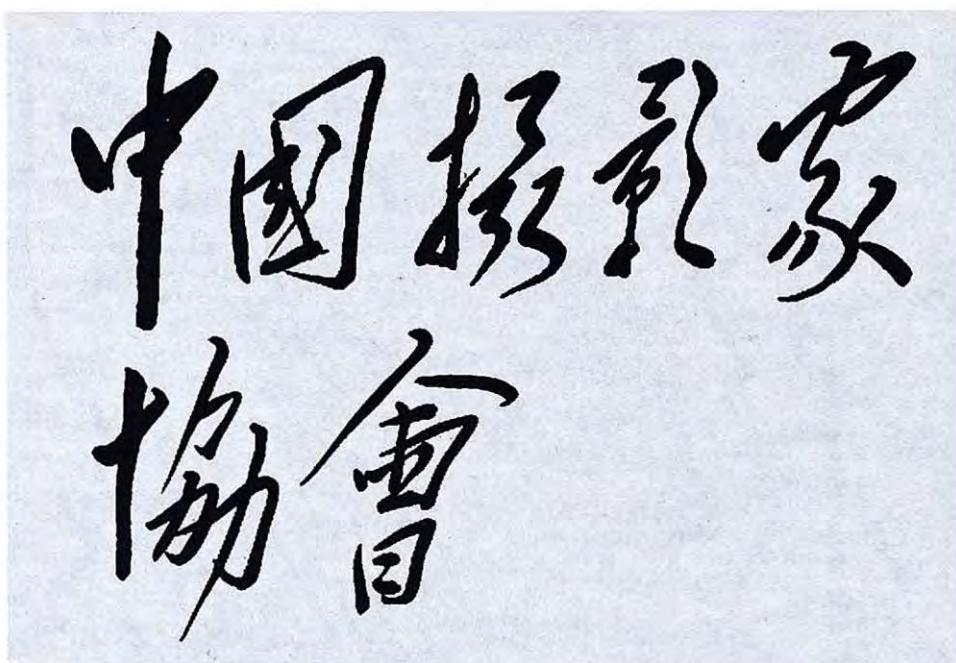
(1962年)

《内部参考》登那么多包产到户的材料是错误的，今后不要再登。办内部参考要有方向。

为“中国摄影家协会”题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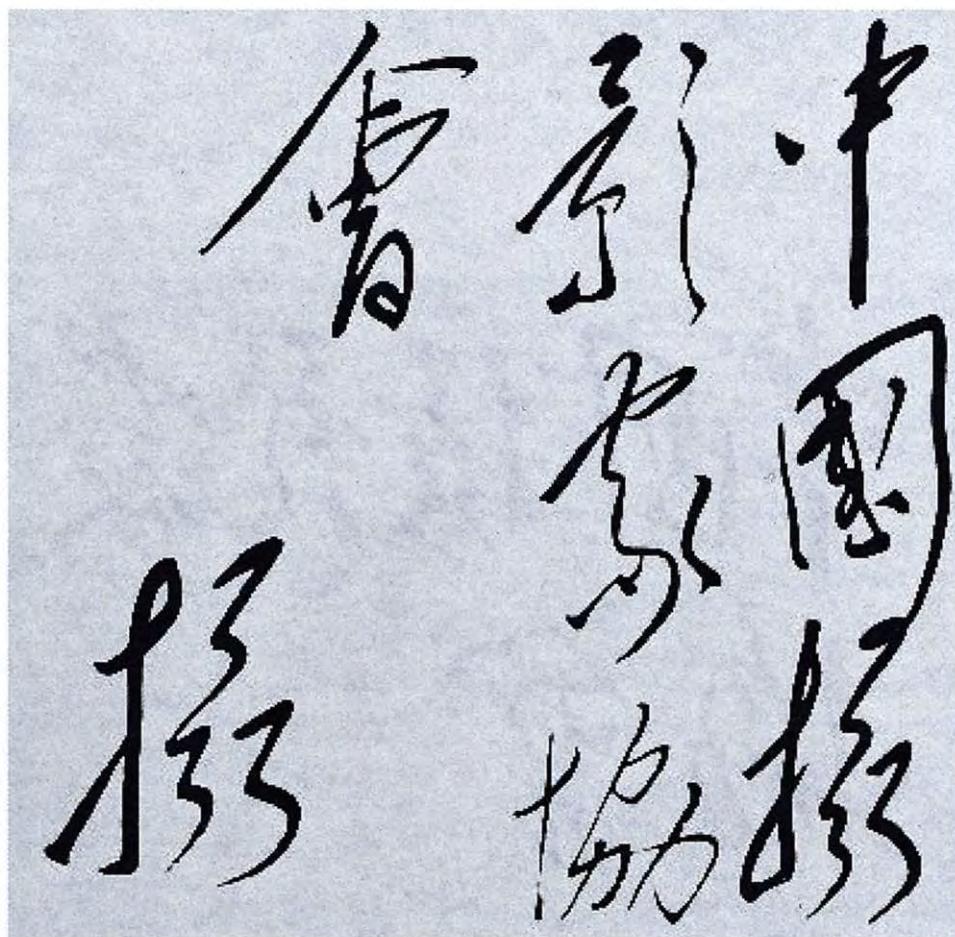
(1962年)

中国摄影家协会



1962年，毛泽东在杭州为“中国摄影家协会”题写的会名。

[1] 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于1956年12月，当时定名为“中国摄影学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摄影组织。在1979年的全国第三次会议上，更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简称“中国摄协”。1962年毛泽东在杭州给“中国摄影家协会”题写了会名。



1962年，毛泽东在杭州为“中国摄影家协会”题写的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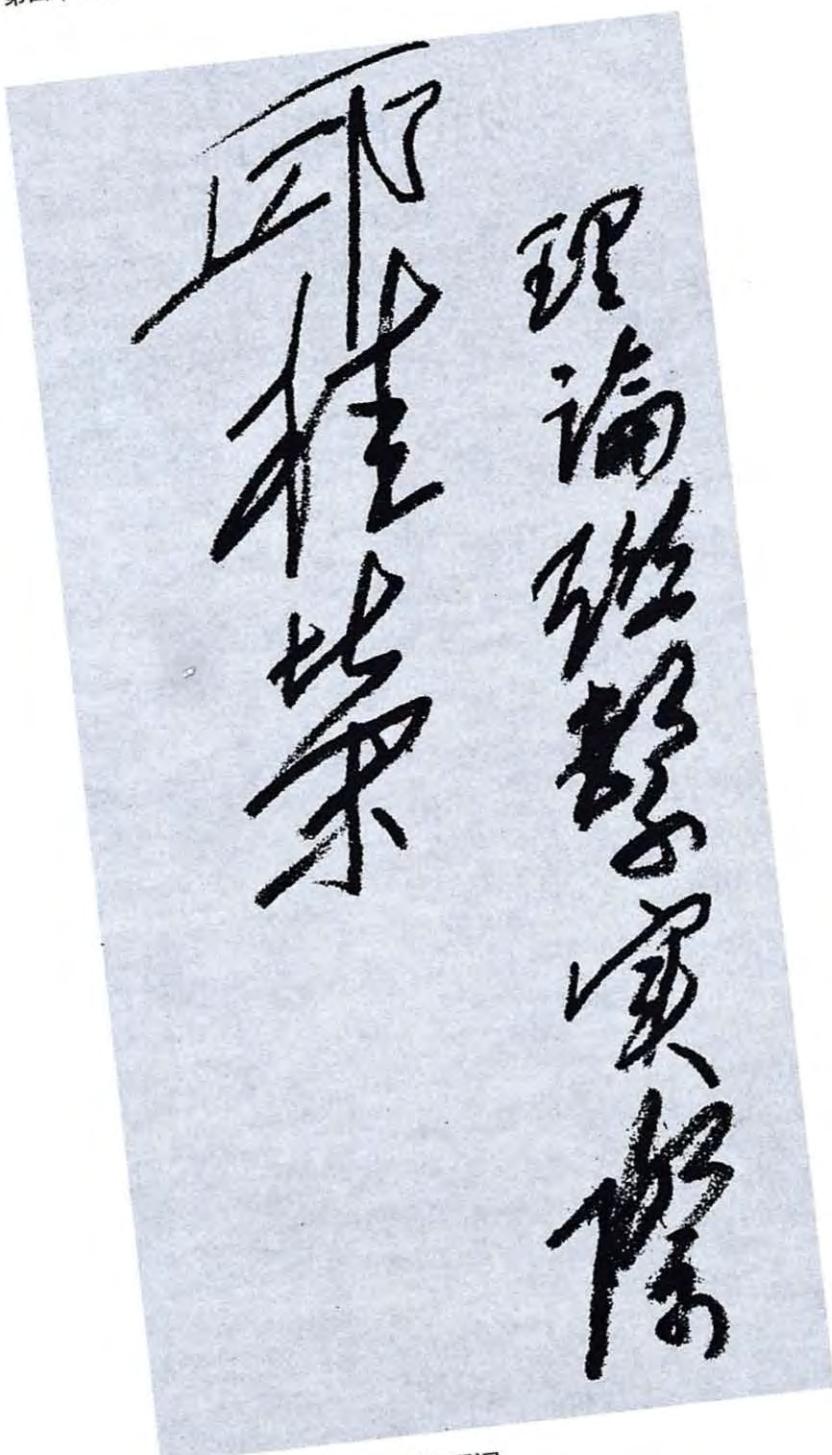
为邱桂荣题词^[1]

(1962年)

理论联系实际。

邱桂荣

[1]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邱桂荣写的题词。



毛泽东为邱桂荣的题词。

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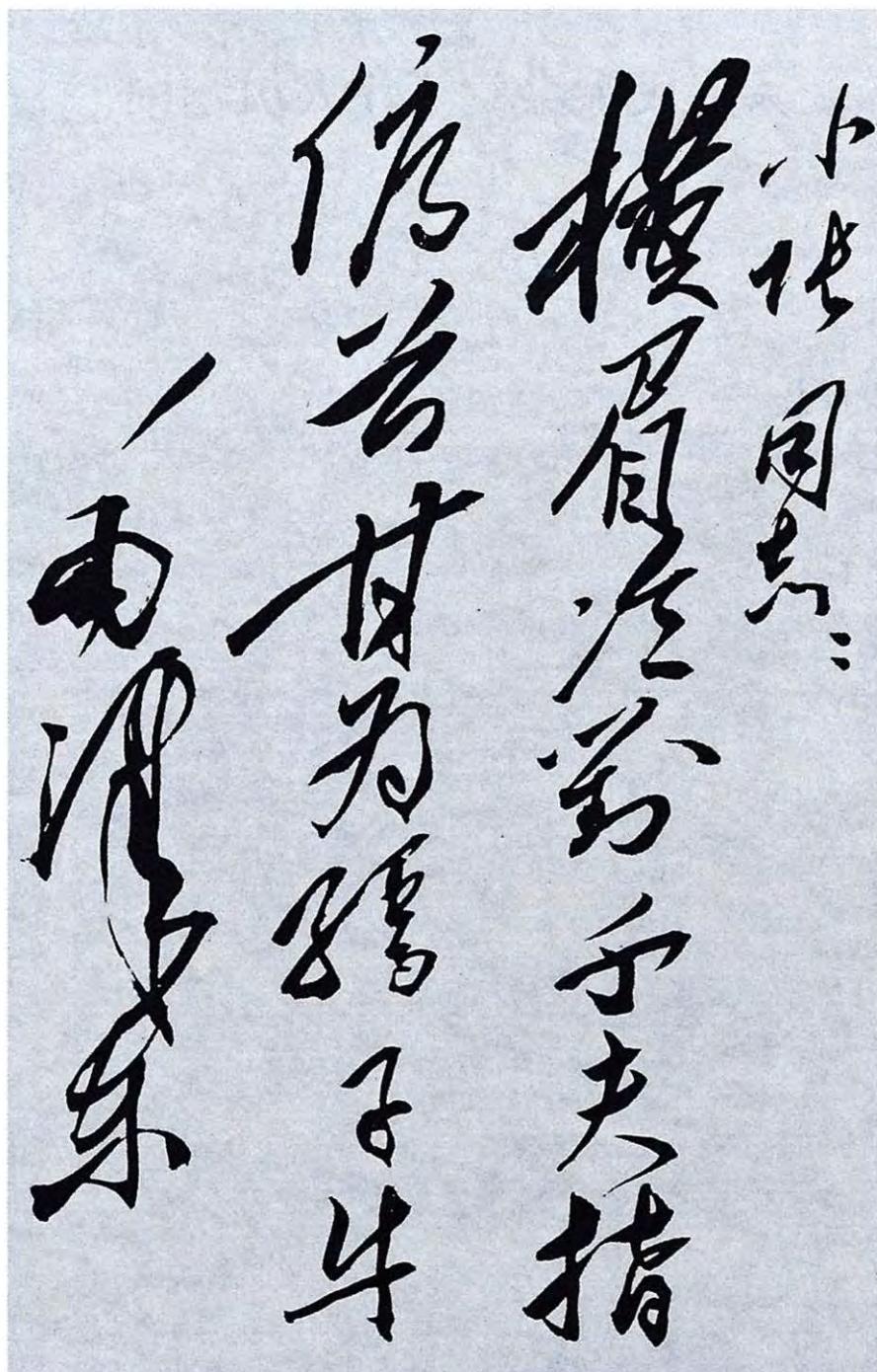
(1962年)

小张同志：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毛泽东

[1] 现在所见有一件手书：上款为小张同志，后面有冒号，下款为“毛泽东”。小张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工作。



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小张同志的题词。

1963



1963年，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

关于送阅《史记·项羽本纪》的批语

(1963年1月3日)

《项羽本纪》，送各同志阅，几天还我不迟。

这个新版《史记》^[1]，标号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

毛泽东

一月三日

[1]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西汉司马迁撰写，全书共130卷。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新版《史记》，指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点校本。

给李讷^[1]的信

(1963年1月4日、15日)

—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2]，好，你不会再做河伯^[3]了，为你祝贺！

爸爸

一月四日

[1]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

[2] 秋水篇，即《庄子·秋水》。李讷当时在学校里正学习《古代汉语》中“庄子”课程。

[3] 河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庄子·秋水》中的主人公之一。

二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爸

一月十五日



1963年，毛泽东在上海锦江俱乐部花园。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

(1963年1月6日)

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本来是观念论者，接受唯心论，以后接受青年黑格尔和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学说。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他和恩格斯一起，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改造过来。经过了哲学的革命、经济学的革命、社会学的革命，形成了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阶级社会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以这样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历史唯物论。在旧社会，接受旧社会的遗产，加以改造，使唯心辩证法变成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变成辩证唯物论，唯心论的历史观变成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经济学也是如此，由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好的内容，如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以改造，变成阶级斗争的学说，即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

[1] 1963年1月6日下午5时至6时半，毛泽东在杭州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裤田里见等谈话。日方参加者有：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冈正芳，中央委员、日共北海道委员会委员长西馆仁，中央委员、中央宣传教育文化部副部长冈本博之，中央委员平苇信行。中方参加者有：廖承志、伍修权、赵毅敏、江华等。这是毛泽东和日共中央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级专政，建立政党。这是常识，全体共产党员都知道。但是现在几十个党的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的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哪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都说自己是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孙中山和蒋介石也都是这样说的。美国反动派也说自己是全民的。日本也是如此，垄断资本说他自己代表全民。

只有共产主义者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说他代表全民。他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不代表资产阶级，甚至也不代表小资产阶级。他代表无产阶级，引导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变成农民的党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我党在很长期间，一直被美国资产阶级认为代表农民，托派也这样说。其实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它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

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绝大多数人口的是共产党，不是社会党，更不是自由民主党。



1963年1月7日，毛泽东会见锡兰总理西丽沃·玛班达拉奈克夫人。

在中组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

(1963年1月8日)

小平^[1]同志：

此件^[2]请准备印发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
一月八日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中共中央组织部1962年10月23日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的报告。报告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各地对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普遍地引起了重视，做了许多工作，过去削弱和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情况有了很大转变。但是各地区贯彻中央指示还很不平衡。还有一些地方不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体领导不健全，党内生活不正常。另外，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的极端民主化和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开始滋长。因此，我们认为，今后必须：一、继续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地学习毛主席和中央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指示，全面领会和掌握指示的精神。二、按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党委会、常委会以及领导干部的组织生活会，健全组织制度。三、为了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使党委摆脱行政事务，采取一系列措施发挥政府和各部门的作用。大权必须独揽，小权应当分散。四、加强对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的检查。报告最后建议中央尽早把党的工作条例草拟出来。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1963年1月9日)

小小寰球^[1]，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2]，
蚍蜉撼树^[3]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4]，
飞鸣镝。

[1] 寰球，指全地球。

[2] 蚂蚁缘槐夸大国，唐李公佐小说《南柯太守传》载：有个叫淳于棼的人，梦见自己在“大槐安国”做了驸马，又在南柯郡当了20年太守，权势显赫。等到妻子死后，官被解除，槐安国用车子送他回家。醒后追寻梦游之处，原来是在一株住着一堆蚂蚁的大槐树穴中。

[3] 蚍蜉撼树，蚍蜉，大蚂蚁。撼，摇动。这是对不自量力的人的嘲笑。唐韩愈《调张籍》：“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4]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长安，唐朝都城，即今西安市。前半句化用唐贾岛《忆江上吴处士》一诗“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句，表示秋风已起虫子不好过了。鸣镝，古时一种射出去能发声音的箭，也叫响箭。这里借喻革命力量的声讨。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附：郭沫若原词

满江红

沧海横流，
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
加强团结，
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
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
东方白。

太阳出，
冰山滴；
真金在，
岂销铄？
有雄文四卷，
为民立极^[1]。
桀犬吠尧堪笑止^[2]，
泥牛入海^[3]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
乾坤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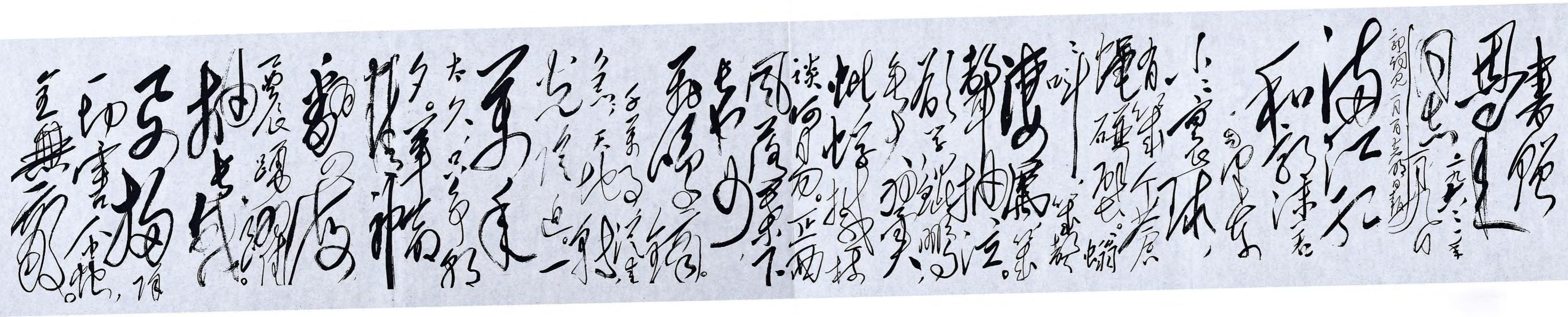
[1] 立极，树立准则。

[2] 桀犬吠尧堪笑止，桀是夏代最末一个帝王，是个暴君。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桀之犬可使吠尧”（参见《汉书·邹阳传》）。堪笑止，可笑已极。

[3] 泥牛入海，宋僧道原《景德传灯录》：“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直至如今无消息。”



《小小寰球》(诗意图)



毛泽东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1]

(1963年1月12日)

凡是马列主义政党都不会接受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但是修正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我们党的第一任书记陈独秀就是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成了托派，大概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病死的。今天，我们有少数党员和干部还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制度里还有资产阶级残余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存在。旧的官僚资本被我们没收了，民族资本被我们赎买了，但资产阶级的人还存在。十三年来，资产阶级中间的很多人接受了改造，愿意跟我们走，但另一部分人就不接受改造，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右派，坚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此外，我们社会里还有一个比较活跃的阶层，就是农村的富裕中农。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不过不占优势，是少数，要改造他们也很困难。美国人说我们好洗脑筋，但这些人的脑筋是洗不清的。你们（指卡瓦略夫妇）在中国住了三年，正是我们困难的几年，你们是知道一些中国的情况的。

（外宾插话略）

[1] 1963年1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接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巴西专家卡瓦略夫妇。谈话在座的委方参加人：委共政治局委员埃·马查多和罗德里格斯、左派革命运动领导人萨埃斯、民主共和联盟代表纳胡尔；中方参加人：杨尚奎、李启新。这是毛泽东和卡瓦略夫妇谈话的一部分。

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会更好一些。我们开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又不会做教育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十三年的经验中，和过去革命时期一样，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

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要和平道路，不要革命。老的修正主义者说，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冒险分子”。

在十九世纪时，还没有无线电，打电报也要通过海底的电线。资产阶级学得会的东西，我不相信无产阶级就学不会。

我已经说过，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农村中的富裕中农，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现代修正主义是战后和平环境滋长起来的思潮。

对《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社论稿的批语

(1963年1月25日)

小平^[1]同志：

廿四日送来的社论^[2]，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下午十一时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邓小平送毛泽东审阅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篇社论发表在1963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小平同志：

10月25日的社論，细~~节~~看后，
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毛泽东

廿五日下午十一时

毛泽东致邓小平信的手稿。

对《再论陶里亚蒂^[1]同志同我们的分歧》^[2]稿的批语和修改^[3]

(1963年2月)

—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4]

—

要提一下一月三十一日我们的那篇文章^[5]，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一篇。

—

送陈伯达同志：

古巴的看法^[6]是正确的，值得一看。

毛泽东

二月六日

四

此件^①也值得一看。

五

伯达同志：

再打清样送我一阅。

毛

六

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我们只好公开回答他们。

七

伯达同志：

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八

现在这篇文章准备就陶里亚蒂等同志多年来发表的错误言论，更详细地进行一次分析和批判，作为我们对他们再一次攻击的回答。待陶里亚蒂等同志看了我们这个回答以后，看一看他们表示什么态度——还要说我们“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吗？还要说我们“十分抽象和概念化”“缺少实际感”吗？还要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解”，对意共的立场是“明显的捏造”吗？还要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巧语掩饰他们的机会主义”吗？待我们看一看，那时再作适当的处理。总之，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是不行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然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

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只许奴隶主们向奴隶们挥舞指挥棒，口中念念有词，说是“团结，团结”，那其实说的是“分裂，分裂”。天下的奴隶们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们要的是团结，坚决不允许一小撮人闹分裂。

九

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

十

陈伯达同志：

有了一点修改。第二章的题目都换了，你看如何？再打清样送我看。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

毛泽东

二月十六日上午七时

十一

请伯达阅后，加以斟酌，再打清样送我看。

毛泽东

十八日上午七时

十二

一种很有趣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了。什么现象呢？就是那些自称手中握有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雄好汉们，却十分害怕他们所使劲地斥责的所谓“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了答辩他们的攻击所写的文章。他们不敢在他们报纸、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他们胆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对我们的答辩文章，不敢让自己国内的人民同它们见面，严密封锁，水泄不通。甚至用强大的电台干扰，不使人民听到我们的广播。可爱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这难道还不

算公平合理吗？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的呢？请回答吧。

十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十四

伯达同志：

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我在第八章，又作了一点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二月廿日上午

[1] 陶里亚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2]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一文，原载《红旗》1963年第三、四期，《人民日报》于1963年3月1日至3月4日发表。

[3] 本篇一和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

辑陈伯达1963年2月3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初稿上的批语和修改。其中一是毛泽东为这篇文章改拟的题目；二是毛泽东在送审稿的第一部分“引言”上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在1963年1月31日《内部参考》第四三一期刊载的《波党刊载文谈古巴人对苏古分歧的看法，说分歧在于苏古对目前世界基本矛盾的实质看法不同》一文上写的批语。本篇四是毛泽东在同一期《内部参考》刊载的《英报报道戴高乐向赫提出“全面改组欧洲”建议，传赫表示欢迎或暂不拒绝》一文上写的批语。《内部参考》上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批给陈伯达作修改文章参考的。本篇五和六是毛泽东在陈伯达2月3日以后送阅的这篇文章第一部分“引言”清样稿上的批语和修改。毛泽东2月16日又在五中作了个别文字修改。本篇七、八、九是毛泽东在陈伯达2月14日送审的这篇文章清样稿上的批语和修改。其中九是为文章第二部分改的标题，原标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二次大论战”。本篇十是毛泽东在陈伯达2月15日送审的这篇文章清样稿上的批语。本篇十一是毛泽东在陈伯达2月17日送审的这篇文章的清样稿第八部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上的批语。本篇十二是毛泽东在陈伯达2月17日送审的这篇文章清样稿第八部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中加写的、随后又作了修改的一段话。本篇十三是毛泽东为陈伯达2月18日送审的这篇文章清样稿第八部分改的标题，原标题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本篇十四是毛泽东在陈伯达2月19日送审的这篇文章清样稿上的批语。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名字。此外，他还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4] 这篇文章发表时，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5] 指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6]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刊物《政治》周刊1962年第五十二期刊登的一篇哈瓦那通讯，根据在古巴听到的说法将苏古分歧列举如下：（1）苏古分歧不在于对古巴危机这种或那种策略性解决办法，而在于对目前世界基本矛盾的实质抱有不同看法。（2）古巴认为目前世界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殖民地革命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3）古巴认为，对帝国主义说来，冲突的主要地区和攻击目标不是早已开始建设社会主

义的国家，而是正在争取解放的国家。（4）苏联强调用和平经济竞赛战胜帝国主义，而古巴认为殖民地解放和革命将带来帝国主义的灭亡。（5）拉美某些人士对局势缓和、谈判和共处政策的胜利等说法抱怀疑态度，古巴不承认肯尼迪的“保证”。（6）对古巴说来最重要的结论是，对帝国主义不能执行退让政策。

[7] 指1963年1月31日《内部参考》上刊载的《英报报道戴高乐向赫提出“全面改组欧洲”建议，传赫表示欢迎或暂不拒绝》一文。该文说，戴高乐曾向赫鲁晓夫提出一项“全面改组欧洲”的建议，内容为苏联直接同欧洲结盟，东欧实行非军事化及美军撤离法国。据说，赫对法建议表示欢迎，或至少暂时不予拒绝。



1963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真等在春节晚会上。

对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报告^[1]的批语^[2]

(1963年2月15日)

湖南报告很好，印发会议^[3]同志研究。河北的经验^[4]也很值得介绍，请河北省委同志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写一个不长的报告，印给会议同志们看。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1] 指中共湖南省委1963年2月8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给中南局、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我省前一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绩是显著的。但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为此，我们于去年12月下旬对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进一步部署，决定把重点放在阶级教育上面，强调彻底地揭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刮“东风”，打击敌人，遏止“黑风”。在运动中，我们坚持从上到下、先内后外的原则，先教育干部，后教育群众。先解决内部问题，后解决外部问题。教育干部的方法，是自上而下，层层训练，层层放包袱，层层搞深搞透。领导带头，一层一层地搞，这是最基本的经验。各地一般是由县委分三批训练各级干部，第一批集中训练

县、区、社三级骨干，第二批集中训练大队骨干，第三批分片训练生产队骨干。一般过程是：第一，彻底揭开阶级斗争及其在党内反映的盖子。第二，动员大家放包袱。第三，正确处理问题。在群众中开展运动时，强调由点到面、有条不紊地进行。具体做法是：第一，召开贫农座谈会，一面大讲阶级斗争，揭发敌情、“黑风”，一面由干部向贫农交代自己的问题，听取贫农批评。第二，树立贫农优势，造成强烈的社会舆论，把“黑风”搞臭。第三，处理问题强调划清两个界限，即敌我界限、严重与一般的界限。一个多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极其显著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打退了敌人的气焰，遏止了“黑风”，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当前生产。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1963年2月14日为报送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

[3] 指当时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4] 指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中所说的做法。

在听取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 情况汇报时的插话^[1]

(1963年2月19日)

—

印军可以攻到我这里来，我不能去呀？这里头还有一点怕鬼的味道，包括我这个人的思想。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谷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2]，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

[1] 本篇一至十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汇报时插话的主要内容。

[2] 总理，指周恩来。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

二

中国人民是有斗志的。当然，也有个别怕死鬼。除了少数怕死鬼外，多数是能打的，有战斗精神的。

特别是那个五十五师，从青海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是一到就打。一三〇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一到就打。也是在汽车路上做动员工作，很仓促。就是你这个将军^[1]也是临时派去的嘛。开头谁想打呀？没有想打嘛。你十号走，二十号打仗，从动身到打仗，中间只有十天。你说，有仗打就去。我听说你有病，没有仗打你就不去，一听有仗打，你这个病就没有了。你身体也是不好，应该休养。

三

我们要注意，在座的同志们，你们总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当然，我也在内。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是在北京，没有上前线就是了。你们也不必每一个都上前线。总是要参与，总是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各大区的同志，省委的同志，中央的同志，你们要准备打仗。

[1] 指张国华。

四

我们的后勤是比较原始的，印军是近代的。现在在南越，美国的近代化要被原始的打垮的，你看嘛。

我看印军白天也不行，晚上也不行，防御也不行，攻击也不行。你还夸奖它一点。它那个白天有什么好呀？打固定阵地，应该承认它那个炮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达旺，它打那么多天，我们一共只伤亡三十二人，它有什么好呀？我横直隐蔽起来嘛。

对印军士兵拼刺刀这一点，还是要称赞的。

对外作战，部队不懂外国话，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以后跟外国人打仗，我们可以学点外国话。

现在要练兵，每年要有七八个月。

这次战斗中，我们没有逃掉一个人去。过去怕发生政治事故，怕我们的官兵跑到它那边去。印度人也说捉了我们的俘虏，结果他们现在就交不出一个人来。

这次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

五

这个通讯比过去大有进步，头一天打的电报，隔一个晚上，第二天一起来，电报都来了，通讯这么快呀。现在你们接到电报跟我们是同时接到的。比如，十一师先头团给它的师部，给你们指挥所，给我们北京的电报，是同时发来的嘛。

六

要注意近战、夜战。对付帝国主义的军队，我不相信当了面近战、夜战，我搞不赢你。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怕拼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米或者一百米这样的射击。

七

最基本的原因你还没有讲到。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然后，就是你所讲的，三年以来憋了一口气。工人农民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能打胜仗呀？不能把进攻的敌人打下去呀？别的星球上的，如果来了怎么办，现在我们没有经验。地球上的，我看就是要把它整下去。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敌人也见过不少，一个中国蒋介石，一个日本，一个美国，现在又有个印度。我看英国人不会来，法国人不会来，德国人不会来。无非是一个日本人还可能来，一个美国人可能来，一个蒋介石可能来，一个印度人可能来，就是这几个。吴庭艳^[1]他也不能来，他现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是这么一点敌人。

八

军队里头的党支部恐怕比地方的党支部要好，因为军队比较集

[1] 吴庭艳，当时任南越政权“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中。现在我们要注意地方的党支部。城市机关、学校、工厂、街道的党支部，农村以大队为单位的党支部，真正要起到先锋队的作用。

包括在瓦弄，我们总共死了八百人，重伤大概是四五百人，其他轻伤很快就好了。重伤的还有作用，只要他不死，他可以起教育作用。除掉死的，得到教训、得到锻炼的，就是两万七千多人，包括西面，就是三万二千人以上。我看，分一些人放到各师去，由各师抽一些人跟你们对换。你们参战的这三万多人，我看留一半就行了，你搞出一万五千人来，分到全国，特别是分到前线那些部队，特别是分到值班师，分到那里头去，讲这些故事，当教员。

九

这次战斗中西藏老百姓表现很好。这是因为他们过去受压迫，现在得到解放了；因为他们不是有钱的，而是穷人，无产者半无产者；因为我们对西藏的劳动人民是用同志式的态度。不然，他们这么干呀？

十

外国一个兵要有七个人的后勤部队保障。如果照这样，我们是三万二千人作战，三七就是二十几万人，那还了得。

关于集中优势兵力的问题，还是老话，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如果是围城，就要十倍；如果是野战，就要五倍。在具体的战术动作上就不止了，就要占绝对优势。

部队要加強迫击炮、六〇炮，还有什么四〇火箭筒。

边打边像。一定要有样，我看不一定。中国革命开头就没有我们这个样，无非是洪秀全、北伐战争那一套。共产党打仗就是边打边像个样，过去没有样。苏联有个样。十月革命以前有什么样呀？那个样还不是十月革命创造的。

侧后迂回，这不仅是印军怕，从古以来，哪一个军队都最怕这一手。

打扫战场花了一个多月，他不出来，躲在森林里头。这是个新问题，没有料到。

十一

张国华还没有讲那个西面。西面很艰苦，那是多少米深的雪，这么困难，我们都能够克服。我们要在全党全军，在人民中间，讲这个经验。

十二

看来我们的军队还是要政治工作，抓四个第一，抓三大民主，加强薄弱环节，搞好党的建设。

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 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3年2月20日)

此件^[1]印发会议各同志^[2]。请各同志连同湖南那个报告（已印），一起加以研究。两个报告各有特点，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

[1] 指中共河北省委1963年2月17日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为了深入地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我省农村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对农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去年10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有省、地（市）、县三级干部参加；接着，各县又召开县、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会后，各地又以公社为单位，训练了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全省约300万人。然后，向广大农民群众传达讲解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三个文件（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毛主席关于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约有80%的社员受到了教育。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和苏修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

(1963年2月23日)

(苏修大使契尔沃年科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称不适。因再三要求，毛泽东着睡衣接见。)

契：听说你们要发表文章，不必要的，感到很沉重。

毛：不必要，你们为什么发表那么多文章？没有什么沉重的，不过互相论战，不过是唇枪舌剑而已。

契：请你到莫斯科去谈一谈，可以吗？

毛：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老而不死，破套鞋去不成了。



1963年2月27日，毛泽东接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代表。



1963年2月27日，毛泽东接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代表。



1963年，毛泽东接见人民解放军炮兵、铁道兵、公安部队全体代表。



1963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薄一波、李富春接见会议代表。

为学习雷锋题词^[1]

(1963年3月5日)

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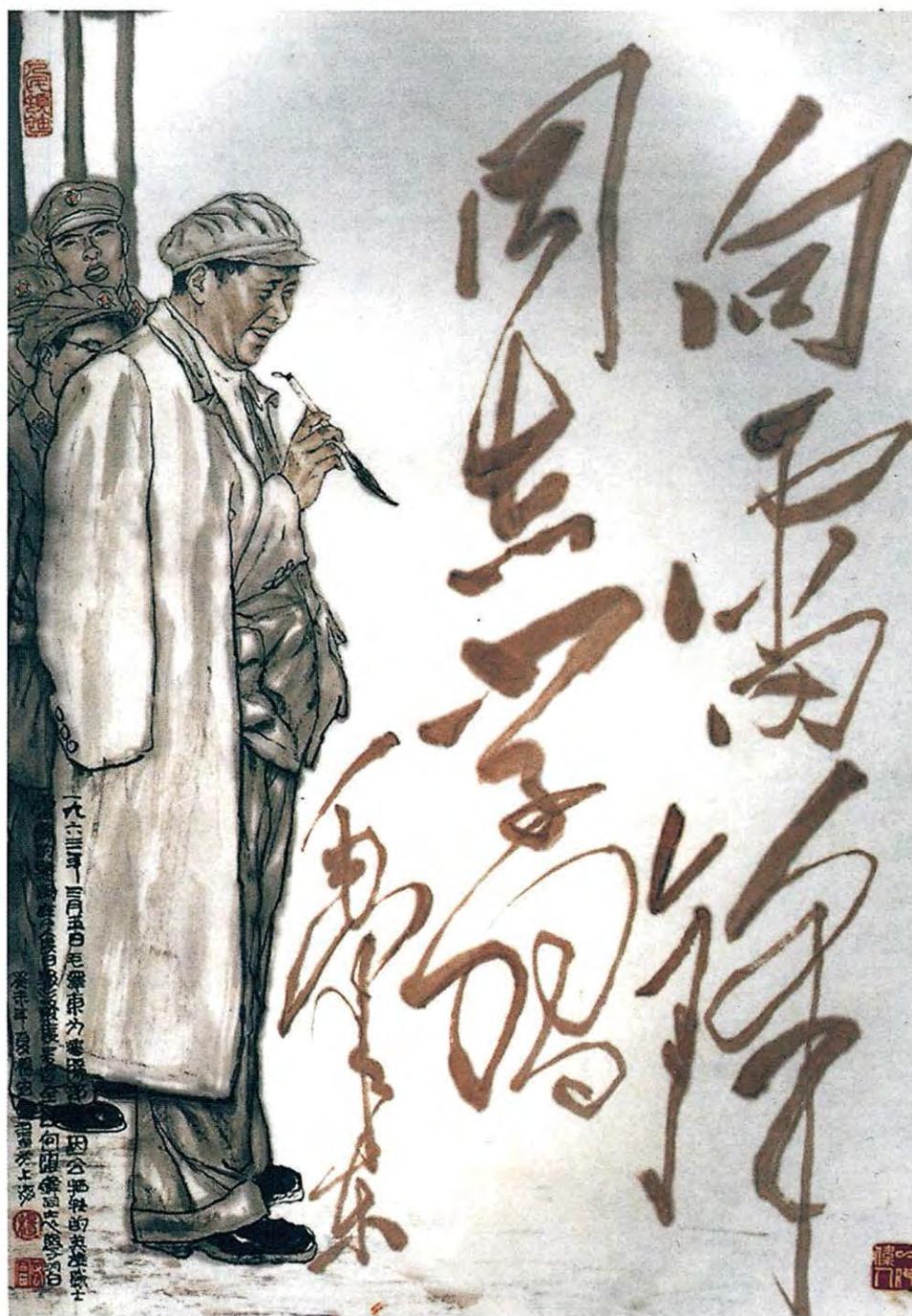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1963年2月应《中国青年》杂志要求为学习雷锋专辑写的题词，最初刊载于同年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雷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工程兵第十团运输连班长，1962年8月不幸因公牺牲。

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为学习雷锋的题词。

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为学习雷锋的题词。



《向雷锋同志学习》(中国画)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评美国共产党声明》^[1]的批语和修改^[2]

(1963年3月5日)

—

康生^[3]同志：

请考虑是否要加上反对教条主义的意思。

毛泽东

五日

—

在美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不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和教条主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 这篇社论在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这篇社论送审稿第一页上写的批语。二是毛泽东对文内一段话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文字。

[3]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3年3月10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气象代表团。



1963年3月16日，毛泽东和来访的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若昂·阿马索纳斯握手。

不得人心，武器再强也不免失败^[1]

(1963年3月22日)

—

中国人民高兴见到你们。你们在最前线，进行了英勇斗争，美国很怕你们。美国是那么个大国，可是怕你们这个小国，拿你们没有办法。直接进攻，又怕世界舆论。还有一条，怕陷进去出不来，是不是啊？

南越游击队规模并不很大，可是美国人拿他们没办法。他们过去几千人，现在有了一万五千人。美国过去说几个月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没有期限了。

我们抗美援朝，也有苏联的帮助，苏联卖武器给我们，那时斯大林还在。斯大林就是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前不久逝世的。不过，那时他们是在后面帮助，主要是朝中两国人民和十六国军队打仗，其中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的，等等。

这说明帝国主义强大还是强大，但是可以战胜的。对付帝国主义，你们是有经验的，我们也是有经验的，和美国人、日本人都打过。就是要准备打仗，没有准备就危险。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古巴武装部队部长费尔南德斯少校时谈话的一部分。

二

我们革命时没有空军，没有海军，也没有重炮兵。只是在革命过程中，夺取了敌人的武器，才有了大炮，都是美国供应蒋介石的。缴了些坦克，但没有组织坦克部队。空军始终没有。我们的空军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开始建立的，和你们一样。

可是你们的敌人巴蒂斯塔^[1]有重炮，有空军，有海军，比你们强，为什么会打败仗呢？就是不得人心。那时根本无人援助你们，尽管美国援助巴蒂斯塔，也不免失败。简单的道理，和蒋介石一样，不得人心。人民不赞成他，那有什么办法？武器再强也没办法。这道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十月革命也是这样胜利的，布尔什维克手中是没有武器的，是从敌人手里夺取的，是列宁指挥的。

三

联系群众永远不会失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脱离群众，他们总有一天要失败的。

[1] 巴蒂斯塔，曾任古巴总统，1959年其独裁政府被推翻。

给周世钊^[1]的信

(1963年3月24日)

惇元兄：

去年及今年惠寄数函并附诗词，都已收到，极为高兴。因忙迟复，尚祈鉴谅。为学校题字，时间已过，可以免了吧。你到京时，我适外出，未能晤面，深致歉怀。嗣后如有所见，或有诗作，尚望随时见示为盼！老校长张干^[2]（忘其别甫，是否叫作次菴？）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3]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方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蒋竹如^[4]兄处，亦乞见时代为致意。他给我的信都已收到了。顺问

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三月廿四日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 张干，字次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担任过该校校长。

[3] 应为张干的外孙女张琼英。

[4]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周先生
信收。因
新近
忙甚，
并附诗
词一首，
请鉴悉。
此复。
毛泽东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在张干^[1]来信摘报上的批语^[2]

(1963年3月24日)

请中央组织部商山西省委，酌情处理。写信人张干，是我四五年前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年大约八十以上了。

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

[1] 张干(1884—1967)，字次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担任过该校校长。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送的张干来信摘报上。摘报说，张干说他和他的女儿金铸，都需要人照顾。请求主席帮助，将他的外孙女张琼英从山西调回长沙工作。

给戴毓本^[1]的信

(1963年3月28日)

毓本同志：

去年十月的信早就收到了，很是高兴。近情如何，望告。生活上如有困难，不妨见示。顺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三月廿八日

[1] 戴毓本，湖南衡山人，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

给张维^[1]的信

(1963年3月31日)

楚珩兄：

前后数信都已收到，甚为感谢。身体好一些吗？甚为悬念。顺问魏夫人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三月卅一日

[1] 张维，又名张楚珩，湖南浏阳人。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来往。当时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教授。



毛泽东致张维信的手稿。

对《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问题》^[1]一文的批注和修改^[2]

(1963年3月)

—

仅仅依靠公安部，不依靠党和群众去肃反。

二

他们在党内关系不是平等的，各级领导人具有特权。

三

(不明确)

四

他^[3]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中，在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犯了一些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不适当干涉某些兄弟

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替各国党制定纲领、具体政策以至人事安排，用强制的办法推行他的“左”的政策，因而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五

哪三条罪名？

六

日本党似应当说得更好一点。

[1]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3年3月15日印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各同志的《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一文，共讲了三个问题：一、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二、争论的问题和性质；三、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

[2] 本篇一写在《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一文以下一段话旁边：斯大林“在党内党外的斗争中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的方法，对反党分子和群众中的一些不满分子，缺乏具体的严格的分析，把他们一律看作是同帝国主义有勾结的反革命分子，一律叫做人民公敌，一律用镇压的方法去对待他们，造成了肃反的扩大化，错捕错杀了许多（注：毛泽东将‘许多’改成‘一些’）好人，犯了严重的（注：毛泽东将‘严重的’三字删去）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本篇二写在这篇文章以下一段话旁：斯大林“在党和国家组织以及群众组织、经济组织中，没有正确地实行或者违反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党章

上虽然规定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各级党委的实际生活是个人专断，没有真正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定。由于他在各方面都强调实行一长制，因而在国家的、经济的、群众的组织中也都在实际上实行个人专断”。本篇三写在这篇文章以下一句话旁：斯大林“在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上，对于中间阶层，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具体指“对于中间阶层”这六个字不明确。本篇五写在这篇文章以下一段话旁：苏共中央“1962年2月22日给我们来信说，他们要同中国好，只是不能同阿尔巴尼亚好，希望中国不要管阿尔巴尼亚。来信给我们安上了三条罪名，说什么我们坚持‘特殊立场’，但是中苏两党两国还是要合作，要团结，双方的分歧是可以消除的，是可以妥协的”。这段话中的“三条罪名”，是指苏共中央1962年2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的他们所担心的三条：1.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行为受到了中国报刊的支持”；2. “中国代表们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采取自己的特殊的立场”；3.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与兄弟党集体制定的共同方针不同的路线的趋向日益明显”。本篇六写在这篇文章以下一句话旁：“日本党内个别的人虽然表现不好，但它的领导核心是坚定的”。本篇四是对这篇文章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文字。此外，他还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3] 指斯大林。

为中央转发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拟的标题^[1]

(1963年3月)

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中央批语^[2]、山西省委批语^[3]、昔阳县材料^[4]）

[1] 本篇正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和省委批语的指示稿重新拟写的标题。原标题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

[2] 指中共中央1963年3月23日为转发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和省委批语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后来，这个指示连同山西省委批语和昔阳县材料作为中发〔63〕34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前十条》）的附件六印发。

[3] 指中共山西省委1963年1月29日对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材料的批语的摘要。批语说，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劳动能否形成社会风尚，关键在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否有决心，是否能以身作则，带头示范。从1963年起，全省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的补贴工分，必须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规定，不得超过总投工数的2%。要把这件事作为今年整风整社的一项重要内容。

[4] 指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的摘要。报告说，1959年以来，昔阳县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

劳动一年比一年多，补贴工分一年比一年少。县、社负责干部带头参加劳动。据统计，去年县级机关下乡干部在生产队所做劳动日，每人平均62个，公社干部每人平均82个。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使干群关系像鱼水一样密切，带动了广大社员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恢复了清早上地劳动的习惯，也有助于迅速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报告还介绍了中共昔阳县委在干部参加劳动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1）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干部觉悟，注意经常检查。（2）把劳动态度作为选拔大队、生产队干部的首要条件。（3）县、社负责干部，带头参加劳动。（4）坚持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的制度，每年春天落实到人。（5）大队干部固定到一个生产队或作业组，按他们的劳动底分同社员一样分地、分活，评工记分。（6）评比竞赛，层层树立标兵。（7）自上而下改进领导作风与工作方法，严格控制会议、表报，为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创造条件。



1963年春，毛泽东和新华社记者李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陈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舒世俊一起交谈。



1963年3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后和新华社记者李琴亲切交谈。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 十八周年的电报

(1963年4月3日)

布达佩斯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值此匈牙利解放十八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匈牙利人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为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作了不懈的努力。祝匈牙利人民今后在各方面继续取得成就。

中匈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是相互支持的。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致力于增强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中国人民将同匈牙利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共同努力。

祝中匈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



1963年4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全国妇女工作会议的代表。

给毛岸青的信

(1963年4月5日)

亲爱的岸青儿：

前后各信都已收到，因忙未复，你会谅解我的心情吧。我爱你，我念你，我对你好。你不要误会。你的病要改性急，是为至盼！

父亲

一九六三年四月五日

关于对苏共纲领的 意见《备忘录》^[1]稿的批语^[2]

(1963年4月9日、20日)

—

伯达^[3]同志：

这些都已看过，写得很好。未完部分，请续寄来。

毛泽东

四月九日上午二时

[1] 这个《备忘录》初稿说，苏共领导人把苏共二十二大纲领当成国际共产党人的共同纲领，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举行两党会谈的时候，对苏共纲领提出自己的意见。备忘录就下列问题阐述了意见：（一）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三）关于所谓“全民党”；（四）关于所谓“物质刺激”；（五）关于所谓“新型的国际分工”；（六）关于所谓“一切为了人”和“人道主义”。这个备忘录后来没有发出。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备忘录》的部分手抄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陈伯达1963年4月13日送阅的《备忘录（初稿）》铅印件上写的批语。

[3]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
—

已阅一遍。

毛泽东
四月廿日

野营训练是一种好方法^[1]

(1963年4月12日)

野营训练是一种好方法，应该在全军推广这种方法。

[1] 这是毛泽东在听取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汇报部队训练情况时所作的指示。

关于刘晓工作安排问题的批语^[1]

(1963年4月20日)

总理：

下去了解情况，是刘晓同志本人的要求，我也认为有此必要。他身体情况不宜下放，可以发表为外交部副部长，每年仍可以一段时间到一些省、市作些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

四月二十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外交部党委1963年4月16日关于刘晓任命问题给周恩来总理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中央已于1962年12月20日任命刘晓为外交部副部长。后因刘晓外出休养，暂时未将此项任命报请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现在，刘晓拟于4月20日左右返京，我们拟即提请国务院任命，并在报上公布任命消息。妥否，请批示。

为《学理论》杂志题词^[1]

(1963年4月)

东风压倒西风。

毛泽东



毛泽东为《学理论》杂志的题词。

[1] 这是毛泽东为1963年第4期《学理论》杂志的题词。



1963年4月2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接见全国专业工作会议的代表。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3年4月、5月、6月)

—

林克^[2]:

讨论对苏复信，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3]四同志于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给苏共中央复信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二、四、五、六、七、八是毛泽东对复信1963年5月19日草稿的修改。九、十、十一是毛泽东对复信5月21日稿的修改。本篇三是毛泽东对复信5月19日草稿和5月21日稿中同一段文字先后两次的修改。本篇十二、十三、十四是毛泽东对复信6月5日稿的修改。其中本篇十二是毛泽东为复信拟的标题。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在同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7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同时再次全文发表这封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以便让自己的党员和人民了解中苏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研究。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修改时加写的文字。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3]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本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请你通知，叫他们如期来此为盼！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早上四时

—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

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独立地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独立地进行群众工作，不断地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

—

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

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五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内，甚至几百年内，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六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

七

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同时，各国共产党人也必须要反对教条主义。

八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这样的党，那就绝不可能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九

只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相互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引起的斗争。

十

认为世界两个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一切其他矛盾（即包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垄断资

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相互之间的矛盾），都会随着两个体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和平合作的新世界”。

十一

共产党人在争取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和革命左派（在个别国家，则还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中间派）的同时，必须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各国工人群众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

十二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十三

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十四

苏阿关系恶化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地步，苏共领导同志难道真的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把海军工作做好^[1]

(1963年5月2日)

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已经看过，认为很好，照此执行，每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希望海军各级党委同志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海军问题报告的批语。

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 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 代表团的谈话

(1963年5月4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们到中国有多久了？是一起来的吗？

各代表团团长（以下简称团长）：新闻代表团四月二十一日到中国，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和工会代表团都是四月二十六日，档案代表团四月三日。

毛：你们的党是很好的党，你们的国家是很好的国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也很好。我们两党、两国，修正主义都攻击我们。对修正主义的攻击要分析：第一是坏，攻击我们当然不好，第二也好，修正主义骂我们，这对我们有好处，修正主义不骂我们就不好了。修正主义不援助我们，经济上不援助我们，撤走专家，这也要分析，第一是不好，撤走专家，不帮助了，当然不好；但也是好事，让我们自己干，自力更生，对吗？要自力更生，要不怕困难。

你们到过□□吗？有机会最好到那个国家去看看，不一定就是你们去。他们建立了重工业，他们自力更生。我们的农业还没有过关，他们过关了，他们的农业比我们好。我们的朋友不少，帝国主

义、反动派、修正主义要孤立我们，但孤立不了。

我们是多数，他们没有多少人，多数人民并不赞成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各个修正主义领导国家的人民，并不见得很欢迎修正主义。这方面的情况你们知道一些。人民是好的，包括修正主义领导国家的人民，干部中也不都是坏的，不是一块铁板，并不都是修正主义者，是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坏。

你们在中国还有多久？

团长：工会代表团还有一个月，新闻代表团和青年联盟代表团还有二十天，档案代表团六月七日走。

毛：你们可以到处走走。前几年我们的情况不好，最近一两年比较好一些，现在政治、经济情况都比较好些了。但还有困难，困难不少。社会上和党内还有些问题。困难可以克服，正在克服中，问题在解决。

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长生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浪费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如能适当解决，就可以搞几十亿美元。美国人不会借款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借给我们，我们有个办法，就是向官僚主义者借款。（外宾笑了）

马马基^[1]（以下简称基）：美国借款给他们——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

毛：你们有一个“好”邻居^[2]，他们锻炼你们，他们反对你们，南斯拉夫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你们。

[1] 马马基，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

[2] 指南斯拉夫。

基：但是我们的朋友很多，我们的人民很坚强，因为和中国人民在一起。

毛：即使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你们也不会灭亡。

卢鲍尼亞^[1]（以下简称亚）：但我们感到幸运，中国给了我们国际主义的援助，鼓舞了我们。

毛：但是援助很少，有些科学技术关键问题，我们自己也没有解决，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技术，所以不能完全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过意不去。再过五年到十年，我们会好一些。

基：修正主义企图破坏我们的五年计划，而你们是帮助我们。

毛：你们原定的五年计划有没有修改？

吉贝罗^[2]（以下简称罗）：有的，一般说项目有些增加，大型项目有增加。

基：五年计划有些改动，但总的说增加的比减少的多。去年冬季的天气对农业的影响很大，雨下得多了，涝了。

毛：春季生产怎样了？

基：直到三月还在下雨。

毛：你们雨下多了，我们有些地方少了。

基：如果有可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雨送一些给你们。（全场笑）

亚：沈阳很久没有下雨，我们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一到就下雨了。

毛：很好。你们可以到郊外去看看。这里^[3]春季生产还可以，

[1] 卢鲍尼亞，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团长。

[2] 吉贝罗，工会代表团团长。

[3] 指上海。

有麦、油菜、蚕豆和豌豆。

亚：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看到一路上庄稼长得很好，尤其是从山东到上海这一段，很深刻的印象是农民没有荒废一寸土地。

毛：这是因为我们土地不够，平均每人只有五分之一公顷，长江以南每人只有十五分之一公顷。我们是寸土必争，否则没有饭吃。这里一年要种两次，冬季种麦，夏季种稻。南方有的地方不种麦，种两季稻子，早稻和晚稻。东北只有一季麦子，只有一百二十天无霜期。这些地方^[1]比较好。上海是北纬三十一度，你们在北纬多少度？

亚：我们和北京一样，纪诺卡斯特城^[2]和北京在一个北纬度。

毛：北京是北纬四十度。请你们问候霍查同志和谢胡、卡博、巴卢库、阿里雅和凯莱齐等同志。这些同志我都认识。

亚：一定转达您的问候。我们出国时，同志们也一再要我们向毛主席致以最衷心的问候，祝您身体健康。

毛：谢谢。

亚：您身体健康，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毛：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骂我们，我们要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一起，反对他们。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难道还孤立吗？印度还是反动派统治，但印度人民对我们很好。

亚：我们有些同志过去来过中国，这次再来，看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感到无限鼓舞。我一九五七年来过中国，这次再来，不认识北京了。十大工程是世界上绝妙的杰作，只有像中国人民这

[1] 指上海附近。

[2] 纪诺卡斯特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霍查同志的故乡。

样有才能的人才建造得出来。也看到上海的工业展览会，使我们十分惊奇，生产出很精密的仪器，还有重工业，这使我们十分鼓舞，欢欣愉快。我们在以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党以自己的英雄气概鼓舞了我们。我们劳动党和霍查同志也一再指示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和中国青年的会面，使我们受到了革命的鼓舞。

毛：不是一国支持一国，而是互相支持。不是一国帮助一国，而是互相帮助。有了你们站起来反对修正主义，全世界人民都高兴，不仅中国人民。

亚：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毛：都是国际主义义务，你们是国际主义义务，我们也是国际主义义务。国际主义应当如此，应当坚持马列主义，应当互相支持。

你们今天还有什么活动吗？

外宾：主席的接见就是最重要的活动。

毛：今天谈得不多，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亚：主席接见我们，不仅是给我们，而且是给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民、劳动党和青年的荣誉，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大事。

毛：我要谢谢你们来看我。

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上的批语^[1]

(1963年5月8日)

这几个文件^[2]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南通讯》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的封面上。封面目录原列有六个文件，毛泽东选取了其中四件，即《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作法》《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拟了一个标题“四个好文件”。《中南通讯》在这个《特辑》上加的编者按说，要搞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重要的是开好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开到大队一级，每个大队最少应有两个人参加。接着开好公社（或区）的三级干部会议，开到生产队一级，可吸收贫下中农代表参加。这两个会议，都是为了训练干部，搞好“样板”。然后以大队为单位，再一次武装干部，经过扎根串连，组成强固的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深入到群众中开展运动。

[2] 指毛泽东所说的“四个好文件”。后来，这四个文件作为中发〔63〕34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前十条》）的附件四印发。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作法是：第一步，分析阶级斗争形势，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统一认识，提高觉悟。第二步，领导层层带头，自觉地放下“包袱”。第三步，民主讨论政策界限，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第四步，总结会议经验，研究下一步如何串连发动和组织阶级队伍，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安排生产和群众生活。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和花明楼公社的作法与此大体相同。

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对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1]的批语^[2]

(1963年5月8日)

这两个报告都好。请同志们注意研究和参考。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1] 指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毛泽东、中南局的两个报告：一个是1963年4月16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另一个是1963年4月22日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前一个报告说，自2月8日作过一次报告以来，经过这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中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农、下中农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热情大大提高，到处出现了社员热爱集体、关心集体、多出工、多投肥的新气象，大部分地区生产颇有起色。为了促进这个新的高涨形势，更全面、更深入、更扎实地组织农业生产高潮，我们因势利导地把社会主义教育深入一步，通过修订生产规划，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总路线教育和阶级斗争的再教育，大鼓革命干劲，统一思想认识，集中力量发展集体经济，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估计4月底或5月初各专区可全面转向抓经营管理。但在这一段组织生产高潮中，在修订规划和改进经营管理的工作上，仍然突出地暴露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分田单干、雇工放债和各种“黑风”上面，而且还表现在经营方针、生产计划、劳动力管理、收益分配等许多方面。因此，今后还必

须继续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教育。不大抓总路线的教育，不把干部和群众的革命干劲组织到发展集体经济上去，生产高潮仍然不可能搞起来，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热情也会渐渐低落下去。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充分运用前段运动的经验，同样是从教育干部入手，从上而下，由党内到党外，一层一层地训练、揭盖子和解放思想。大部分地区把训练干部和搞试点结合起来，各级干部会上都搞一个大队的试点，层层训练，层层搞点，通过试点，既有助于解决思想问题，又学会了组织生产高潮的方法。后一个报告说，我们最近派工作组到零陵专区进行了调查。（一）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明确地提出了依靠贫农、下中农的口号，在依靠贫农、下中农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了其他中农，取得了反“黑风”的巨大胜利。（二）这几年对依靠贫农发生动摇的最根本原因，是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农村阶级情况缺乏经常的调查和分析，对依靠贫农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认识不明确。（三）零陵地区在树立贫农优势的工作中，取得的经验主要有四条：第一，教育干部重新认识贫农。第二，从政治上充分发挥贫农的主人翁精神。第三，从组织上树立贫农优势。第四，从经济上帮助贫农翻身。（四）零陵地区普遍建立了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这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应运而生的，是广大贫农、下中农的要求。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是党支部领导下的贫农、下中农核心组织，是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和助手，是党联系贫农、下中农和广大社员的桥梁。它的主要任务，一是带头执行党的政策，在工作中出主意，支持和监督干部；二是串联发动贫农、下中农，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三是经常向贫农、下中农社员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四是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同中农的团结；五是监督和改造四类分子，同一切坏人坏事作斗争。（五）今年春天，省委向全省各地介绍了零陵专区的经验，要求各县做好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的试点，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广。几个月来，全省已有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根据重点调查，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代表小组能够发挥作用。

[2] 毛泽东1963年5月8日对中共湖南省委两个报告的批语连同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作为中发〔63〕34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前十条》）的附件三印发。



1963年，毛泽东和陶铸在杭州。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丁家山。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 十八周年的电报

(1963年5月8日)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威·西罗基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值此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八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感到十分高兴。

中捷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维护和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起，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

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共同努力。

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捷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与日俱增。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 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

(1963年5月9日)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2]，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1963年4月编印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上。毛泽东在审阅这批材料时，将封页上的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后来，这个批语连同浙江省七个材料作为中发〔63〕34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前十条》）的附件七印发。

[2] 这七个材料是：（一）中共平阳县城西人民公社委员会书记廖锡龙写的《我们是怎样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二）钱天镇写的《应四官劳动好、工作也好》，应四官是中共宁海县越溪公社越溪大队支部书记；（三）章轶仲写的中共金华县汤溪公社汤溪大队支部书记、老劳模陈双田访问记《怎样才能更多地参加劳动？》；（四）中共桐庐县委副书记娄秉宜写的《严如湛同志三下后进队》，严如湛是中共桐庐县俞赵公社俞家大队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五）中共瑞安县委书记季殿凯写的《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六）中共余杭县委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余杭县五常公社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好》；（七）中共青田县委书记袁长泽写的《五年来干部坚持种试验田的体会》。

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地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

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批分期，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中央关于抓紧进行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

(1963年5月10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现将宋任穷同志报告^[1]一份，河南省委报告^[2]一份，发给你们研究和参考。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二十几天时间，就训练了十五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一百五十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

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说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中央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

[1]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1963年4月10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问题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东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坚持了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较普遍采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第二，在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深感要有意识地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用村史、合作化史、工厂史、贫下中农和老工人的家史教育青年，学习雷锋等先进人物的事迹，展览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的实物，读红色书籍等，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2] 中共河南省委1963年4月15日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给中央、毛泽东并报中南局的报告说，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按照中央和主席的指示，部署了全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个运动分为三步：第一步，开好县的三级干部会议；第二步，开好公社（区）的三级干部会议，这两步都是为了训练干部，组成干部队伍；第三步，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经过扎根串连，组成阶级队伍，打击敌人。现在，运动已经进行20多天，第一步基本结束，训练了大队以上的干部15万多人；第二步正在进行，受训练的生产队以上的干部和贫农积极分子150多万人；第三步的试点已经开始，并取得了初步经验。报告说，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组成强大的阶级队伍。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最有效的方法是扎根串连，回忆对比，进行诉苦，启发阶级觉悟，调动阶级感情。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并不等于阶级队伍已经完全组成，还要解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解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当在一致对敌的口号下进行。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问题，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除极少数蜕化变质分子外，都应当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干部凡有缺点、错误的，一定要诚恳作自我批评，向群众彻底检讨，坚决改正，积极退赔，说到做到。经济退赔要本着过去从宽、今后从严，思想批判从严、经济处理从宽的精神，既要使群众通得过，又要使干部生活过得去。展开对敌斗争，要划清政策界限，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讲究策略。

我们不靠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1]

(1963年5月22日)

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2]到中国来了一次，就是为了建立共同舰队的问题。我对他说，可以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把一万八千公里中国海岸线全部交给你。他说，把海岸线交给我以后你们干什么？我说我们搞游击队嘛！他说搞游击队干什么？我说你把全部海岸线都搞去了，堵住了我的鼻子，我不搞游击队怎么办？第二个办法是全部海岸仍旧归我管，你帮我们搞海军，建立好了也归我们管，全部费用归我们出，战时共同使用。这两个办法由你选择。两个办法他都不赞成。全部归他，觉得不好意思；全部归我们，他又不干。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过去占领大连、旅顺的办法。过去他们在那有海军基地，朝鲜战争后他们撤回去了。我说，你们可以再回来。他觉得这也不大好，因为他们撤出大连、旅顺是两国政府发表过声明的，再回来不好。

建立长波电台是他们建议的，目的是为了侦察整个太平洋地区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谈话的一部分。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的敌情。但是他们提出这样的条件：苏联出建设费百分之七十五，只许我们出百分之二十五。为这个电台的建设费问题，谈来谈去，谈了不知多少次。我说，建立电台的费用我们一个钱也不要你们出，苏联可以卖电台的器材给我们，电台归我们管，共同使用。这就谈不拢了。这是一九五八年的事。

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在印度问题上对我们施加压力。他单独发表了一个声明，名义上是中立，实际上是偏袒印度，谴责中国。他们在帮助中国建设工厂的整个时期，总是有一部分最关键的技术不告诉我们。

这一年他从戴维营回来就来教训我们，那一次也是谈得不欢而散。他受美国总统的委托，一定要我们把七八个美国特务释放。我说一个也不放，要照我们的法律办事。这几个美国人是空中特务，被我们飞机打下来的。美国始终不肯同我们达成任何妥协。我们把大部分美国人都放走，只剩下这几个了，他们是严重的犯罪分子。那个时候，赫鲁晓夫神气得很，因为他带来了戴维营精神。

二

那是一九六〇年，那一年也恰好是我们最困难的一年。我们从澳大利亚、加拿大进口了五百万吨粮食，给了苏联一些。就在那一年，他们撤退专家，撕毁协定，在我国边境制造挑衅事件，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这么一点压力。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我们死了几百万、上千万人，也没有把我们吓倒。日本投降以后，美国人帮助蒋介石进攻我们，延安也丢了，大一点的城市统统丢光了。但是战争的结局是，美国人跑光了，蒋介石也跑

了。然后是朝鲜战争，美国猖狂到要把战争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和朝鲜人民一道，把美国人赶了回去。

三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也没有氢弹，我们要研究和制造这种武器。但是到研究制造出来那一天，同美国和苏联比较，还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也不到。我们不想用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怎么能用这种武器打胜帝国主义呢？还是要搞常规武器。我们也不打出国境，只是他们侵略进来，我们才以防御战把他们打出去，那时才发生出国境问题。如果我们打败了，也不会投降，至少可以保持一个游击区。我不相信中国会永远是个游击区，总有一天会把帝国主义赶出去。只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才出国境。他们从哪里来，我们就往哪里去。

给黄炎培^[1]的信

(1963年5月26日)

任之先生：

前后两信，并附著作、报告数种，均已收到，甚为感谢！《八十年来》^[2]一书，尚未卒读，其余均已看过了。高年盛暑，尚望注〔意〕保重。敬祝

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廿六日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这是黄炎培写的一本记载他80年来亲目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所接触到的事事物物的书。1963年内部印成小册子，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

给周世钊^[1]的信

(1963年5月26日)

惇元兄：

信收到，甚谢！复信一封，人民币二千，请转致张次岑^[2]先生为盼！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 张次岑，即张干，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担任过该校校长。

给张干^[1]的信

(1963年5月26日)

次岑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惇元^[2]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3]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敬颂

早日康复。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廿六日

[1] 张干（1884—1967），字次岑，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担任过该校校长。

[2] 周惇元，即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3] 指请周世钊转交的人民币两千元。

次山南歸之在
雨夜寒事者均已殺
酒。之爲飲。其
爲。爲。爲。爲。
泥。周。懷。充。畫。
見。老。極。而。作。
高。上。有。物。差。
為。醫。無。之。照。
向。也。收。內。為。

This image shows a vertical calligraphy piece in cursive script. The characters are fluid and expressive, written with a brush.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read: '春' (Spring), '暖' (warms), '花' (flowers), and '開' (bloom). The style is high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our great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毛泽东致张干信的手稿。



1963年，毛泽东在武汉。



1963年，毛泽东在武汉。

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稿的修改^[2]

（1963年5月）

—

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提出来

[1]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中央为印发这个决定（草案）的通知一起，作为中发〔63〕34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前十条》），于1963年5月20日向党内印发。决定（草案）提出的目前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是：（一）形势问题。（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五）依靠谁的问题。（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八）“四清”问题。（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这里前九个问题的题目是毛泽东拟的，其中第九个问题的题目毛泽东原写为“干部参加劳动”，中央文件改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这一决定（草案）稿时加写的前言部分。二至五、七至九是毛泽东对决定（草案）第三稿进行的修改。六是毛泽东对决定（草案）第三、第四稿中一段文字的修改。十是毛泽东在决定（草案）稿上加写的一段话。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名字。

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〇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1]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

[1] 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主要内容有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 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

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附在这个决定后面的有下列一些材料：湖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东北局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件，河南省委报告一件，湖南省委报告两件，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县委、区委、社委报告四件，重发山西昔阳县材料一件，河北省材料两件，浙江省材料七件，共计二十件。材料虽多，但是好看。最好先看材料，后看本决定，因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本决定基本上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作出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决定。

目前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

二

形势问题。党中央在一九六一年提出了农村工作六十条^[1]以后，接着，又发出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指示^[2]，除去一部分灾荒地区和办得不好的社队以外，整个农村的形势已经大大好转，农业生产逐步上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并且对六十条作了适当的修正，进一步地对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各省农业生产的情况，都是一年比一年好。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在起着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一部分同志过去对于农村形势，对于农业生产的情况抱有的各种悲观情绪，是没有根据的。

[1] 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

[2] 指中共中央1962年2月13日下发的《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三

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很多事实，证明上述阶级斗争的论断^[1]是正确的。

四

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五

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

[1] 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引用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发现。

六

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应当说，上述阶级斗争的各种严重现象，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注意到了。许多同志对于这些现象，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

七

教育的办法，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六十条修正草案，中央现在作出的决定，同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事例，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向干部和群众讲解，启发他们，让他们能够掌握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懂得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学会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同时，使犯有轻重不同、多少不同的毛病的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直接同群众见面，解决多年存在的许多干部和群众之间不正常的关系问题。

八

毛泽东同志在今年二月中央会议上介绍了湖南和河北的成功经

验¹¹¹。他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些地方原来没有注意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或者没有抓着要点，或者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但在二月会议以后，也抓紧了，也抓着要点了，找到好的方法了。

九

“四清”问题。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现了农民迫切要求社、队认真地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亦即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

[1] 指中共湖南省委1963年2月8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1963年2月17日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中介绍的经验。

对印发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稿^[1]的修改

（1963年5月）

这个决定（草案）要一直发到农村和城市党的基层组织支部。但在“五反”运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城市中由省、市、区党委控制，暂时不要将本决定（草案）下达。在农村中，则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分期分批地下达，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这个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则暂时不要下达。

[1] 中共中央1963年5月20日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说，现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七个附件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按照决定（草案）中的规定，订出计划，经过试点，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去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并且力求办好。在推行中切实注意调查研究，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准备在7月下旬（或8月上旬）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讨论这个决定（草案），然后提交中央全会正式通过。这个决定是关于我们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的重要文件，它的基本原则不但适用于农村，而且适用于城市。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审阅通知稿时加写的文字。

在关于四清运动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3年5月)

先看二十个材料引起大家讨论，先看三天。各中央局、省开会也是如此，不要传达中央文件有一个框框。不要性急，横竖准备搞它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搞三年。这样一个大的运动需要时间，不要性急。

这个革命运动是土改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斗争。这样全面、这样广、这样深远是几年没有的。“三反”“五反”搞城市，一九五七年反右是思想战线上的，反高饶是党内的。全面的、党内党外的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十几年来没有的。这次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这样理解有好处。这是土改以来第一次大斗争。开始要训练县以上的干部队伍，再训练大队以上的干部，还有训练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

没有蚂蚁的地区不要硬去找蚂蚁。譬如一类社队过去进行了阶级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你一定去找地富活动，没有一个例外也不好。

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差不多都有，大的小的。河南材料说到一个支部很好，另一材料说的一个公社干部经过洗手洗澡真正一尘不染的只有两个人，不能说这个支部不好，还是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现在看来我们干部真正一尘不染是有的，但不能说太多。铺张浪费、多吃多占，一点没沾上的少，大多数沾了，洗手洗澡交待就好了吗？这次“四清”“五反”大家都出点汗，洗温水澡，轻松愉快，才能轻装上阵，一致对敌。为什么轻松愉快？一致对敌，我们身上不干净没有力量，搞干净就能团结一致对敌。有的干部多吃多占，有的和地富女儿勾搭，不洗就不能对敌。有些人对敌斗争有劲，对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大积极，有顾虑。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多吃多占，上了当的，只要自己说出来，又退了赃，不算贪污分子。将来机关、工厂、企业也可以这样办。当场宣布不算贪污分子，可不公布姓名。东北局有几个贪污一百元、二百元，自己讲了，开大会宣布不算贪污。至于贪污大的案处理，大约不过上万元，如自己交待了又退了，处理可以减轻。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关政策性，“四清”“五反”一定要有，不反不行。一定要交待清楚，不退赃物赃款不行。但要退得合情合理，多吃多占的退的时候，不要退得太挖苦了。使干部生活过不下去也不好，有的已吃了用了，教育他向群众检讨一下退出若干，参加劳动，这样群众不会叫一次退出，分期分批退，不至于使生活不好过。还可以采取自报公议。这个政策很复杂，看起来自己好。

这次运动中间要换一批。劳动好的人，看来是少数。处分的，也是少数。议论干部受处分的可能不到百分之一，不要太多了，要多做教育工作。加强运动的领导，有的时候需要靠各地区县社队广大干部，上面去的人不要包办代替，要把广大干部发动起来，要依靠广大干部去搞。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方法，发动广大干部的方法，来的力量大。

一个坚决把运动搞起来，一个怕搞乱了。

(□□同志讲：我懂主席心情，第一要搞，第二要搞好。经常向主席反映情况，得到主席指示，不要搞乱了。)

三个伟大革命斗争，不搞好不行，一定要搞好。

注意总结经验，回去中央局开十天会，搞一个月工作，到七月中央局再开一次会，总结一下经验，摸一下情况，到七月底八月中旬开会，除这个外还要搞工业。

要有强的领导才能发动运动，分期分批，一批批搞不算落后。这次运动将要大大提高各地的自觉性，中央局、省、市、县的人下去一起来运动。

“四清”历来不清，阶级斗争粗糙，这次运动，要提高自觉性，要忠心诚恳地帮助社队把工作搞好，帮助干部洗温水澡，帮助“四清”搞好，除了个别不行的，烂了、蜕化变质的帮不上去，或太坏了，要派工作队代替他们搞，除此要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搞。

你们对干部怎么样？我不清楚。现在看起来对干部要说服教育，特别是用实际证据来说服教育。照理说有，拿出实际证据来说，也有阶级斗争实际证据，昔阳县实际证据，浙江参加劳动，四个好文件是实际证据。检查一下我们是否照理说多，证据说比较少。

你们有机会去一个区搞十几天。（我们说：没有。）你们下去干部是否很紧张？熟了就不很紧张，多尊重人家，不要指手画脚，“三不”，对干部我们要团结他们，要洗手洗澡，要抓一下。

这次运动会出现杀人灭迹。

发动群众搞“四清”是厉害的事情，河北经验，有些公安机关搞不清，发动群众“四清”搞出来了。有人讲阶级斗争靠公安部门搞，人民内部靠监委搞，当然要靠，但除此还要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这个运动抓起纲领就好办了，分期分批搞，搞第二、第三批不算不名誉，还是名誉。

（众议：有地方走过场，雨过地皮湿。）走了过场再搞嘛，就是不要伤人，不是敌人当敌人，不是……

（众议：乱子一点不出不行，主席同意我们的看法。十九日大厦跳楼死人，黑龙江有个地富杀死三十八人，去年枪毙了反革命十三人。）上海死一人，在厕所吊死，留字“过路君子”说好为他申冤，根本没斗他就死了。

要坚持说服教育，分期分批试点，划清界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有强的领导，只要有几条搞好就可少出乱子。

不打无准备之仗，材料没准备，兵没练好，不要搞。这一仗是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要像解放战争时来打仗，辽沈战役、锦州、淮海、过长江战役。不要打百团大战，不要像皖南事变那种打法。

第二是解放战争几个战役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这次打仗打好了是全国革命的胜利，对世界革命贡献更大了。

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 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的批语

(1963年5月)

《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和省委的批语都很好，一并发给你们参考。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的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变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做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有的县委和公社党委对这一规定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不得超过生产队工分总数百分之二的规定根本行不通。应该请他们好好读一读昔阳县的经验。昔阳县的经验证明：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键，恰恰

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的批语

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则。这个县的县、社两级干部一九六二年在生产队工作的劳动日，县级每人平均六十二个，公社级每人平均八十二个。他们到哪里下乡工作，就在哪里参加劳动，并且一直坚持不懈，经过几年的努力，才逐步形成风气。应该说，昔阳县的同志们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这样做。

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要认真帮助县委弄通道理，结合整风、整社工作，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和补贴工分的规定，抓紧加以解决，以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

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

(1963年5月)

一 形势问题

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阶级斗争形势是严重的，尖锐的。（列举农村阶级斗争情况）为什么农村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有三个原因，一个是阶级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认识原因。

阶级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的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

历史原因：一方面是有的地区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有的地区社会主义革命未完成。封建地主没有打倒的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作历史方面的原因。土改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搞阶级斗争。“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都搞了一下，但不是这样的做法。苏联在一九三二年以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又搞了二次肃反，此后十六年当中不搞阶级斗争，他们的集体化依靠谁？不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

华北局机关“五反”搞得好，说是“清水衙门”，但是一清就清

出好多专案来。

认识原因：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存在，没有认识到，怎样领导阶级斗争？

二 认识问题

十中全会后，跑了十一省，只有□□、□□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人都不讲。二月会议后，情况有了变化。河南五个月没有抓阶级斗争，二月会议以后，抓得很好。有变化，但并不是都通了，有个地委书记，二月会议以后，就不通，下去试点以后才通。

我看了湖南第二个材料，现在才懂得一点，即搞规划、生产经营时，也有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问了许多人，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都回答不出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不识字的农民也懂得这一点。比如说，你问农民，他知道张三是地主，是压迫我们的，有了“张三”“地主”这两个概念，就可以推理：地主是剥削人的人。农民的认识是从生活中来的，不识字也可以懂哲学。成吉思汗就不识字。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这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

哲学要在实际工作中讲，要在开会中讲。要告诉你身边的同志，哲学并不难。军事学也不难，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

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少数的几个人是从军事学校中出来的。翻了军事书，看了欧洲战史，和中国情况对不上。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的半年的入伍生，派出来当连长，根本不能打仗，听班长的。班长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军事是从实践中学的，所以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看得那么神秘，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我看《雪峰一部分日记》，此人就懂得一点哲学。

大学生学习五年就学好哲学？我不相信。许多哲学家都不是大学学习的。中国的哲学家中，王充、范缜、付玄、柳宗元、王船山、李贽、戴东原、魏源……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黑格尔也不是专门搞哲学的，他的学问很广。康德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的天体论到现在还有价值。马、恩、列、斯也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

山沟里出哲学。醴陵那样好的报告，不出在湘潭，不出在常德，而出在醴陵。在困难中、在斗争中才能够出哲学。逆境出哲学，顺境能够出哲学吗？三国的黄盖兄，醴陵人；程颐、程颢的老师周濂溪，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和他是一个系统的，也是醴陵人，是醴陵专区的道县人。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派。唐代的大书法家怀素，也是这里的。柳宗元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整整十年都住在醴陵，当时叫做永州。他的山水文章，和韩愈辩论的文章，都是在那里写的。

所以要破除迷信，不过要注意，不要像前几年那样，把不应该破的也破了。

事物有现象、有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统一。本质是看不到的，要透过现象去抓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会产生修正主义。又比如平常我们走路看不到蚂蚁，

大踏步就更看不到了，要蹲下来才能看到蚂蚁，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到，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东西也看不见。比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有些人却看不见。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有的人是主观主义地大胆假设，主观主义地小心求证。河北各地委下去调查研究，只有保定地委是科学的，其他都是主观主义的。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而是去搞分配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哲学，莫斯科宣言写上了，在国内反倒没有人讲。

三 要点

运动的要点是什么？是十个问题，其中一部分是认识问题，是要高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解决的。还有一些问题是普遍工作要解决的，普遍工作中的要点有以下几点：

1. 阶级、阶级斗争。用什么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一定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问题，最先写四大家族的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贾、史、王、薛大家族，他们是奴隶主，三十二人。写奴隶女，鸳鸯、晴雯、小红等，都是很好的，受害的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属于四大家族的。

2. 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有两大条：

第一条是让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

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盖子。

第二条，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

3. 依靠贫下中农。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富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

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农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舒畅？贫农、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够舒畅？

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拉后继人。

四 四清

什么叫贪污？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只要坦白了，退了赃，就不算贪污。

赃要退，也要合情合理，退到手脚干净，又要退到让干部能够生活。这样做究竟退多少？是不是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

惩办要控制在百分之一。

今年不要开杀戒，明年再说。罪大恶极的也先放慢一些，现行反革命按规定办理。群众要求非杀不可的，是有道理的，你领导可

以等一等嘛！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昔阳干部劳动很好。昔阳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

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里。
(有人说，有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

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模范？取消好了。有的因为会多，接待访问太忙，这个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到田间去访问嘛！

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给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家当老百姓去。

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一了。

贪污揭发得越多，我越高兴。你们抓过虱子没有？身上本来很多，抓得越多越高兴。

五 方法

要采取积极态度。

1. 要注意训练和教育干部；
2. 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后年。土改不是搞了三四年吗？有的人不信，不要去责备他，你一围攻，他一着急，

就乱来。要慢慢地说服，着什么急？我们革命胜利比苏联还不是晚三十多年？

3. 要试点，要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防止敷敷衍衍地走过场，一定要搞试点；

4. 要区别不同情况，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不要一起搞。（讲了西汉陈平的故事）（对李□□）你四川那么大一个省，一下子能够搞得了吗？

5. 精简。要精简一些干部下去搞劳动锻炼，搞阶级斗争锻炼。我身边原有二三十人，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我对江□□说，江苏四千多万人，省直机关工作人员五千，可以精简一千五百人或两千人。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6. 要抓住重点。“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香山记》是讲庄王的女儿（即观世音菩萨）的故事，七个字一点，开头两句就是这个。天和地可以隔开，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抓阶级斗争。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

(1963年至1965年)

—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第十个问题中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一封信的主要部分。刘少奇在1964年9月25日将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9月8日给他的信和他9月23日的复信稿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天给他写了这封信。本篇四是1964年10月18日毛泽东再阅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修改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五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六是毛泽东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的一个批注。本篇七是毛泽东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旁写的一个批注。

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一九六三年五月)

二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三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四

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

五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1]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1]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200万年。

六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1]，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自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一九六五年）

七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

[1] 指1931年初至1934年底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王明等人。

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一九六五年）



1963年6月16日，毛泽东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崔庸健。

对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计划调整 和执行情况报告（草稿）的批语

（1963年6月26日）

送恩来^[1]同志修改。此件^[2]已看过，可用。但杭州会议几段话（见第6页，第35、36、37页，第41页）^[3]，暂时不要采用。另在第1页关〔于〕春季作物的说法，应改写一下。

毛泽东

六月二十六日

[1] 恩来，即周恩来。

[2] 指周恩来1963年6月9日报送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草稿）》。7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9次会议作了这一报告。

[3] 第6页上的一段话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第35页至第37页上的两段话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第41页上的一段话是：“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

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 $1/4$ 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1963年6月29日，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中国运动员参加27届世乒赛获得的奖杯。



1963年6月29日，毛泽东接见参加27届世乒赛的运动员。

关于发表中共中央声明^[1]的批语^[2]

(1963年6月30日)

康生同志：

已看过，同意小平同志意见。

毛泽东

卅日下午七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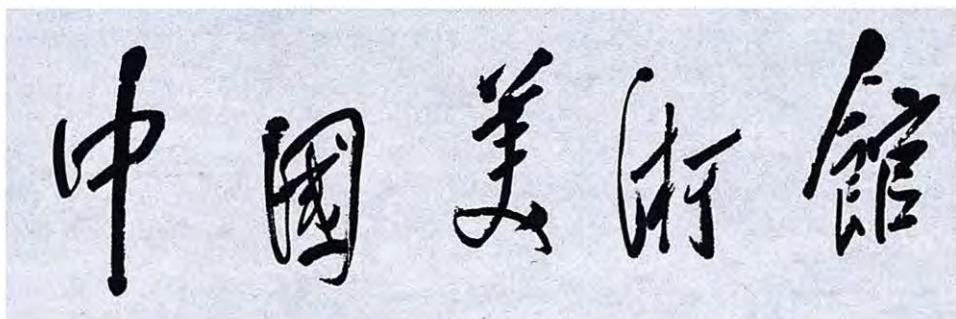
[1]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7月1日声明。声明说，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7月5日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声明还对中共代表团提出要求，并期望两党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这个声明在1963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这个批语写在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63年6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赫鲁晓夫的报告全文已收到译出，其中攻击中国党的一段，另纸抄上。邓小平说，原中共中央声明稿可以定下，不要改了。在今晚8时政治局通过后，今晚即可广播，明天即见报。所说赫鲁晓夫报告，是指他在苏共中央6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

为中国美术馆题名^[1]

(1963年6月)

中国美术馆



毛泽东为中国美术馆题写的馆名。

[1] 中国美术馆建成于1962年。最初取名“中央展览馆”，是毛泽东在题写馆名时改为——中国美术馆。1963年6月，毛泽东题写“中国美术馆”馆额，明确了中国美术馆的国家美术馆地位及办馆性质。

对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普遍发到农村支部的请示的批语^[1]

（1963年7月5日）

刘、周^[2]再阅。退谭震林^[3]办。

一定要有政治上强的工作组到达地方，才可以发到支部，由内到外，普遍宣读，否则一律不要发。

毛泽东

七月五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杨树青建议把《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普遍发到农村支部的请示报告上。在送毛泽东批阅前，刘少奇、周恩来、谭震林已阅过。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3]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 四十二周年的电报

(1963年7月10日)

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值此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二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蒙古人民、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祝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成就。

近几年来，中蒙两国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互助合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一九六二年，中蒙两国政府本着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互谅互让的精神，顺利地签订了两国边界条约，为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同蒙古人民一起，为不断加强中蒙两国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

斗争的新胜利而共同努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

对《人民日报》关于加强团结的 社论稿的修改^[1]

(1963年7月)

我们只有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义务。
我们没有放弃原则、扩大分歧、制造分裂、认敌为友的权利。

[1] 这篇社论稿原题为《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毛泽东审阅时改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社论于1963年7月1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对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稿的修改^[1]

(1963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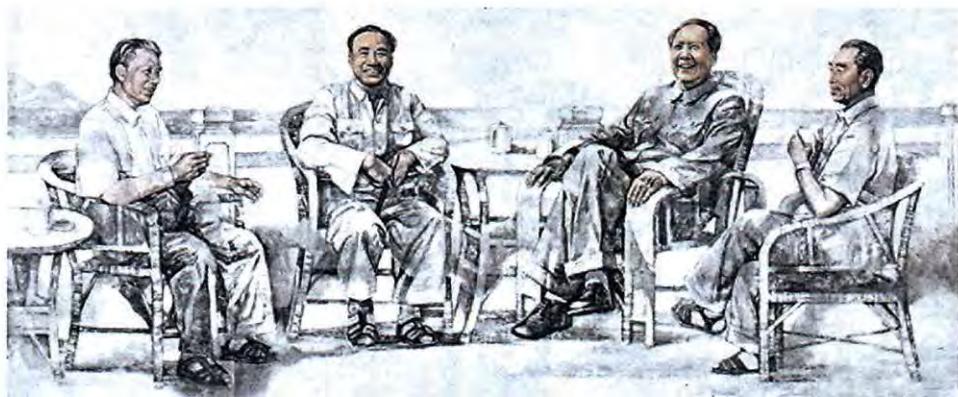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再一次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便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其他全国性报纸和省市级以上的报纸，也将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还决定，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信虽然早在六月中旬广播了，那时可能有些人没有收听到，又很可能有些反对我们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们不愿意收听，现在我们再广播一次，希望上述两类人，特别是反对我们的人，耐心地听一听，以便这些人手中有材料，可以对我们作出像样的批判。老实说，这些人过去对我们的一切批判，都是不像样子的，都是不能说服人的。至于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恐怕世界上广大的革命同志和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声明7月18日下午稿的修改。声明发表在1963年7月20日《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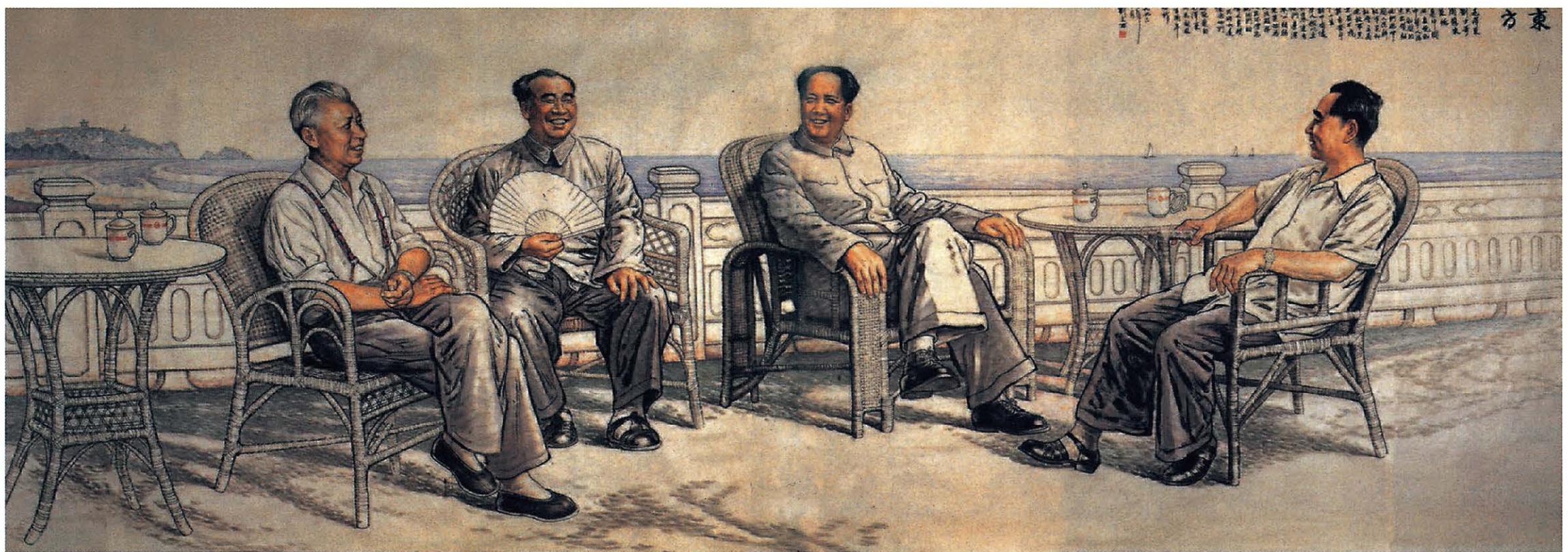
革命人民当着苏联广播他们的这篇“奇文”时，不愿意和不耐心收听，我们奉劝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宜采取这种态度，而要耐心收听，好好研究，公开发表，以便将正、反两种材料对比起来，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分析和批判。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发展唯物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而要批判，就要掌握对方的材料。苏共这次的公开信，正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世纪伟人》(中国画)



《景仰》(中国画)



《东方》(中国画)

对《人民日报》为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 写的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

(1963年7月19日)

—

尾页有修改¹¹¹。

毛
十九日下午一时半

[1] 即本篇二，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文字。

—
—

类似这样的情况^[1]，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1] 指编者按中所列举的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采用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制造攻击中共领导人的事例。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说中国领导人对它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本来是由苏联造成的中苏经济贸易联系缩减，却反而责怪到中国方面。



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共举行双边会谈。图为毛泽东到机场迎接中共代表团回国。



1963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首都机场。



1963年，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在机场。



1963年，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在机场。



1963年7月，毛泽东和早年相识的师长、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交谈。



1963年7月，毛泽东和全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握手。

关于赦免在押国民党军将领等问题^[1]

(1963年7月20日)

—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打我们。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几百万军队被我们消灭了，剩下几十万残兵败将逃到台湾。北平城解放是没有经过战争的。接受改编的军队由傅作义^[2]将军率领。傅作义将军还在，还在政府里工作。他是我们水利电力部的部长，也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的干部都得到了工作。我们对待这些人，只要他们不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同他们合作的，哪怕是那些同我们打过仗、被俘的将军。有好几十位国民党将军现在在我们这里，大部分已经得到赦免。没有必要对他们采取不人道的方法，就是说没有必要杀死他们，也没有必要把他们长期地关在班房里。过了一个时期，就可以赦免他们，使他们取得公民权，并且可以得到工作。有些年老的可以得到养老金。愿回台湾的，可回台湾。为什么他们很少回台湾？有些人家属

[1] 本篇一和二是毛泽东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佩雷拉及夫人时谈话的一部分。

[2] 傅作义，原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在台湾，为什么不去？他们可能害怕台湾当局会杀他们。因为台湾多次宣布说他们被我们杀掉了，如果一回去，就证明没有被杀。无论将、校、尉，没有一个被我们杀了的。台湾害怕他们这些人回去宣布这个消息，说我们只要他们不抵抗或者是战争完了，一个不杀。台湾怕军队知道这个消息。至于打仗时候的伤亡，双方都有。比如说徐州这一仗，即淮海战役，双方参加的队伍各有几十万人。那次伤亡的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没有伤亡。特别是徐州附近的最后一仗，没有怎么打，对方军队就缴械了。

二

这位司徒雷登^[1]，我也见过，谈过话。那时是在重庆，他刚从北平日本监狱里放出来。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美国政府政策的问题。美国政府开头是讲调解，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调解。他们说对双方都不帮助，不帮国民党打共产党，也不帮共产党打国民党。他们大使到过延安，接我到重庆去，这个人叫赫尔利^[2]。后来美国总统的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3]也来中国调停，停留了好几个月。他到过延安，我跟他谈过一次。后来证明那是一个骗局，目的在于使蒋介石能有时间调遣和集结军队向我们进攻。后来美国的假面具撕破了，它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帮助武器，帮助财政，这笔账算不清楚，可能有几十亿美元。到我们解放军解放南京时，美

[1] 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学校长，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2] 赫尔利，1944年11月至1945年11月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3] 马歇尔，1945年12月至1946年8月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在中国“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

国大使司徒雷登不走。我们还派了黄华同志去见他。黄华同志过去是外交部的司长，现在是驻非洲加纳的大使。他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司徒雷登是他的校长。

英国承认我们，但是美国不承认。美国也不让法国，不让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承认我们。例如说拉丁美洲各国，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只有一个古巴。在欧洲，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比较多一点，例如英国、瑞士、荷兰，北欧的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等。亚非国家承认我们的又比较多一些了，但是泰国、菲律宾、日本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到现在还没有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

日本政府实际上同我们有往来，日本广大人民同我们友好。他们感觉我们对他们好，包括一些过去打中国的将军，比如被俘的将军和没有被俘的将军中间有许多人也对我们好。日本有个问题，就是受美国控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受美国控制，那里有美国军事基地。日本现在没有殖民地，它的殖民地被美国夺去了，比如南朝鲜、台湾、菲律宾、泰国，过去都是日本的殖民地或在战争中占领的地方。再如南越也是日本占领过的地方。

现在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美国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拉美，这是大家知道的。现在伸到亚洲，伸到印度去了。美国的手伸到非洲，伸到欧洲，伸到澳洲^[1]。这种情况会引起一种变化。这些被控制的国家和人民总有一天要起来反对美国。

[1] 这里指大洋洲。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家复兴节 十九周年的电报

(1963年7月21日)

华沙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值此波兰国家复兴节十九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向波兰人民、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
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十九年来，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的领导下，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人民对此感到高兴。

中波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建
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我们两国人民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维
护和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
益，而且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力
量的增强。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的基础上，努力增强中波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并且同波兰人民一
道，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

会主义的斗争的新胜利而努力。

祝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日益增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1963年7月22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



1963年7月23日，毛泽东接见作家邵荃麟。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周年的电报

(1963年7月25日)

哈瓦那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卡·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欣逢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周年的光荣节日，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谨向英雄的古巴人民、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革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十年前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领导古巴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发动了对蒙卡达兵营的英勇袭击，为古巴人民揭示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此后，古巴人民经历了艰巨的斗争，终于推翻了美帝国主义走狗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并且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美洲大陆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人民又不断地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胜利地击败了美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的武装侵犯，这不仅保卫了古巴革命的果实、国家主权和尊严，而且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古巴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当代伟大的历史事件，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古巴人民用自己的革命经验和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写下了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两个哈瓦那宣言，提出了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团结战斗的革命纲领，大大地鼓舞了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的信心。我们深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洪流，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必将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美帝国主义者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决不会放弃对古巴的干涉和侵略。我们深信，古巴人民依靠自己的紧密团结和坚强斗争，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战胜各种困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中国人民重申：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古巴人民最忠实和最亲密的战友。中古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结成的战斗友谊是经得起一切严峻考验的。

祝古巴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取得更大的胜利。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接见古巴文化、工会、青年学生 代表团的谈话^[1]

(1963年7月26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文化代表团到什么地方去看一下没有？

奥斯卡^[2]（以下简称奥）：到上海、广州、武汉去参观过。

毛：一共有多少时间？

奥：刚好二十六天。

毛：代表团是什么时候到的？

佛利斯·库左拉（以下简称佛）：上个礼拜天到的。

张□□（以下简称张）：周总理昨天接见时，希望青年代表团到延安去看看。

佛：昨天中央的同志对我们讲，可以到延安去参观。

毛：那个地方很落后。到落后的的地方去看看，也有好处。文化代表团来签订文化协定，签好了没有？

奥：前天中午（二十四日）已签了字，我们非常满意。

毛：非常满意吗？

奥：是。非常满意。

[1] 这是毛泽东会见古巴文化、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 奥斯明，指奥斯卡·费尔南德斯，当时为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代表团团长。

毛：协定包含些什么内容？

奥：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两国互派代表团访问的事情，古巴方面将邀请中国杂技艺术团去访问，同时我们也要派艺术团来中国。另外，双方要互派语言留学生，交换影片、书刊以及其他文化资料等。

毛：我们的影片，恐怕不那么高明。

奥：电影是教育人民群众的有力工具，我们相信，中国电影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毛：影片的作用是不小，但我们的好片子太少。

奥：中国的电影事业，像其他经济建设事业一样，正在飞快地向前发展。

毛：我们的胶片还不能够完全自造。你们能够制造胶片吗？

奥：古巴不出胶片。

毛：是进口吗？

奥：进口。古巴的电影，主要是些纪录片和短片。

毛：慢慢发展下去，就会搞长片。我们的杂技，是历史上留下来的玩意。

奥：到哈瓦那去的，是由武汉的杂技团组成的，我们亲自到武汉去看过他们的节目。

毛：杂技团去过古巴没有？

张：没有去过。以前，去过歌舞、京剧团。

毛：杂技团过去不是去过吗？

张：那是到拉丁美洲巴西等国访问。当时，古巴革命还未成功，我们的艺术团进不去。

毛：古巴革命进展很快，几年之内，就战胜了敌人。我们的革

命时间很长，搞了二十几年。有本国的敌人，也有外国的敌人。外国的敌人是日本，我们和他打了八年；国内的敌人是蒋介石，和他打了十四年。日本没有打进来以前，和蒋介石打了十年，日本投降后，又打了四年。蒋介石后面有美帝国主义支持。后来，又在朝鲜和美国人打了差不多三年。有很多人怕美国人。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人怕美国。打了三年之后，怕美国的人少了。现在，美国人又在越南南部打，越南南方人民只有很落后的武器，而美国有很多新式武器，包括飞机、大炮、直升飞机、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但是，打了五六年，越南人民和军队在发展，根据地在不断扩大，他们不怕美国人了。这些经验很值得讲一讲。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兵还不如日本兵。我们和日本打了八年。美国的士兵还是有战斗力的，他们武器多、武器好，但是，他们不喜欢打仗。美帝国主义为了霸占全球，用战争威胁全世界人民，作各种战斗准备。一种是核战争，这种战争有可能打，也有可能不打；另一种是常规武器的战争。他们的方针是打常规武器的战争，在越南打的就是这种常规战争。过去和我们、朝鲜人民打的，也是这种战争。那时，他们不是没有原子弹，而是不敢打；现在原子弹更多了，可是在越南南部也不敢打。美国现在的三军参谋长泰勒^[1]，此人就是在朝鲜和我们打过仗的。他写了一本书大家有机会最好看看，书名是：《音调不定的号角》。在这本书里，他批评杜鲁门^[2]和艾森豪威尔^[3]过去不重视常规武器的战争。他认为，又要打原子战争，又要打常规战争。叫喊打原子战争，但又不打，这就叫作

[1] 泰勒，当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2] 杜鲁门，1945年4月至1953年1月任美国总统。

[3] 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至1961年1月任美国总统。

音调不定。泰勒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当过陆军参谋长，后来因为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辞职不干了。肯尼迪^[1]当选为总统后，他又起来了，当了陆、海、空三军的参谋长。

据您们看，全世界人民现在还那么怕美帝国主义吗？

奥：从我们来看，现在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在拉丁美洲，如委内瑞拉、秘鲁等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日益高涨。他们国家虽然很小，进行常规武器的战争力量不够，但还是在那里进行斗争。他们不怕美帝国主义，敢于反对在美国支持下的独裁反动统治。

毛：他们和你们一样。如果只是怕，把手缩回来，让人家抓住关在监牢里，或者杀掉，那革命的火焰就熄灭了。我们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很多人怕美国。但是，怕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能解除武装吗？那个时候，大多数人无所谓怕不怕，因为敌人已经打来了，怕又有什么用？打的结果，我们胜利了，可见不必那么怕，怕美国是多余的。除美国之外，还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如法国，他们在越南北部打，结果胡志明^[2]同志打胜了；在阿尔及利亚，阿民族解放军也打胜了。他们打了七年，经历了许多困难，法国军队多到八十万之多，而阿民族解放军只有三四万人。他们很多人都同我讲过，包括现在的议长、过去的总理阿巴斯。你们知道阿巴斯吗？

奥：知道他的名字。

毛：他们对我们谈过很多，谈过他们的困难，阿牺牲了九分之一的人口，就是说，九百万人口中死了一百万。另外，法国军队领

[1] 肯尼迪，当时任美国总统。

[2]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导机关还出版我写的小册子，企图打败阿民族解放军。我告诉他们，我写的小册子，是人民战争的小册子，反人民战争的那一方面，不可能利用，他们想利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蒋介石也利用我写的小册子，想把我们打败，结果还是不行。美国人也想利用我们的办法，他们有很多人研究中国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但是在朝鲜战争中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在朝鲜战争中，除美国外，还有十五个国家参了战。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哥伦比亚等，当然，主力是美国。美国去了一个师，土耳其去了一个旅，哥伦比亚去了一个营，他们是凑起来的。他们到朝鲜来，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子。打了两年半快三年，谈判就整整谈了两年，当时是一面打，一面谈。谈判的地方就是双方交界的一个小地方——板门店。

奥：我们在朝鲜时到过那个地方。

毛：朝鲜很可以去看一看。要研究那个时候怎么一面打，一面谈；怎么用很少的人和武器，战胜了拥有强大武器的敌人。

奥：我们在朝鲜呆了十天。

毛：在朝鲜看过防御工事没有？

奥：我们在朝鲜访问时，去了开城和板门店，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展览馆中有一个一二一一高地模型，山头被敌人打去了两公尺。

毛：我们用各种办法对付敌人，山地有山地的办法，平原有平原的办法。不管敌人武器多么好，多么强，因为他们是反对革命，不利于人民的，不可能得到胜利。他们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失败。最后，所有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要灭亡，我们在座的人

就是证据。美国支持的反动派巴蒂斯塔^[1]，不是也失败了吗？你们在和反动派斗争中，有外国援助没有？

奥：只有七支步枪。

毛：是啊！没有任何外国援助，就是步枪，而且很少，也胜利了，我们中国的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你们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因为敢于和他打，终于打胜了。

恩来^[2]同志劝青年代表团到延安看看，是有理由的。延安虽然很落后，但在当时是我们领导机关的所在地。蒋介石在南京、上海，南京是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上海是七百万人口的城市，那里住着外国人，很容易得到外国人的援助。延安城和附近只有七千人。看来，不是大城市打胜小城市，而是小城市打胜大城市；不是大城市打胜乡村，而是乡村的人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不是有大炮、飞机、坦克的敌人打胜我们，而是只有步枪、轻炮、手榴弹的人民军队打胜了敌人。起初，我们没有大炮，打到第二年，就有了大炮，打到第三年，大炮更多了。是哪里来的呢？是美国的，是蒋介石运输给我们的。后来，我们也有了坦克，也是蒋介石送的。当时就是没有飞机，现在的空军是解放以后建设起来的。没有空军也可以打胜有空军的。飞机的作用很小，打不死几个人，破坏不了多少工厂和房屋。你们有人到过伦敦没有？

奥：我们代表团中，有一个同志到过。

毛：伦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处于很危险的地位。英国军队从敦克尔克撤退后，军队毫无组织，海岸线没有防御了，空军不能防卫伦敦了，海军也不能保卫运输线，陆军、空军损失很大。当

[1] 巴蒂斯塔，曾任古巴总统，1959年其独裁政府被推翻。

[2] 恩来，即周恩来。

时，希特勒的空军猛烈轰炸伦敦，可是并没有破坏多少。据我们这里看过的同志讲，后方陆、海、空军很快就恢复了。所以说，空军的作用不大。在战争当中决定胜负的还是步兵、陆军。你们在战争中，敌人有无空军？

奥：他们猛烈轰炸解放区。

毛：作用大不大？

奥：唯一的效果，就是敌人费了很多钱。

毛：我们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也曾大编队轰炸延安。有一次，炸死了一头猪，一个人也没有炸伤、炸死。另外一次，在乡下打死了两个老百姓。今天谈得太多了吧！

奥：我们非常渴望听到毛主席的谈话。

毛：我今天是谈了一点历史，以后有机会再谈。

关于在党内传达中苏两党 会谈记录的批语^[1]

(1963年7月28日)

小平同志：

单是念不够，似应印发，十七级以上干部每若干人一本（例如三人或五人一本），以便他们讨论研究。三个月后，一律收回。请酌定。

毛泽东
廿八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报送的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写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现在，有不少单位提出要求，希望了解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这种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考虑，可否将两党九次会谈的记录，在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中念一次。这对党内干部的反修教育，是有好处的。

对一篇评中苏分歧的文章^[1]的批语

(1963年7月31日)

吴冷西^[2]同志：

这篇文章，似可发表。

毛泽东

七月卅一日

全文都好。

[1] 指新华社1963年7月31日《参考资料》上刊载的《柬埔寨电讯报》发表的《赫鲁晓夫是否改变态度了?》一文。文章指出，在中苏分歧中，苏联歪曲了中国关于核战争问题的观点，在和平共处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恰恰和西方国家不谋而合。人们本来希望中苏之间取得妥协，但赫鲁晓夫同西方接近的既成事实，使这种希望完全化为乌有。这篇文章在1963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杂言诗·八连颂^[1]

(1963年8月1日)

好八连，天下传。
为什么？意志坚。
为人民，几十年。
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
解放军，要学习。
全军民，要自立。
不怕压，不怕迫。
不怕刀，不怕戟。
不怕鬼，不怕魅。
不怕帝，不怕贼。
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傲霜雪。
纪律好，如坚壁。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6周年时为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题写的杂言诗。1949年5月，这个连队进驻上海南京路，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批准授予该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军事好，如霹雳。
政治好，称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
分析好，大有益。
益在哪？团结力。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观看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演出的《雷锋》后接见演员。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观看话剧《雷锋》后接见演员。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和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雷锋》剧组合影。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和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雷锋》剧组合影。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和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雷锋》剧组合影。

关于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1]的批语^[2]

(1963年8月7日、8日)

—

浦寿昌同志：

声明稿可用。请即请人翻译成英、法两种文，于明（八）日下午二时前，连同原稿交我为盼。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下午八时

[1] 这篇题为《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由毛泽东署名，在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

[2] 本篇一写在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周恩来办公室秘书浦寿昌1963年8月6日为送审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修改稿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本篇二写在这篇声明的铅印稿上。

关于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的批语

二

请少奇、小平^[1]同志阅后，交新华社办。

毛泽东

八日十时

[1]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支持美国黑人 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1]

(1963年8月8日)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黑人共一千九百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2]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十一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

[1] 这个声明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

[2] 三K党，是美国的种族主义恐怖组织。1866年由美国南部奴隶主为镇压黑人和维护奴隶制度而建立，成为美国反动势力推行种族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

别骇人听闻的。

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强烈。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当地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当局使用了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造成了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一九六〇年，二十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抗议当地餐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

一九六一年，黑人为了反对在乘车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好几个州。

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遭到当局镇压，造成流血惨案。

今年，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四月初从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只是由于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竟然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镇压。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惨遭杀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众，不畏强暴，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且迅速地得到美国各地广大黑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黑人团体已经决定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二十五万人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

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接见非洲朋友^[1]时的谈话

(1963年8月8日)

毛主席在接见时，同非洲朋友进行了极其亲切友好的谈话。他在谈话中除了谴责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以外，还谴责了南非殖民者当局以及全世界所有地方的种族歧视。毛主席说：“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为争取完全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毛主席介绍了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经过以后说：“可以证明，人民的革命是能够胜利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能够打败的。整个非洲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不管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的。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支持你们的。非洲人民正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人民都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

[1] 毛泽东接见的非洲朋友有：以巴苏陀兰（今莱索托）大会党委书记古德弗利·科利桑为首的巴苏陀兰大会党代表团、科摩罗民族解放运动主席阿里·穆哈默德·沙米、以留法黑非洲学联外事书记达松社为首的留法黑非洲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驻开罗代表特赖诺斯·马孔贝、怯尼亚（今肯尼亚）作家加亨格里。接见时，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

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革命的人民，都能够团结起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毛主席说：“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接见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会代表团。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会见非洲朋友，并观看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赠送的礼品。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会见非洲朋友。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1]

(1963年8月9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见到你们很高兴。昨天我见了一批非洲朋友。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觉得平等。我们不把意见强加于你们，你们也不强加于我们。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斗争中的经验。

舍马克（以下简称舍）：几天来，我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富有内容的会谈，我对会谈的结果感到很满意。我确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加强。

毛：谈政治、经济，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舍：我们谈了一般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两国关系。双方就联合公报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达成了协议。

毛：我们的经济搞得还不行，现在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正在努力，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总会有所进步，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更多更好地满足外国朋友的需要。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你们知道，我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对西

[1] 这是毛泽东和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

方国家来说，中国这个国家好像不存在一样，但又好像存在。杜勒斯^[1]说过，中国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为什么中国存在呢？在朝鲜战争中，有中国人同美国人打仗，所以西方国家感到中国的存在。为什么中国又不存在呢？它们认为，中国是个情况不好的国家，不需要几天就要垮下去，就会崩溃、垮台，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好像不存在。西方对非洲也是这样的看法。它们认为，非洲是非洲人的地方。如果非洲是西方人的，那末非洲不就是不存在了？现在它们好像开始看见有一个非洲存在着。非洲几十个国家已经独立，没有独立的国家的人民也在斗争。西方对亚非国家是很头痛的，对拉丁美洲也很头痛。这三大洲过去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备，现在它们感到这三大洲有些起哄，在闹地震。

舍：这是真的，它们觉得这些地方出了岔子，违反它们的意志。

毛：你们就是不服从意、英、法的意志。

舍：我们独立不久，非常珍视我们的独立，我们自己要负起责任，确立我们自己的人格。过去很长时间内我们是被支配者，现在我们要做历史的主宰。过去西方殖民者不把我们当做人，只把我们当做东西。

毛：他们只看到东西，因为东西有用。人能够为他们生产财富，所以才有用，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用了。现在我们不为西方国家生产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财富，所以它们就天天骂我们，特别是美国。你们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美国吧？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同日本有外交关

[1] 杜勒斯，1953年至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

系吗？

舍：有外交关系，但日本在索马里没有使馆。

毛：我们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因为日本不承认我国，它跟着美国走。

舍：是日本政府，不是日本人民。

毛：日本人民很好，我们同日本人民关系很亲密。美国反对中国的也不是美国人民，我们和许多美国人有来往。我们同英、法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

舍：对我们说来，斗争对象主要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然后才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这些国家把非洲看做是它们的势力范围，美国要过问非洲就等于过问它们的内政，未经它们的同意，美国很难做什么事情。它们认为非洲既然过去是它们的殖民地，它们就有权保持势力范围。现在非洲国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独立了，非洲人是非常珍惜自己的人格的，决不让非洲成为人家的势力范围。

毛：把非洲国家当做势力范围，这种过去的老规矩不行了。现在非洲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一些国家通过战争取得独立，如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它的几万军队与法国的几十万军队打仗，几十万军队失败了，几万军队胜利了。为什么几万军队能战胜几十万军队呢？在几万军队后面有几百万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法国的几十万军队得不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阿尔及利亚一千万人口，其中有一百万法国人，现在他们大部分都跑了。还有阿联^[1]为维护苏

[1] 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年由埃及、叙利亚合并组成。1961年9月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971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伊士运河的主权，曾同英、法打过仗，结果英、法被打跑了，现在苏伊士运河控制在阿联手里。

总而言之，帝国主义的阵地在缩小，大大缩小。如果它们在非洲的阵地大大缩小了，在中国大陆它们也管不着了。听说你们不喜欢驻北京的英国代办。

舍：对个人我们没有怨气，我们反对的是英国政府的政策。过去英国有七次拿我国的领土做交易。当时我们无能为力，因为我们还没有独立。可是，在我们独立后，英国再把我们的领土给别人时，我们就同它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现在英国在索马里就无法保持它的影响。

毛：这样很好。当英国和法国用战争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也和英、法断了交，最近才恢复。几内亚独立后，也同法国断过交，去年才恢复。

舍：是。这些都是同过去统治者搞关系的经验教训。

毛：美国不承认我们，日本同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英国、荷兰同我们只是半建交关系，法、意、西德迄今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还有跟它们走的土耳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也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

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

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也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

舍：我们相信。人民会为自己的解放而努力。如果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人民不是自己起来，而靠外国参加的话，那就等于内政遭到干涉。

毛：受压迫的人民自己总是要起来的。

舍：自由主要靠当地人民自己去争取。

毛：完全赞成。我们认为，支持就是声援，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必要时给予武器援助。如对阿尔及利亚，我们就给了武器援助。

舍：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表明他们要独立，呼吁帮助。如果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表明要独立，那怎么办呢？

毛：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舍：如果香港人自己要解放，把英国赶走，能拒绝帮助吗？

毛：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对谭震林^[1]关于全国水旱灾害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3年8月9日)

这个报告^[2]的内容及其同1956、1960、1961、1962年的比较数字，应在报上发表^[3]。

毛泽东
八月九日

[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谭震林1963年8月7日关于全国水旱灾害的情况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的报告。报告说，7月下旬以来，冀、鲁、豫、苏北、皖北的水灾形势近似1956年，抗灾条件好于1956年。今年夏收前，全国水旱灾害面积有1.1亿多亩。目前仍在受旱的近4000万亩，这次水灾可能受淹面积估计为8000万亩左右。全国到这次水害为止，累计受害面积可能达到2.3亿亩左右。1961年为9.2亿亩，1962年为5.7亿亩。

[3] 周恩来1963年8月9日接到这个批语后，当面报告毛泽东，建议灾情比较情况暂缓在报上公布。

关于印经典著作大字本的批语^[1]

(1963年8月14日)

周扬同志：

同意用照相放大胶印的办法。但请注意封面不用硬纸；大书（例如《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过去例作一卷或两卷，现应分装四卷或八卷，使每卷重量减轻。

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上。周扬的报告说，规定干部阅读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的书目问题，已由陆定一同志主持召集会议讨论过一次，并初步拟定了一个书目，现已送请陈伯达审阅，最后商定后再报主席。印经典著作大字本事，出版方面同志的意见，以采用照相放大胶印为好。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 十八周年的电报

(1963年8月14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值此朝鲜解放十八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兄弟的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朝鲜人民经过长期英勇斗争，在十八年前推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开辟了朝鲜历史上的新时代。朝鲜人民走过的道路是一条历尽艰辛和充满战斗的道路。朝鲜人民十八年的历史，是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犯和挑衅、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历史。

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以不屈不挠的革命气概，克服重重困难，迅速把自己国家建设成为具有自主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工农业国家。今天，朝鲜人民继续高举朝鲜劳动党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千里马运动的旗帜，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满怀信心，为攀登社会主义建设的新

高峰，奋勇前进。中国人民衷心祝贺兄弟的朝鲜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为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军占领南朝鲜、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这一正义斗争，并且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朝鲜人民。

今年六月崔庸健同志对我国的友好访问，标志着中朝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领导人所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鼓舞着我们两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鼓舞着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决心同朝鲜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胜利而共同奋斗。

祝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

在《光明日报》刊载的 一篇文章上的批语

(1963年8月19日)

康生^[1]同志：

这篇文章^[2]可以一阅。你谈的一个美国教授写的那篇哲学文学〈章〉，我已看了一遍，觉得他是一个完全不懂列宁哲学思想的人。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2] 指1963年8月16日《光明日报》上刊载的署名章凡的文章《列宁批判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札记》。这篇文章讲了三个问题：一、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对立；二、科学发展同相对主义的对立；三、相对主义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章凡，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张恩慈的笔名。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 十九周年的电报

(1963年8月22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格·乔治乌—德治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毛雷尔同志：

在罗马尼亚解放十九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人民、中國共產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羅馬尼亞人民、羅馬尼亞工人党和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致以熱烈的祝賀。

一年來，兄弟的羅馬尼亞人民在以喬治烏—德治同志為首的羅馬尼亞工人党和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領導下，團結奮鬥，在建設社會主義和爭取實現國民經濟六年計劃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在保卫歐洲和世界和平方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國人民對此感到由衷的高興。

中國和羅馬尼亞是社會主義兄弟之邦。一年來，我們兩國本着相互尊重獨立和主權、平等互利、互助合作的原則，在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友好合作，有了良好的發展。這種發展是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的，是符合兩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利益的，是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力量的。中國人民一向珍視同

罗马尼亚人民的友谊，并且相信，通过双方的努力，中罗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祝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罗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反对美国—吴庭艳^[1]集团侵略越南南方 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1963年8月29日)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2]，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吴庭艳集团

[1] 吴庭艳，当时任南越傀儡政权“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2] 1963年5月8日，越南南方顺化市约两万名佛教徒为抗议吴庭艳集团禁止举行佛祀仪式，进行游行示威，遭到当局武装镇压，当场被打死12人，伤17人。6月11日，西贡市70多岁高僧广德法师为抗议当局对佛教徒的迫害而焚身自杀。6月16日，西贡堤岸70万市民不顾当局的镇压，为广德法师举行葬礼。此后，又有4名僧尼焚身自杀。这次从佛教徒开始的斗争，很快扩大为有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市民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群众性斗争。吴庭艳集团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他们焚烧寺院，封闭学校，甚至动用毒气弹等武器来对付示威群众。8月20日，南越当局宣布全国戒严，继续逮捕佛教徒和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从而激起了各阶层群众更广泛的抗议行动。

进行坚决的斗争。

与越南南方全体人民为敌的美国—吴庭艳集团，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包围之中。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鲜李承晚的下场，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

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1]，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2]，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

[1] 指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12个侵朝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傀儡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2] 指1961年5月16日至1962年7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会议，又称“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会议最后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

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

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不论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

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1963年8月29日，毛泽东接见以阮氏萍为首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

关于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1]集团 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 的声明》的批语^[2]

(1963年8月29日)

送刘、周、小平^[3]同志阅后送新华社办（今晚广播，明日见报）。

毛泽东

经与越南同志商议，有所修改。

[1] 吴庭艳，当时任南越傀儡政权“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2] 这个声明在1963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声明的题目是毛泽东拟定的。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63 008

~~越南南方~~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
~~越南南方~~人民的聲明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六日

送周恩来(此件送新华社)(急速度搞,明日见报)

毛泽东

经与越南同志商谈,所作修改。

中央书记处
1963年8月26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毛泽东关于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的批语的手稿。

悼念杜波依斯^[1]逝世的电报

(1963年8月29日)

杜波依斯夫人：

我沉痛地获悉杜波依斯博士逝世的消息，谨向你表示深切的哀悼。

杜波依斯博士是我们时代的一位伟人。他为黑人和全人类的解放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和他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1] 杜波依斯，美国著名黑人学者，1963年8月27日病逝。

关于越南南方革命斗争的 战略策略问题^[1]

(1963年8月30日)

—

你们的战争是国内战争，又是国际战争，主要是国际战争。吴庭艳^[2]没有美国帮助就不行。中国过去打蒋介石，也是这样。形式上是国内革命战争，实际上主要是打倒美帝国主义。中国当时的革命任务，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反对封建主义，第三是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没有帝国主义撑腰就不行。他们自己没有武器、也没有钱。我们打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的武器和财政预算、军事费用，大半都是靠美国供给。

蒋介石是有名的运输大队长。吴庭艳是你们的运输队长。看到你们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你们从敌人手中拿到不少枪支。

仗打大以后，你们打算怎样处理俘虏？抓得多了，少数释放，大部分留下来用。这些人受过训练，包括少数中下级干部，大部分

[1] 本篇一和二是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南方局负责人阮梅菊时谈话的一部分。

[2] 吴庭艳，当时任南越政权“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可以改造了留下来用。要取得胜利，敌军工作很重要，俘虏政策很重要。敌军军官和技术人员也有一些人有爱国心，可以教育。被我们俘虏的蒋介石军队营一级的军官，少数人有爱国心，俘虏后经过教育，就同我们一起闹革命。其中有些医生、无线电和其他方面的技术人员，有经验，培养起来很有用处。军官工作做得好，将来可能有整营过来的。一九二八年，有一位毕占云^[1]带兵起义。这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他的意识很坚决。

我们的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是一九三〇年被俘的，他是我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创立人。从他决心同我们一起闹革命之后，我们的无线电通讯工作才算是建立起来。俘虏过来的医生、医务人员，留下来同我们在一起的也不少。

越南南方目前的战争和以前以越南北方为主要战场的战争不同。那时的抗法战争，有法国军队参加，没有美国军人参加。现在南越的战争，对方主力军是吴庭艳军队，美国军人不是主力。怎样瓦解吴庭艳军队，是取得南越革命战争胜利的一个主要问题。要好好努力创造条件。大家都是越南人。吴庭艳军队的战士大都是劳动人民，下级军官有可能少数是劳动人民，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即使不是下层出身的，也可以改造。蒋介石的高级军官，有的就投过来同我们合作。张治中^[2]就是蒋军中一位有名的将军，他来同我

[1] 毕占云，原国民党军营长。1928年9月在湖南桂东率部起义，加入红军。

[2] 张治中，1949年1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同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签字后，脱离国民党政府。

们谈判和平，和谈被蒋介石破坏，他留下来了。高树勋^[1]是在河北省邯郸地区带兵的将军，他手下有几个师的兵，他被俘释放，后来才投过来。傅作义^[2]也是一位有名的将军。那时他和他的军队被我们围困在北平，北平的东西南北，天津、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和热河，都在我们手里，他没有别的出路，因此派人出城谈判。他把军队全部交出来，都改编了，分散在我军各部队，干部则集训后听任分配使用。傅作义现在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在当时的绥远省，有一个军也归他管辖，军长叫董其武^[3]，也过来接受改编。改编后，大多数干部是我们的人，那支部队也就共产化了。还有在新疆带兵的陶峙岳^[4]，原归张治中管辖，也起义投诚。在长沙的陈明仁^[5]，是国民党一个军长，同我们在东北打过硬仗，当我军渡长江后继续南下时，程潜^[6]起义，他也带兵过来了。他是黄埔一期生，是受到蒋介石培养的。我们的元帅和大将，有些也是黄埔生或是旧军官。罗瑞卿是黄埔七期生，现在是大将，当总参谋

[1] 高树勋，原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1945年10月在平汉战役期间率部起义。

[2] 傅作义，原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3] 董其武，原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9月率部在绥远起义。

[4] 陶峙岳，原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9月25日率部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

[5] 陈明仁，原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

[6] 程潜，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8月与陈明仁率部在长沙起义。

长。林彪是黄埔五期生，现在是元帅、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徐向前是黄埔一期生，也是元帅。他们三个人原来就是共产党员。我军中有少数黄埔军校出身的将军，原来不是共产党员。有了这些人，对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有好处。所以，不但要对士兵和下级军官做工作，有条件也要对高级军官做工作。我们有几位元帅，原来也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你们现在在南越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有少数高级军官可能在局势发展、敌方进一步分化时投向你们。

二

你们在斗争中取得不少胜利，取得很多经验。你们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各项政策和斗争策略都很正确，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民群众很勇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你们领导同志看得远，能分析问题，既准备迎接好的情况，也准备对付坏的情况，比我们一九二七年的领导高明得多，也比我们一九三四年的领导高明。你们在斗争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群众，都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你们准备进行长期斗争，准备打九年、十年，也准备局势发展得较快些，胜利来得较快些。发展得较快，他们里头的高级军官要发生分化，这就不单是打的问题。打，一次消灭他们一个连两个连，积少成多。统治阶级到了某个时候，不能照原样维持下去，内部有可能起变化，有人出来争领导权。统治阶级里头出来争领导权的，还是要打反共的旗帜。出来争权的人会说，你反得不好，我来反。南越局势发展了，有这个可能。谁要反共，他就离不开美国，离开了美国就不行。你们是不是可以争取另一派，左倾的、倾向你

们的、进步的民主人士，让他们同你们合作，成立中间的过渡的政权。如果一时没有理想的人物，开头也可以争取较次要的人物来起作用。这种人投向你们，要一步一步来，可以先搭关系。你们还在农村的时候，他们不会过来。在这个时候，好好训练很多干部，使广大群众也得到锻炼。你们有大城市了，他们才会过来。到那个时候，他们过来就欢迎，不怕他们。要耐心等待，创造条件。

你们、我们两家很友好。两党、两国、两军的关系都很友好，很密切。这次你们来得好。南越斗争的许多情况和好经验，我们以前不知道，不了解。现在很高兴。你们的战略策略很正确。

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的修改^[1]

(1963年8月、9月)

—

中央认为，只有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地实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才能真正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工业，才能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在解放以后，能不能够实现大的跃进？能不能够使我国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跃进为先进的伟大的工业国？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稿的修改。其中一至四是1963年8月在这个文件初稿上的修改，五是1963年9月在这个文件初稿上加写的一段话。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三

现在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如何进一步地实现党的总路线的要求，多快好省地发展我们的工业，逐步地接近世界工业和技术的先进水平。

四

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五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

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及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一些改变，但要澈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采取澈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措施，使中国这个国家，模样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帝国主义现在

无疑地，若是反共派对，办法适当，就能夠多快好省地发展
我們的工业。

我們应当发展国防，积极抗战。不然，就要挨打。这就是摆在
“我們面前的问题”。一个不能解决的时局，改变我国
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如落後状态，否则我
們就要跑錯路。

合理地发挥现有工业基地的作用，充分利用老工业基地，是多
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工业一个重要的方针性問題。

这个方针性問題，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大关系》的
报告中提出的。毛泽东同志說，充分地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
技术力量，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来发展内地工业，支持内地工业。
他认为，如果对沿海工业采取清退的态度，不但会阻碍沿海工业的
充分利用，而且也会阻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也就是要充分利用老工
业基地的问题。

为着要发展我国的工业，为着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且为着
要合理分布我国的工业，我們有必要建設一批新的工矿企业。有必
要建設一些新的工业基地。不但过去要这样，今后也要这样。这是
没有問題的。如果不这样做，是錯誤的。

解放以来建設的新工业基地和新工业企业，为国家提供了重要
的产品，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已顯起了自己的积极作用。对于这种
作用如果估計不足，是錯誤的。（由拉國內外各种原因）

但是，充分地利用老工业基地，发挥老工厂的作用，还是今后必
須繼續貫徹执行的方針，还要继续进一步有系统地定出全面的规划。

我国被压迫我們，除最後一次，即抗日戰爭以日本帝国主义投
降者以外，没有一次能而不至以中國失败告终。其原
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後。

現在，其一，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
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階級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開始有了。

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的一段话的手稿。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5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